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年 第6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俄罗斯与世界秩序

- 3 刘军童珊 / 通往后西方世界秩序：  
俄罗斯的身份定位和实现路径

### 地缘战略与新兴技术

- 22 潘玥 / 地理约束与技术变革：俄乌冲突对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挑战与重构
- 48 王英伦 李航 / 地缘战略新变化与美国的“新疆界”

### 俄罗斯国防工业与动员机制

- 69 蔺陆洲 / 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与战争潜力
- 98 张君义 / 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动员机制与国家能力增长问题研究

### 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

- 132 郑永旺 / 当代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表意结构
- 153 赵晨宇 岳博强 / “文学拯救俄罗斯”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文化观研究

### 附 录

- 189 《俄罗斯研究》2025年总目录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28日

# 俄羅斯研究

##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5年第6期(双月刊)

## Оглавление

### *Лю Цзюнь, Тун Шань*

На пути к постзападному мир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уть к её реализации ..... (3)

### *Пань Ю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ызовы и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Каплан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 (22)

### *Ван Инлунь, Ли Хан*

Новые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сдвиги и «новый рубеж» США ..... (48)

### *Линь Лучжоу*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ая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и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69)

### *Чжан Цзюнь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ов моби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и рос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в условиях кризиса ..... (98)

### *Чжэн Юнван*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е ..... (132)

### *ЧжАО Чэньюй, Юе Боян*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взгляд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критиков ..... (153)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5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Liu Jun, Tong Shan***

- Toward a Post-Western World Order: Russia's Identity Positioning and Pathways to Realization ..... (3)

### ***Pan Yue***

-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ow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hallenges and Reconstructs Kaplan's Geopolitical Theory ..... (22)

### ***Wang Yinglun, Li Hang***

- New Changes in Geostrategy and America's "New Frontiers" ..... (48)

### ***Lin Luzhou***

- Defense Mobilization and War Potential of Russi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 (69)

### ***Zhang Junyi***

- Russia's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amid Crisis and the Question of State Capacity Growth ..... (98)

### ***Zheng Yongwang***

- The Signifying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piritual Culture ..... (132)

### ***Zhao Chenyu, Yue Boqiang***

- "Literature will save Russia" and the Cultural Outlook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ry Critics ..... (153)

## 俄罗斯与世界秩序

# 通往后西方世界秩序： 俄罗斯的身份定位与实现路径\*

刘军童珊\*\*

**【内容提要】**作为较早倡导国际秩序变革的国家，俄罗斯将自身定位为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的关键角色和“世界多数”国家中的重要一员，致力于揭露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弊端，构建后西方世界秩序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俄罗斯以欧亚区域秩序建设为核心，推动各类多边主义平台的协同合作；在尊重现存国际组织的基础上，谋求针对性的改革；通过引领非西方世界议题的创设和传播，凝聚共识，提高非西方国家参与多极化合作的主体性。总之，通过理论与叙事上对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的构建以及具体的实践，俄罗斯提升了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的封锁，加深了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为其国家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后西方世界秩序 俄罗斯外交 全球南方 欧亚区域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003(19)

## 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叙事构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在随后的三十余年中，新兴大国及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

\*\* 刘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童珊，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

观念与实践层面逐步动摇了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后冷战时代欧洲秩序博弈的烈度上升到了新的阶段，<sup>①</sup>加重了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深层危机。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西方国家在短期内增进了团结。然而随着冲突的长期化，西方内部的分歧不断出现。一方面，俄乌冲突使欧洲国家真正清醒地意识到对美国安全保护过度依赖的问题，从而切实强化了对战略自主的诉求，欧美分歧与裂痕由此加大。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法国、波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极端主义力量上升，致使欧洲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愈发明显。<sup>②</sup>总之，俄乌冲突加大了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外部压力，更加深了西方内部的分歧。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没有跟随西方世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其独立性进一步凸显。这一切都清楚地显示，国际秩序的演进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 （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叙事

2008 年，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提到：“这不是一本关于美国衰落的书，而是关于其他国家崛起的书。”<sup>③</sup>2011 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专家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进入后西方世界”一文，拓展了扎卡里亚的这一论点，指出一个新时代到了，后西方世界可能会被证实不一定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的衰落，而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崛起。<sup>④</sup>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没落，非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会越来越活跃，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一种后西方的世界秩序。2016 年，巴西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判断，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这些国家通过推动制定新的全球规则与规范，将形成一个后西方的多极

---

① 参见柯研、毕洪业：“夹缝中的‘雄心’：欧洲秩序博弈下波兰对乌克兰外交研究”，《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28—157 页。

② See Bryan Frederick, et al., *Consequence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flict*, RAND, May 22, 2025.

③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 W. Norton, 2008, p.1.

④ Simon Serfaty, “Moving into a Post-Western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 Vol.34, No.2, pp.7-23.

世界，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一种新的全球秩序。<sup>①</sup>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则认为，后西方世界秩序是相对于1820—2008年的西方世界秩序而言的；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英语世界失去了在全球国际社会中长期扮演的领导角色，全球秩序正在向后西方国际社会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秩序，可以被称为后西方世界秩序。<sup>②</sup>随后，巴里·布贊用“深度多元主义”来形容这一秩序，认为这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将拥有更大的财富、权力和文化的扩散能力与影响。<sup>③</sup>

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年度报告《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指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构建世界事务新框架。<sup>④</sup>2020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教授认为，中俄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将自身利益纳入考量的“后西方时代”的全球秩序。<sup>⑤</sup>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西方的主导地位，这可能会鼓励形成新兴大国、中等强国、地区大国以及跨越东西方分界线的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即全球多元化框架（global multiplex framework），从而加速一个后美国与后西方世界的到来。<sup>⑥</sup>阿查亚指出，未来会是一种多重的世界秩序，将由东方，尤其是亚洲，而非西方主导，将以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方式塑造新的全球化和全球合作。<sup>⑦</sup>

---

① See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205.

② 巴里·布贊：“后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核武器与核威慑”，《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第53—72页。

③ Barry Buz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ecurity Agenda”,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Barry Buzan,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2020, Vol.30, No.3, p.8.

④ “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发表最新年度报告认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人民日报》，2017年2月16日第21版。

⑤ See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China: Axis of Revisionists*, February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0/02/FP\\_202002\\_russia\\_china\\_stent.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0/02/FP_202002_russia_china_stent.pdf)

⑥ Amitav Acharya, “Trump is Hastening the Emergence of a Post-Western World”, August 19, 2025, <https://multiplexworld.com/2025/08/19/trump-is-hastening-the-emergence-of-a-post-western-world/>

⑦ Amitav Acharya,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Will Lead to a New World Order”,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29,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5-09/decline-west-and-rise-rest-will-lead-new-world-order>

俄罗斯方面对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讨论相当积极和深入。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官方、学界以及媒体围绕西方的衰落、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以及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构想，展开了广泛的讨论。2016 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举办了主题为“后西方世界：多中心全球秩序的基础”的学术讨论会，重点关注金砖国家的崛起。在 2017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呼吁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sup>①</sup>拉夫罗夫提出：

“我们希望选择建立一个民主和公正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之为后西方的世界秩序；在此秩序内，每个国家能够确保主权，可以在本国与伙伴国家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历史和文明身份。”<sup>②</sup>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认为，新兴的后西方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化、高度自由的世界，各国和各文明得以蓬勃发展，旧的西方霸权会消亡，新的霸权也不会出现，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机会，霸权主义将不复存在。<sup>③</sup>俄罗斯政治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ugin）则断言，西方世界秩序已经走向终结，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西方世界秩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sup>④</sup>总体而言，俄罗斯官方和学者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大致勾勒出这样的轮廓：西方世界的没落意味着新秩序建立的加速，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将更加分散，非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会更加明显，未来将是一种多极的、后西方的世界秩序。

中国学者在探讨国际秩序时，倾向于讨论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更多使用“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部分中国学者使用过“非西方”、“后西方世界”的概念，但与俄方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中国学者林利民认为，后西方世界是一个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的概念，具体指的是西方

---

① “俄罗斯外长呼吁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新华社，2017 年 2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8/c\\_112048982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8/c_1120489822.htm)

② Глава МИД Франции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слова Лаврова о «пост-западном» мироустройстве. ТАСС. 23 февраля 2017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4046676>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Постзападный мир: как обеспечить развити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для всей Евразии. РСМД. 19 июня 202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postzapadnyy-mir-kak-obespechit-razvitiye-i-bezopasnost-dlya-vsey-evrazii/?ysclid=miejwjtuc1830974758>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Западу пришёл конец. Мы входим в новый мир. Царьград. 31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tsargrad.tv/articles/aleksandr-dugin-zapadu-prishol-konec-my-vhodim-v-novyj-mir\\_406473](https://tsargrad.tv/articles/aleksandr-dugin-zapadu-prishol-konec-my-vhodim-v-novyj-mir_406473)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积累的非同寻常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趋向终结的过程，“后西方”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与西方相关的价值观、规则和规范的彻底颠覆，而是强调非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国际社会的舞台中央，从而引发国际权力的转移。<sup>①</sup>于海洋论证了非西方世界依旧受到西方世界的制约，前者总体实力的增长未反映到国际秩序的上层建筑，而金砖机制有助于提升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sup>②</sup>孙丽萍从历史路径探讨了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塑。<sup>③</sup>朱云汉指出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体的衰败，显示全球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sup>④</sup>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和官方强调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坚定的维护者，同时需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 （二）其他相关叙事的兴起

除了上述专门针对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构想，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于非西方国家的立场，通过对其他概念的叙事构建，推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重组，拓展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具体表现为，肯定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丰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构建非西方国际秩序观叙事等。

第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概念，最早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于 1969 年提出。<sup>⑤</sup>全球南方国家指的是，经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sup>⑥</sup>在话语构建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全球南方的学术

<sup>①</sup> See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p.63-64; 林利民：“‘后西方’世界：敢问路在何方？”《当代世界》，2017 年第 8 期，第 8-11 页。

<sup>②</sup> 于海洋：“金砖机制助推非西方世界战略性合作”，《理论视野》，2017 年第 10 期，第 72-75 页。

<sup>③</sup> 孙丽萍：“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历史路径”，《史学集刊》，2019 年第 4 期，第 29-31 页。

<sup>④</sup> 朱云汉：“后西方世界秩序重构与新时代的中国担当（上）”，《经济导刊》，2018 年第 6 期，第 24-29 页。

<sup>⑤</sup> See Carl Oglesby, “Vietnamis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Commonweal*, 1969, No.90, p.158.

<sup>⑥</sup> 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12 页。

文章数量从 2005 年的 30 篇增长到 2020 年的 1600 篇，许多专门研究全球南方的期刊也应运而生。这些努力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重构了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认同，并以非西方的视角解读世界秩序。<sup>①</sup>从实践层面来看，随着西方国家影响力的逐渐衰弱，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区域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还倡导或参与创建了全球及地区层次的诸多平台，推动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sup>②</sup>“全球南方”并非“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简单同义词，而是蕴含着非西方国家及行为体的解放进程、差异化的世界观与权利诉求。<sup>③</sup>与此同时，受国际秩序博弈的影响，随着大国对全球南方国家采取的拉拢或者分而治之的策略不断展开，<sup>④</sup>全球南方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构建。自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无论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还是以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以及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理论，都秉持着西方话语特征，并长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后西方世界的兴起，非西方国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提出了诸多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比如，上海学者金应忠倡导共生理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国际秩序观，坚持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拓展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空间。<sup>⑤</sup>秦亚青认为，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失灵现象，因此需要从多元主义、伙伴关系以及参与实践三个维度进行秩序理念创新。<sup>⑥</sup>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从国际权力平衡的角度指出，为了实现地区层面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平衡政策，以确保地区

---

① Susanne Gratius, Matías Mongan, “El Sur Global: Construyendo un Mundo Postoccidental”, *Ánalisis GATE*, January 2023, p.2.

② 参见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制度为例”，《国际观察》，2024 年第 2 期，第 97–129 页。

③ Susanne Gratius, Matías Mongan, “El Sur Global: Construyendo un Mundo Postoccidental”, *Ánalisis GATE*, January 2023, pp.3-5.

④ 参见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政治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83–113 页。

⑤ 金应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构成”，《国际观察》，2022 年第 3 期，第 28–69 页。

⑥ 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22 页。

内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平衡，防止任何一方的垄断地位。<sup>①</sup>阿列克谢·葛罗米柯（Алексей Громык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多极化是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sup>②</sup>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式构建，为支持非西方国家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非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叙事构建进一步加快。非西方国家意识到，自身同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平等的商业-出口、金融-工业以及技术-工业三种依附结构。<sup>③</sup>在此背景下，非西方国家逐步提出与西方中心主义不同的国际秩序理念，从不同的构建路径出发，经过长期的演化与调整，最终形成了多样化的国际秩序观。<sup>④</sup>与西方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比，俄罗斯更加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性。2023年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提出：“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可靠安全，保护文化和文明身份、平等的发展机会”<sup>⑤</sup>。实际上，早在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之前，俄方就曾经重新阐释过“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认同模式，指出其不是对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固守，而是提供了合法性来源的非西方路径。<sup>⑥</sup>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随即在202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中加入了“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sup>⑦</sup>中国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各国人民追求的崇高目标，是持

---

① См.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Новый баланс сил: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Москва: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 2021. С.90-99.

② См.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ыко. Об иллюзиях новой bipolar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5 мая 2020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b-illyuziyakh-novoy-bipolyarnosti/>

③ 参见[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齐海燕、毛金里、白凤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334-335页。

④ 参见柯研、毕洪业：“国际秩序建构路径中的共有观念：中国与美俄国际秩序观的差异分析”，《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2期，第1-16页。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⑥ См.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Украина: моя вой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15.

⑦ См.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久安全之基。只有坚持公平正义，才能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sup>①</sup>。非西方国际秩序观的逐渐形成，既是非西方国家对现有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回应，也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尝试。

## 二、俄罗斯在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中的身份定位

俄罗斯长期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持批判态度。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污名化甚嚣尘上，俄罗斯对西方的反击也愈加犀利。俄罗斯不仅针对西方的国内制度，而且揭露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弊端。俄罗斯并不确定后西方世界秩序何时能以建立，但是通过明确自身的身份定位，积极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加速形成。

### （一）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弊端的揭露者

第一，俄罗斯批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持双重标准，加剧了全球失衡。俄罗斯认为西方制定的规则，本质上是西方可以随意解释、差异化执行的霸权规则。俄方认为，西方倡导规则，但在规则的执行方面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严重弱化规则的效应，这是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失衡的重要诱因。

在 2023 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强烈抨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认为西方“试图用基于某些规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取代国际法。”<sup>②</sup>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 2024 年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亦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歪曲《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实施“例外主义”，根据自身地缘利益选择性地执行相关规则，这种双重标准行为不仅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精神，也暴露了西方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维护自身霸权的野心；西方长期以来鼓吹的“自由民主”不过是掩盖经济掠夺和地缘扩张的借口，西方的霸权思维早已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同样在于西方。<sup>③</sup>俄罗斯极力论证俄乌冲突的发生，源于西方执行国际规则的双重标准，正是北

---

① 任平：“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从四大全球倡议看和平与发展”，《人民日报》，2025 年 9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5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

③ Встреча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ИД России. 14 июн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4285>

约无视既定的国际规则如《联合国宪章》在先，也不兑现此前对俄罗斯的承诺，因此俄罗斯被迫卷入了这场冲突，这并不是俄罗斯的主动选择。

第二，揭露西方主流价值观以普世之名行霸权之实。作为一种智识的创造，并得益于自身实力的支持，西方能够推广普及自由民主思想。俄罗斯在哲学层面论证西方推广的自由民主思想的缺陷，指出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中，西方通过叙事建构出了一种等级秩序——发达世界的“普适性文明”和其他世界的落后文明，并且认定自身的“普适性文明”是衡量所有国家进步与否的关键指标，不允许其他国家根据历史发展情况、文明特征享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其他国家如不遵从西方的“文明标准”，便被认定为“极权国家”，并有内政被干预的风险。俄方认为，西方的行为是霸权模式，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剥夺，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全球和谐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sup>①</sup>

第三，抨击西方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被西方国家用来对他国进行侵略和剥夺。自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和俄罗斯其他高层官员常常将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一体两面加以抨击，指出集体西方将“自由国际秩序”作为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将反对新殖民主义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抨击西方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抛在一边，实施非法经济制裁，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谋求颠覆他国合法产生的政府。俄方认为，西方试图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行径充分体现了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性，是破坏国际关系稳定的主要因素。<sup>②</sup>在 2024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发言中，普京详细分析了金融领域的新殖民主义。他指出，美国正在利用美元的垄断地位从其他国家抽取资源，这就是一种现代版的新殖民主义。<sup>③</sup>此外，俄方还认为需要警惕西方将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工具。

---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②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неоколониализмом попытки Запада оказ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давление. Известия. 16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iz.ru/1651219/2024-02-16/putin-nazval-neokolonializmом-popytki-zapada-okazat-ekonomicheskoe-davlenie-na-rf>

③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7 июн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4234>

## （二）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理念的倡导者

俄罗斯坚定不移地支持并倡导国际秩序的转向，认为“旧的世界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一场严肃且不可调和的斗争正在为新世界秩序的形成而展开。”<sup>①</sup>俄方界定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多极合作的后西方世界。<sup>②</sup>俄罗斯对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理念的倡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后西方世界秩序规则的倡议。俄罗斯不否认规则的重要性，但强调规则不能成为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俄罗斯认为，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中，主权平等的原则是根本，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为规则的制定和创设贡献智识；《联合国宪章》依旧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进行改革。在俄罗斯官方的论述中，后西方世界秩序既是多极化、更是多声部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所有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而且必须被听到。<sup>③</sup>俄方认为这样的世界秩序能够包容复杂多元的思想，可以为解决国际冲突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

第二，关于后西方世界秩序权力分配的观点。俄方认为，只有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才能成功。单极世界秩序的基础是为少数国家创造特权，打着普世准则的幌子，将自私的规则和行为模式强加给所有人。而在后西方的世界秩序中，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命运自决权，获得应有的地位。普京明确提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团结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促进建立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sup>④</sup>统一俄罗斯党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指出，亚非拉国家已经成为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sup>⑤</sup>在俄罗斯

---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② Встреча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ИД России. 14 июн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4285>.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④ “普京：俄罗斯外交旨在促进团结世界多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网中文版，2024年2月10日，<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40210/1056998837.html>

⑤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Попытки отдельной группы стран установить мировую монополию обречены-эпоха одн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завершена.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16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er.ru/activity/news/dmitrij-medvedev-popytki-otdelnoj-gruppy-stran-u-stanovit-mirovuyu-monopoliju-obrecheny-epoha-odnopolyarnogo-miroporyadka-zavershena>

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的影响。俄方认为，西方积累了巨量的人力、智力和物质资源，这些资源使其能够成功发展，并继续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确切地说，西方只是“其中之一”，与其他积极发展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并驾齐驱。<sup>①</sup>

第三，对后西方世界秩序主流价值观的倡导。各种形态的社会秩序都需要具备核心的价值理念，作为交往互动的指引。<sup>②</sup>论及后西方世界秩序的主流价值观，俄罗斯反对垄断式的“自由民主”，强调开放交流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sup>③</sup>同时，俄方推崇传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强调传统对各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认为传统是属于每个国家独特、原创的智慧。俄方认为，尊重传统是国际关系成功发展和各类矛盾得以解决的首要条件。<sup>④</sup>

第四，拒绝“集团”哲学，尊重多样性。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坚持以北约等集团谋求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对其他国家实施集体压制，这是引发地区和全球动荡的重要原因。而在后西方的世界秩序中，俄方认为各国仍然有权基于共同的利益建立联盟关系，但不会以反对其他国家作为维持自身存在的理由，也不会因谋求自身利益而威胁全球安全。普京强调，金砖国家不反对任何特定国家……我们需要学会共存，同时考虑到意见的多样性。<sup>⑤</sup>

### （三）后西方世界秩序建设的关键力量

俄罗斯致力于通过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建设，发挥自身的大国影响力，确保成为该秩序中的关键一极。

第一，强调俄罗斯在后西方世界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普京认为，俄罗斯正站在形成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进程的最前列。<sup>⑥</sup>2023年版《俄罗斯

---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② 参见赵可金：“从国际秩序到全球秩序：一种思想史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76-96页。

③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④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 октября 2025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8134>

⑤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защищает интересы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Ридус. 3 октября 2025 г. <https://www.ridus.ru/putin-podtverdil--rossiya-zashishaet-interesy-globalnogo-yuga-707362.html>

⑥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авангарде создан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оустройств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28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ria.ru/20231128/putin-1912427138.html>

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强调，俄罗斯力图“在建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消除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履行维护全球力量平衡和建立多极国际体系的独特历史使命。”<sup>①</sup>

第二，俄罗斯认为自身能够在大国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俄方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推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合作，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以此证明俄罗斯在后西方世界秩序建设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推动以“世界多数”国家为支柱的公正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方面，存在着共同目标。<sup>②</sup>俄罗斯还通过各种外交活动，与印度等国进行参与多极世界秩序建设的相关协调。总体而言，俄罗斯重视通过金砖机制，持续推动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转型。

第三，将自身定位为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关键一方。对于俄罗斯来说，2022 年以来的俄乌冲突从内外两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空间革命”。从俄罗斯内部来看，俄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西方情结，转而开始将自身定位为非西方世界的中坚力量。从外部来看，俄方认为自身与西方的成功对抗，使其他非西方国家更加敢于争取主权，有助于加速推动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向，并且由于自身的示范效应，俄罗斯理应是该秩序中的关键一方。

### 三、俄罗斯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的具体路径

俄罗斯把建立多极化、多声部的后西方世界秩序，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实践路径是：推动区域秩序建设，推动重要国际组织的改革，引领全球层面非西方世界议题的创设。

#### （一）推动区域秩序建设

俄罗斯认为，在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向中，区域秩序的建设意义重大。为此，俄罗斯积极参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

---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3.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

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新华社，2025 年 8 月 30 日，<http://www.news.cn/20250830/a8c5f30dc21a4aec84521df32e080a9f/c.html>

合作委员会等区域组织的相关多边活动。鉴于欧亚地区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密切相连，该地区是俄罗斯的主要着力点。

第一，俄罗斯倚重欧亚区域性多边平台，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上合是俄罗斯可以依托的重要区域组织，因而俄罗斯积极推动组织内的各项合作，将其行动议程拓展至能源安全、创新产业、航天技术和平台经济，形成了立体化、多层次的合作架构。同时，俄方倡导“上合组织+”的合作模式，通过吸纳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方式扩大组织影响力，增强欧亚区域秩序的外溢效应，为非西方世界国家参与区域乃至全球事务提供新的制度选择。

2025年9月，普京在参加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团结了志同道合、致力于建设公平多极世界秩序理念的国家。”<sup>①</sup>

第二，俄罗斯致力于推动欧亚各区域组织间的协同合作。2025年10月，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会议决定给予上合组织观察员地位，正式将上合组织和独联体的议程衔接起来。在第三届明斯克欧亚安全部际会议上（2025年10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2024年普京提出的建立欧亚安全架构的倡议，强调俄罗斯对欧亚未来安全架构的愿景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全球倡议保持一致；同时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为基础，支持创建新的联盟模式——“独联体+”机制，作为拓展区域合作的新平台。在欧亚区域，俄罗斯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实践，不是碎片化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通过增强欧亚区域组织之间的联合，俄罗斯希望形成一张相互补充的欧亚区域化组织机制网络，促进后西方世界秩序在欧亚区域先期形成。<sup>②</sup>

## （二）推动重要国际组织的改革

俄方认为，在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的进程中，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依旧具有实际意义，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需要进行改革。

①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гла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сширенном составе.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18 ноября 2025 г. [https://beijing.mid.ru/ru/news/zasedanie\\_soveta\\_glav\\_pravitelstv\\_gosudarstv\\_chlenov\\_shankhayskoy\\_organizatsii\\_sotrudnichestva\\_v\\_ras/](https://beijing.mid.ru/ru/news/zasedanie_soveta_glav_pravitelstv_gosudarstv_chlenov_shankhayskoy_organizatsii_sotrudnichestva_v_ras/)

② Гатто В. М. Постзапа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ногослойнос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25. №4. С.33.

第一，关于联合国，俄方强调在现有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关改革。俄方表示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协调作用。俄方认为，由于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联合国是目前唯一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平稳过渡到多极世界的国际组织。<sup>①</sup>俄方同时认为，需要提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并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使联合国能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利益。俄罗斯批评联合国秘书处的核心岗位多被北约国家人员占据，缺乏地域代表性，建议明确全球南方国家在关键岗位的占比底线，保障其在联合国行政体系中的参与权。

第二，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虽多次批评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机制僵化等问题，认为部分发起国违背贸易自由化原则，但依旧支持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2024 年，在金砖国家峰会《喀山宣言》中，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共同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贸易限制措施。2025 年 7 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世贸组织总干事会晤时表示，需要基于包容、非歧视、透明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紧急改革，改变其过时、为少数成员国服务的现状，需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利益，保障各国在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平等地位。<sup>②</sup>

第三，在金融领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俄罗斯提供融资，<sup>③</sup>所以俄罗斯希望依托金砖国家平台，创建能够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构。2024 年 10 月，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Антон Силуанов）在金砖国家金融和央行高级官员会议上呼吁，联手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机构。<sup>④</sup>其他金砖国家则更倾向于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

① “Briefing b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Maria Zakharov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eptember 4, 2025, <https://mid.ru/en/foreignpolicy/news/2044875/>

② “关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的会晤”，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官网中文版，2025 年 7 月 7 日，[https://mid.ru/cn/press\\_service/meetings/2034318/](https://mid.ru/cn/press_service/meetings/2034318/)

③ “G7 Leaders’ Statement”, March 11, 2022, [https://content.mlex.com/Attachments/2022-03-11\\_S6743MC3IPRSO132/2022-03-11-g7-leader-eng-data.pdf](https://content.mlex.com/Attachments/2022-03-11_S6743MC3IPRSO132/2022-03-11-g7-leader-eng-data.pdf)

④ “俄促金砖国家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替代方案”，《联合早报》，2024 年 10 月 11 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world/story20241011-5059640>

银行中的发言权，并未支持俄罗斯提出的创立替代机构的倡议。<sup>①</sup>在对国际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俄罗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批评具有强烈的对抗色彩，因此没有获得其他金砖国家的支持。这说明俄罗斯针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和倡议，会受到其他新兴大国的影响，如果过于激进，则难以顺利推进。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支持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全球公共产品贡献方面还很有限。俄罗斯在全球责任担当方面，也与其宣称的大国地位存在差距。这些都可能会限制俄罗斯在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近期，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接近金砖国家大多数成员的立场。在 2025 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拉夫罗夫认为需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民主化——使之与“全球南方”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的重要性和地位相匹配。<sup>②</sup>

### （三）引领全球层面非西方世界议题的创设

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向中，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是可靠且不断增长的资源。<sup>③</sup>在此过程中，俄罗斯的一个明显举措，是引领非西方世界议题的创设与传播，突出非西方国家的地位、角色和贡献，凝聚非西方国家的共识，增进自身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

第一，俄罗斯官方在各类重要场合，公开宣传非西方国家是建设多极化世界重要力量的观点。俄方依托本国媒体部门的丰富资源和经验，着力加强与非西方国家媒体机构、舆论领袖和社交网络的紧密合作。俄方通过引领议题设置和传播，突破了西方在全球媒体空间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推动了非西方世界相关议题的传播。俄方试图通过打造能够引起非西方国家深层共识的概念，整合广大非西方国家较为碎片化的话语框架，加强其全球视野。为此，俄方积极推动非西方国家接受“世界多数”的概念，同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

<sup>①</sup>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 年 7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507/t20250708\\_1166746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507/t20250708_11667461.shtml)

<sup>②</sup> Тезис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общ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искуссии 80-й сессии Ген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Нью-Йорк. 27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statements/80/ru\\_ru.pdf](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statements/80/ru_ru.pdf)

<sup>③</sup> Тренин Д. В. Не «против», а «з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ne-protiv-a-za/>

成为代表“世界多数”利益的政治中心。<sup>①</sup>俄罗斯语境下的“世界多数”，指的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共同体。俄罗斯引领设置“世界多数”的话题与概念，主要服务于构建后西方的世界秩序。<sup>②</sup>俄方通过“世界多数”概念的推广，意在突出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力量平衡和多极化世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凝聚非西方国家共识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成功推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俄罗斯而言，“世界多数”概念是对抗西方世界的手段；而在其他国家例如东盟国家看来，这一概念可能引起冲突，阻碍国际共识的形成。<sup>③</sup>

第二，俄罗斯联动相关地区的政治力量，打造专属国际平台，在全球层面创设非西方世界的核心议题，反对新殖民主义就是其中一项。<sup>④</sup>2024 年 2 月，由统一俄罗斯党出面，联合包括来自亚非拉、中东、独联体等区域的 50 多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在莫斯科召开了首届“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俄方表示要将该论坛打造成为全球运动，动员和吸引各国政党、社会团体、专家和商业代表参与其中，<sup>⑤</sup>目的是使抵制新殖民主义在全球层面形成共识，深入人心。俄方发起的抵制新殖民主义的议题，与其推动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霸权主义议题，三者相互结合，为的是在非西方世界中打造旗帜鲜明的、由俄方引领的核心叙事话语。

俄方通过在全球层面引领非西方世界议题的创设与传播，挑战了西方议题在全球舆论空间长期占据垄断局面的现象，旨在增强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

---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олёв. Миров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 АСЕАН: идеиное сопряжение или напряжение? РСМД. 21 октября 202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mirovoe-bolshinstvo-i-asean-ideynoe-sopryazhenie-ili-napryazhenie/>

② Sergei Karaganov, Alexander Kramarenko, Dmitry Trenin, “Russia’s Policy Towards World Majority”, 2023, <https://www.mid.ru/upload/medialibrary/c98/cjmfdf73760bme0y99zqIlj51zzlrvs/Russia%E2%80%99s%20Policy.pdf>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олёв. Миров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 АСЕАН: идеиное сопряжение или напряжение? РСМД. 21 октября 2025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mirovoe-bolshinstvo-i-asean-ideynoe-sopryazhenie-ili-napryazhenie/>

④ “俄对外情报局长：反对新殖民主义是俄罗斯的优先事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官网中文版，2025 年 5 月 28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50528/1065724088.html>

⑤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проводит перв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рум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борьбы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практиками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15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er.ru/activity/news/edinaya-rossiya-provodit-pervyj-mezhdunarodnyj-forum-storonnikov-borby-s-sovremennymi-praktikami-kolonializma>

国家的粘合力，提高非西方国家深入参与多极化合作的积极性。

#### 四、结语

对于俄罗斯而言，推动国际秩序转向，是其争取更大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联合非西方国家突破西方制裁和封锁，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俄罗斯希望建设一个不再由西方主导的后西方世界秩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俄方均将自身定位为构建这一秩序的中坚力量。俄方通过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批判、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弊端的揭露，为后西方世界秩序观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层面，俄方主动联合非西方世界国家，以各种区域多边平台为基础，引领和创设后西方世界秩序转向的议题和理念。

然而，鉴于非西方世界国家间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各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谋求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的热情远不如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在诸多场合声称没有将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作为与西方对抗的工具，在后西方世界秩序建设以及“世界多数”概念中也强调包括西方国家，但其不论是在非西方世界的议题设置上，还是在推广“世界多数”概念的实践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国家对抗的色彩，因此，一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国家，较为审慎，不愿意被卷入这种对抗之中。

俄罗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此在推动区域秩序构建、联合非西方国家创设新规则、在全球信息空间普及非西方世界主要议题之外，试图寻求弱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抗的色彩。这一点在普京 2024 年和 2025 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发言中均有体现。但是，作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手段，推动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向，仍将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战略方向。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iest advocates of trans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ussia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 key driver of the shift toward a post-Western world order and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World Majority”. It seeks to expos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Western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o articulate ideas for constructing a post-Western order. In practice, Russia has placed the building of a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at the core of its efforts, promoting coordination and synergy among various multilateral platforms; while respect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t pursues targeted reforms; and by initiating and disseminating agendas central to the non-Western world, it aims to consolidate consensus and enhance the agency of non-Western states in multipolar cooperation. Overall,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and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turn toward a post-Western world order and concrete policy practices, Russia has strengthened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partially circumvented Western containment, deepened ties with the non-Western world, and expanded new space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st-Western World Order, Russian Diplomacy, Global South,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будучи одной из первых стран, выступивших за рефор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зиционирует себя как ключевой игрок в движении к постзападному мир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и важный член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Она стремится выявить недостатки западного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построить постзападн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На практике Россия фокусируется на построе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содейств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атформах; поиске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реформ при уважени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озглавляя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акту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в незападном мире, достигает консенсуса и расшир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в участии в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нарратив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пост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конкретной практики Россия усилила сво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дискурсивную силу и влияние, в некотор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орвав западную блокаду, углубив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незападным миром и расширив нов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стзападн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地缘战略与新兴技术

# 地理约束与技术变革： 俄乌冲突对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挑战与重构<sup>\*</sup>

潘 玥<sup>\*\*</sup>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为重新审视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独特视角。其中传统地理因素与现代技术力量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地理约束在数字化战场上的新变化，挑战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框架。从地理约束角度看，顿巴斯地区的地形特征、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第聂伯河作为天然屏障的作用依然深刻影响战争进程。乌克兰东部平原地带的开阔地形有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而城市密集区则是抵抗的堡垒，印证了卡普兰关于地理形态对军事行动约束的基本论断。而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地理空间的作用机制。网络战能跨越物理距离实施打击，星链卫星通信系统有效规避了传统信号干扰，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增强了小国投射力量的能力，使传统地理屏障呈现“选择性渗透”的新特征。技术已成为改变地缘政治平衡的关键因素。地形、距离和资源等传统地理要素的重要性持续存在，但其作用方式正在被技术重塑。技术可强化、也可弱化某些地理限制，形成“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对大国而言，地缘战略需重新平衡物理空间控制与技术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而言，技术赋能提供了突破地理劣势的新选择；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地理-技术动态平衡的变化将重塑全球力量投射模式。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 俄乌冲突 地理约束 技术变革 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022(2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3AZD087）的成果。

\*\* 潘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已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场发生在东欧平原与黑海北岸地区的地缘政治较量，不仅重塑了欧洲安全架构，更直接挑战了学界对地理因素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的既有认知。当代信息技术与武器系统的飞速发展曾一度使许多学者批判“地理决定论”过于简单化，认为地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sup>①</sup>然而，俄乌战场上呈现的复杂现实却表明，地理因素与技术能力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互动模式：地理条件为技术应用设定了效能边界，而技术创新则持续重构地理要素的战略价值，这种关系既非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地理决定论，也非技术乐观主义者所预言的“地理终结”。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The Coming Anarchy*）<sup>②</sup>与《地理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sup>③</sup>中系统阐述地理因素如何持续塑造国际政治格局。他强调地形、资源分布与战略缓冲区等传统地理要素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影响，这一观点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当代地缘政治理论对地理因素持久作用的关注。然而，俄乌冲突呈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东欧平原缺乏天然屏障导致的俄罗斯“战略不安全感”成为此次冲突的深层地缘动因，印证了地理持久性影响的论断；另一方面，现代无人机侦察与打击系统、精确制导武器与网络战能力的广泛应用，又确实在战术层面改变了传统地理屏障的防御价值与战场控制逻辑。这种复杂的现实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在技术削弱传统地理屏障效力的条件下，俄乌冲突是否预示地缘政治理论需要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这一分析概念。本

---

① 参见 B. H. 米罗诺夫、张广翔：“地理因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第61-78页；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3; Sergey Pogodin, Yuriy Gladkiy, Dmitri Lopatnikov, “Geographical Neodeterminism: A Broken or Transformed Paradigm?” in Radomir Bolgov, Vadim Atnashev, et al., *Proceedings of Top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Basel: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2, pp.244-255.

②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01.

③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2.

研究强调：地理要素对国际冲突的实际影响越来越依赖于冲突各方的技术转化能力。具体而言，技术转化能力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技术获取能力、技术适配能力、技术对抗能力。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了地理条件能否转化为战略优势。与传统研究将技术视为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外部变量不同，本研究深入探讨地理条件与技术能力之间的相互建构机制：地理要素的战略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特定技术条件下行为体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利用与改造能力；同时，地理条件本身又为技术部署设定物质边界，影响技术效能的实际发挥。

这种相互建构关系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顿巴斯地区的阵地战与南部赫尔松平原的机动战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不同地形条件下技术效能的差异；第聂伯河等自然屏障的战略价值被精确打击武器部分消解，又反映了技术对传统地理约束的选择性突破。俄罗斯与乌克兰对地理空间的军事控制已经从传统的物理占领扩展至电磁频谱控制与信息空间争夺。乌克兰通过西方技术援助和本土创新，在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提升了技术获取能力和适配能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俄罗斯的地理优势；而俄罗斯尽管拥有地理优势，却因技术适配能力不足而未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这些现象表明，地理因素在现代冲突中的作用机制正在发生质变，从直接物理约束转向对多维战场空间的结构性塑造，而这一转变的关键中介变量正是技术转化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选择卡普兰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并非认为其代表了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全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早已超越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许多学者已将权力关系、经济网络乃至技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本研究选择卡普兰理论，是因为其对地理因素的强调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对其理论假设的检视，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技术变革对地缘政治理论提出的挑战，进而推动更广泛的理论反思。本研究提出的“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概念，旨在为理解当代国际冲突提供一个更为精确的分析工具，其适用性并不局限于对某一特定理论的修正，而是为整个地缘政治研究领域提供新的分析维度。

本研究兼具一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该研究进一步深

化了国际关系理论对物质或地理基础与技术能力的互动关系的理解，通过明确界定技术转化能力的三个维度及其作用机制，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对地理约束与技术变革辩证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各国更加准确地评估自身的战略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符合时代特征的国防政策与安全战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竞争进入新阶段，这种融合地理持久性与技术变革性的分析视角对于准确把握当代国际冲突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与俄乌冲突的地理基础

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演进从表面上看是当代地缘政治较量的产物，但深层分析揭示出这场冲突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描述的地理制约模式高度吻合。卡普兰强调地理因素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塑造作用，这一理论框架在理解俄乌冲突的基本逻辑时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地理环境作为最持久的战略变量，不仅限制了国家行为的选择范围，还塑造了特定区域内国家互动的基本模式。通过分析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俄乌冲突的地理基础，可以展示地理因素如何持续影响两国的战略抉择，同时为后续探讨技术变革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挑战奠定基础。

### （一）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构建与安全焦虑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源于其长期面临的地理脆弱性，集中体现在其西部边界。东欧平原缺乏明显的自然屏障，造成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反复面临西方入侵的安全困境。从拿破仑的1812年远征俄国到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这种地理脆弱性持续塑造着俄罗斯的战略焦虑。<sup>①</sup>卡普兰清晰地指出：“俄罗斯的核心安全战略始终围绕着在其西部和南部建立缓冲区，以弥补自然防御屏障的缺失。”<sup>②</sup>这一理论解释与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达的对北约东扩的担忧高度一致。他当时警告北约东扩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

<sup>①</sup> Stephen Kotkin,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 Putin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n”, *Foreign Affairs*, 2016, Vol.95, No.3, pp.2-9.

<sup>②</sup>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2, p.154.

是“降低互信水平的严重挑衅行为”。<sup>①</sup>

出于这样一种战略焦虑，乌克兰被认为在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构建中处于核心位置。所谓战略纵深，不同于单纯的缓冲地带概念，它强调的是使潜在威胁尽可能远离本土核心区域的空间距离，能为国家防御提供反应时间和回旋余地。这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分析相符。布热津斯基曾明确指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但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俄罗斯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帝国，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sup>②</sup>。这一论断不仅反映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地缘战略的关键性，也揭示了乌克兰作为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战略枢纽”的重要性。

乌克兰的地理价值还体现在其对俄罗斯海上通道的战略意义。黑海沿岸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塞瓦斯托波尔港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不冻港之一，承载着俄罗斯两个多世纪以来对温水港的持续追求。<sup>③</sup>一旦失去对乌克兰的影响力，俄罗斯在黑海的海上力量投送能力将被严重削弱，其通往地中海的战略通道也将受制于他国。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直接体现了这一地缘政治逻辑，即通过控制关键地理节点来维护其战略纵深和海上通道安全。

## （二）乌克兰的地缘结构性困境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脆弱性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其地理位置、历史演进与资源分布相互交织的结构性产物。这种结构性困境体现在三个相互强化的维度，共同塑造了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的被动处境。

第一，乌克兰处于欧亚大陆的过渡地带，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其准确描述为“多重文明交汇的边缘地带”<sup>④</sup>。这种边缘性使乌克兰长期处于地缘政治的“两不靠”状态：既不完全归属于俄罗斯文化圈，也未能完全融入欧洲文化圈。第聂伯河虽然形成了东西部的天然分界线，但

---

<sup>①</sup> Paul J. J. Welfen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Economic Challenges, Embargo Issues and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Basel: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p.22.

<sup>②</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1994, Vol.73, No.2, p.80.

<sup>③</sup> Dmitri Trenin, *What is Russia up to in the Middle East?* Hoboken: John Wiley&Sons, 2017, pp.85-112.

<sup>④</sup>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305.

其屏障效果有限，无法阻止人员、商品和思想的跨区域流动。关键是这条河流未能帮助乌克兰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认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东西部的分化，使其难以建立稳定的战略定位，长期处于被大国争夺的地缘政治脆弱状态。

第二，地理位置造成的东西分化在乌克兰内部表现尤为突出。东部和南部地区因工业化程度较高，在苏联时期与俄罗斯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整合关系，产业链深度嵌入俄罗斯经济体系之中；而西部地区则与中欧保持着深厚的历史联系，在文化和政治取向上更倾向于欧洲。<sup>①</sup>这种地理差异在政治领域形成明显投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选民政治倾向与其地理区位呈现高度正相关性。东西部的对立不仅是简单的政治分歧，而是根植于经济结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深层差异，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凝聚力。<sup>②</sup>

第三，资源地理分布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脆弱性。顿巴斯地区煤炭资源占乌克兰煤炭总产量的近90%，<sup>③</sup>其深厚的工业基础使东部地区在乌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成为俄罗斯施加影响力的关键区域。此外，乌克兰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土地资源，<sup>④</sup>这种农业价值与战略地缘位置相结合，形成了俄罗斯不可能忽视的战略利益。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意味着任何试图分割乌克兰的行为都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战略收益，这直接解释了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领土的强烈控制诉求。

这三个维度相互叠加，构成了乌克兰地缘结构性困境的完整图景：地理位置的过渡性、内部的东西分化、资源分布的战略价值，共同使得乌克兰成为大国博弈中难以自主的脆弱国家。

### （三）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初期阶段的制约效应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展示了地理因素

---

① Paul Kubicek, “Regional Polarisation in Ukraine: Public Opinion, Voting and Legislative Behaviour”, *Europe-Asia Studies*, 2000, Vol.52, No.2, pp.273-294.

②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OECD Energy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of Ukraine*, OECD,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 p.29.

④ Ivan Katchanovski, Zenon E. Kohut, Bohdan Y. Nebesio, Myroslav Yurkevic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kraine*,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13, p.17.

对现代战争的持续影响力,但这种影响需要结合俄罗斯决策层的战略误判来理解。俄罗斯军队的进攻路线选择高度符合地理合理性,主要沿几条传统战略路线展开:北线经白俄罗斯平原向基辅推进;东线穿过顿巴斯向第聂伯河延伸;南线从克里米亚向敖德萨和马里乌波尔扩展。<sup>①</sup>这些进攻路线几乎完全遵循苏联时期的军事规划逻辑,反映了东欧平原地形对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机动的基本影响。然而,俄罗斯的决策层显然低估了这场军事行动的复杂性,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充分准备,这使得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制约效应被显著放大。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阶段,地形条件对俄军作战方式的制约表现得尤为明显。开阔平原本应有利于俄军发挥装甲优势,但由于缺乏对城市战的充分准备,城市环境显著削弱了这一优势。基辅和哈尔科夫初期战役的演变证明,当俄军缺乏适当的城市作战装备和战术训练时,城市地形为防御方提供了巨大优势。同样,第聂伯河作为天然屏障,在俄军后勤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有效阻止了其在某些方向的快速推进,迫使他们集中于有限的过河点,增加了战术脆弱性。<sup>②</sup>

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更直接反映了俄军准备不足的问题。俄罗斯人有一个专门的词汇 *распутица* (春季泥泞期),用于形容冬春交替、积雪融化、道路泥泞难行的时期,该词来源于 *распутье*,有“十字路口”的意思,被译为“道路消失之时”。乌克兰人则用 *бездорожья* 一词来形容这个时节。这一泥泞季节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2022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的春季泥泞期限制了俄军装甲部队的机动性。<sup>③</sup>然而,这种限制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军没有做好应对春季泥泞的充分准备,缺乏足够的工程装备和替代机动方案,被迫主要沿硬质道路行进,从而增加了遭遇伏击的风险。

---

① Maxim Khomyakov, “Thinking of War, Facing The Catastrophe: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23, Vol.26, No.4, pp.514-526.

② Frederick W. Kagan, George Barros, Kateryna Stepanenko, “Russian Offensive Campaign Assessment, March 23”,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rch 23, 2022, <https://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russian-offensive-campaign-assessment-march-23>

③ David Hambling, “Mud Season in Ukraine Leaves Russian Tanks Stuck in Mire”, *The Guardian*, April 12,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2/apr/12/mud-season-in-ukraine-leaves-russian-tanks-stuck-in-mire>

同样，2022—2023年冬季的低温和雪况之所以显著改变了双方的作战节奏，也与俄军缺乏长期作战的后勤准备直接相关。严寒对俄乌冲突的影响不仅是自然条件的挑战，更暴露了俄军在后勤防寒准备、装备适应性、士兵训练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在此情况下，低温环境下“非战斗减员”可能超过直接战斗损失，而现代战争中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因严寒和后勤保障缺陷被部分抵消。<sup>①</sup>

地理和气候因素对俄军在战争初期的制约效应，更多是俄罗斯军队缺乏相应准备的结果，而非地理作为绝对决定因素的体现。如果俄军对长期作战有充分准备，这些地理和季节性因素虽然仍会构成挑战，但其制约程度将大为降低。这一认识对于理解地缘政治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至关重要：地理因素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为体如何认知、准备和应对这些因素。

可见，俄乌冲突的基本地理逻辑符合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预测，彰显了地理因素作为持久战略变量的重要作用。然而，冲突初期的实际进程也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地理因素的制约效应并非绝对和静态的，而是与行为体的战略准备、技术能力和决策质量密切相关。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能够完全解释这场冲突的全部方面。技术变革、信息战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以新的方式挑战和重塑地理约束的作用机制，这要求我们对卡普兰的理论框架进行必要的反思与重构。

## 二、现代技术对地理约束的突破与颠覆

作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战事，俄乌冲突为评估地缘政治理论的适用性提供了关键的经验样本。在这场持续的军事对抗中，现代技术正在以系统性的方式重新塑造传统地理因素的影响机制，对卡普兰地缘政治思想中关于地理决定论的核心假设构成直接挑战。从无人机系统到卫星通信网络，从精确打击武器到信息战工具，技术创新改变战争地理维度的方式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这一基本判断虽非首创，但俄乌冲突提供的

---

<sup>①</sup> Liāna Plavina, “Is the Cold Friend or Enemy for Soldiers in Military Action?” 16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Rur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Personality, *Latvia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2023, Vol.16, pp.29-34.

鲜活案例，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技术变量在地缘政治方程中权重的实质性变化。

### （一）侦察与打击系统对地理屏障的跨越

河流、山脉、森林乃至城市地形等地理屏障，在传统战争中构成国家防御的天然基础。卡普兰在《地理的复仇》中系统阐述了这些自然屏障如何塑造国家安全边界与军事战略选择。<sup>①</sup>然而，俄乌冲突中新型侦察与打击系统的广泛应用，正在削弱这些地理屏障的战略价值。

无人机系统的大规模运用，标志着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质变。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约三分之二的俄军损失与乌克兰无人机有关。<sup>②</sup>而土耳其研发的 Bayraktar TB2 无人机在冲突初期显著提升了乌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特别是在基辅保卫战中，乌军借助 TB2 的实时侦察能力精确摧毁了俄军的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坦克和装甲车辆，有效抵消了俄军在重型装备上的数量优势。<sup>③</sup>更具颠覆性的是商业无人机的军事化改造。乌克兰军队日均投入上百架各类无人机执行侦察与打击任务，配备人工智能自动目标识别系统的无人平台将有效识别距离从传统的 300 米扩展至战斗环境下的平均 1 公里，最佳条件下可达 2 公里。这意味着任何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几乎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sup>④</sup>传统意义上依靠地形掩护实现的战术隐蔽性已被技术手段大幅削弱，直接挑战了卡普兰关于地理隐蔽性作为军事优势来源的核心论断。

与此同时，卫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进一步消解了地形优势的战略价值。SpaceX 提供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为乌克兰构建了抗毁性极强的通信网络，即使传统通信基础设施遭到系统性破坏，乌军仍能维持有效的指挥控制链条。截至 2025 年 4 月，超过 50000 个星链终端在乌克兰境内

---

①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2.

② “Tech Can Give Europe More Bang for Defence Buck”, *Reuters*, May 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reakingviews/tech-can-give-europe-more-bang-defence-buck-2025-05-08>

③ Kieran Corcoran, “Ukraine Credits Turkish Drones with Eviscerating Russian Tanks and Armor in Their First Use in a Major Conflict”, *Business Insider*, March 1, 202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kraine-hypes-bayraktar-drone-as-videos-show-destroyed-russia-tanks-2022-2-2>

④ Kateryna Bondar, *Ukraine’s Future Vision and Current Capabilities for Waging AI-Enabled Autonomous Warfare*, CSIS Wadhwani AI Center, March 2025, p.2.

运行，其中 29500 个由波兰提供，形成了覆盖战场各区域的通信网络。<sup>①</sup>商业卫星情报的战略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美国全球通信和信息公司 Maxar 的卫星图像，在冲突初期准确揭示了俄军在乌克兰边境大规模集结的态势，以及后续在基辅郊区布查（Bucha）的军事行动细节。这些信息不仅直接影响了军事决策，更通过国际传播塑造了全球舆论格局。<sup>②</sup>这种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使传统军事学说中依托地理掩护实现战略突然性的可能性大幅降低，战争规划必须适应持续暴露于多源监视之下的新常态。

## （二）战略纵深概念的转变

战略纵深，即国家领土的空间深度作为消解和削弱敌方攻势的缓冲区，构成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俄罗斯国防战略的历史基石。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深受其历史上安全脆弱感的形塑，对周边威胁的高度警觉转化为对战略纵深的特殊依赖。<sup>③</sup>这种地缘政治认知，驱使俄方在感知安全挑战时优先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姿态，试图通过主动出击确保国土安全与维护区域影响力，而非被动等待威胁逼近。战略纵深在俄罗斯安全框架中的核心地位，解释了其为何持续将周边国家视为必要的缓冲区，并在这些区域积极投射力量。然而，俄乌冲突揭示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概念的实际效用。

M142 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的部署案例集中体现了这一转变。自 2022 年 6 月引入乌克兰战场以来，M142 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依靠其约 80 公里的有效射程和精确打击能力，系统性地切断了后勤补给线，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sup>④</sup>据美国国防部评估，截至 2022 年 9 月，乌军使用不到 20 套 M142 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成功摧毁了俄军超过 400 个高价值目标，包括弹药库、

---

<sup>①</sup> “Ukraine Receives Additional 5,000 Starlink Terminals from Poland”，RBC-Ukraine，April 3, 2025, <https://newsukraine.rbc.ua/news/zelenskyy-names-the-only-way-to-return-part-1743694118.html>

<sup>②</sup> Malachy Browne, David Botti, Haley Willis, “Satellite images show bodies lay in Bucha for weeks, despite Russian claims”，*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04/world/europe/bucha-ukraine-bodies.html>

<sup>③</sup> 徐舒悦：“俄罗斯安全思维的特征、本质与演进——基于战略文化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87 页。

<sup>④</sup> “Ukraine: What are Himars missiles and are they changing the war?” BBC, August 30,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62512681>

指挥所和关键补给节点。<sup>①</sup>这一战果直接质疑了传统战略纵深的防护价值，即使俄罗斯辽阔的领土提供了地理纵深，也无法充分保护其军事资产免受精确打击。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目标的打击能力更具标志性意义。通过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系统，乌克兰方面不仅能够突破数百公里的地理屏障袭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核心城市的能源设施与军事基地，甚至直接威胁到距离前线超过 1000 公里的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迫使俄方防空系统在如此遥远的腹地拦截来袭无人机。<sup>②</sup>这种打击纵深的显著扩展表明，无人机技术正在消解传统的战略纵深防御概念。即使作为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国家，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也无法完全保障关键资产的安全，地理位置极为遥远的后方区域同样暴露在打击和威胁之下。这迫使战略规划必须重新评估地缘空间在现代冲突中的防护价值，与卡普兰强调的地理空间作为安全屏障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战略领域，信息空间构成了卡普兰理论中相对欠缺的维度，其在俄乌冲突中的作用需要专门论述。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已然超越传统“心脏地带”理论的地理框架，形成了一个不受物理边界约束的新型对抗场域。根据 2023 年微软的网络安全报告，俄乌冲突已经成为网络战的“实战试验场”，俄罗斯通过高频破坏性攻击、间谍活动与信息操纵的三重组合，试图削弱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抵抗能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络攻击在战争初期最为密集，近 50% 的破坏性攻击发生在战争的前六周，此后虽然攻击频率有所下降，但转变为更持久的间谍活动和针对性行动。<sup>③</sup>这些攻击完全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显示网络空间已在实质上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中的物理约束。

乌克兰在信息战领域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其成功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

---

<sup>①</sup> “Ukraine Has Struck More Than 400 Russian Targets with HIMARS - U.S. Top General”, *Reuters*, September 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kraine-has-struck-more-than-400-russian-targets-with-himars-us-top-general-2022-09-08>

<sup>②</sup> “Ukrainian Drones Strike Deep into Russian Territory, Hundreds of Miles from The Front Line”,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21,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war-drones-kazan-d235822b758fd4f3540270bc324a7b77>

<sup>③</sup> *Microsoft Digital Defense Report: Building and Improving Cyber Resilience*, 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 October 2023, p.48.

外交，将本国叙事传播至全球，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持续的军事援助。这种信息影响力突破了地理隔离，成为削弱俄罗斯军事优势的关键杠杆。<sup>①</sup>俄军部署远程无人机实施纵深打击，乌军则发展激光反无人机等新型防御手段，这些技术对抗的案例共同说明：技术革新正在系统性地消解地理距离的战略价值，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距离提供安全”的基本假设面临根本性挑战。<sup>②</sup>

### （三）技术赋能对军事不对称性的改变

技术创新对地缘政治最深远的影响，或许体现在其如何重构国家间力量不对称的传统模式。乌克兰作为领土和人口均明显小于俄罗斯的国家，通过技术路径寻求平衡军事差距的战略实践，对卡普兰理论中关于国家实力与地理规模正相关的假设构成挑战。

乌克兰的技术适应性战略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是“弱者的武器”的典型表现。<sup>③</sup>俄乌冲突爆发三年多来，乌克兰迅速建立了军民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其国防科技产业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转型。该国战前积累的IT产业优势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大量科技企业和技术人才迅速转向军事技术研发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无人机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从2021年仅有个位数企业涉足该领域，到2023年已形成数百家企业的产业集群。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FPV无人机采购计划达450万架，较2023年增长超过100%。<sup>④</sup>这种本土军工产能的快速扩张不仅提升了国防自主能力、减少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同时，其创新速度远超传统军事发展周期，使乌克兰在技术层面部分抵消了俄罗斯在装甲部队和炮兵领域的传统优势，同时重塑了其在全球防务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

西方军事技术转移对战场均势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自2022年2月冲

---

① “Ukraine’s Win Against Russia’s Information War”, *IREX*, October 2, 2023, <https://www.irex.org/insight/ukraines-win-against-russias-information-war>

② 薄荣康：“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网络时代的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2期，第141—159页。

③ 潘玥：“地缘政治争端与‘弱者的武器’：案例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年第4期，第25—26页。

④ David Kirichenko, “Ukraine’s Innovative Defense Tech Sector Is the Country’s Trump Card”, *Atlantic Council*, March 13,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ukraines-innovative-defense-tech-sector-is-the-countrys-trump-card/>.

突爆发以来，美国通过五项援助法案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1750 亿美元援助，其中 1280 亿美元直接用于乌克兰政府，主要投向军事支持领域，使乌克兰成为二战后获得美国最大援助的欧洲国家。2024 年，美国还通过冻结俄罗斯资产利息向乌克兰提供了 200 亿美元贷款。同时，约 470 亿美元援助资金被用于美国本土国防制造业以补充援乌后的武器库存，体现出援乌政策的复杂动机。<sup>①</sup>2025 年年初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对乌援助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反映出西方内部战略分歧的扩大。这些援助不仅直接提高了乌克兰的作战能力，而且，它们通过技术赋能减弱了地理因素在战场上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提供的射程 322 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和反炮兵雷达系统，使乌军获得纵深打击能力和实时反制敌方炮兵的优势，<sup>②</sup>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俄军在地形利用上的优势。

开源情报（OSINT）与社交媒体在冲突中的角色是卡普兰理论完全无法预见的新现象。开源情报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三重关键作用：一是通过卫星图像和社交媒体实时追踪俄军动向，显著提高了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二是基于视觉证据进行装备损失统计，荷兰开源情报分析项目“奥赖克斯”（Oryx）等因其基于社交媒体视觉证据和开源情报的物资损失统计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些数据被 BBC、路透社等百余家国际媒体引用，成为冲突研究的重要基础；<sup>③</sup>三是为战争实际状况提供证据支撑。这种去中心化的情报收集方式打破了传统军事强国的信息垄断，重构了地理因素对情报获取的制约关系。然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开源情报也引发了伦理争议，包括传播暴力图像和可能泄露军事敏感信息的风险，反映出技术赋能带来的复杂性。

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正在侵蚀传统军事优势的持久性。俄乌冲突中的电子战技术迭代是典型案例。双方在无人机对抗领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战术

---

① Jonathan Masters and Will Merrow, “Here’s How Much 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nt Ukrain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1, 2025, <https://www.cfr.org/article/how-much-us-aid-going-ukraine>

② “The US Secretly Sent Long-Range ATACMS to Ukraine – and Kyiv Used Them”, *Politico*, April 24,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4/24/us-long-range-missiles-ukraine-00154110>

③ “Open-source Data Shows Russia’s Equipment Losses in Ukraine Reached a Two-Year High in October”, *Meduza*, November 5, 2024, <https://meduza.io/en/feature/2024/11/05/open-source-data-shows-russia-s-equipment-losses-in-ukraine-reached-a-two-year-high-in-october>

适应性：乌克兰通过快速部署数百套 EDM4S 反无人机步枪等便携式干扰设备，配合分布式电子战网络，形成了针对商用无人机的有效防御体系，其技术更新周期已经缩短至 3 到 6 个月，特别是采用每秒 25 次跳频的无人机技术，显著提升了战场生存能力。<sup>①</sup>相比之下，俄罗斯传统电子战系统虽具备强大的干扰能力，但因设计针对高端军事装备，在面对低成本、高灵活性的无人机威胁时反而反应滞后。这种对抗态势凸显出现代电子战已从单纯的技术优势竞争，转向体系灵活性与迭代速度的综合较量。这种快速创新削弱了地理优势的长期可靠性，因为技术适应能力可能比地理条件的战略利用更具决定性。

俄乌冲突中的技术应用正在多层面上挑战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假设，表明在当代战争中，技术因素的战略重要性正在部分超越地理因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理已完全失去意义，而是需要在技术与地理的动态互动中重新理解地缘政治的运作逻辑。

### 三、地理约束与技术能力的辩证关系

作为 21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大规模战争，俄乌冲突成为检视地理因素与技术能力相互关系的绝佳案例。从地理约束的持久性、技术能力的差异化影响以及两者互构的复合体系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能够揭示这场冲突对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挑战与启示。

#### （一）地理因素的持久影响

尽管现代技术发展迅猛，但俄乌冲突表明，地理因素仍然对军事行动有着不可忽视的约束。这些约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空间对军事行动效率的影响，二是资源地理分布对战略目标设定的制约。

在物理空间方面，俄军在 2022 年 2 月行动初期所面临的后勤困境尤为典型。俄军围攻基辅时，车队长达 64.3 公里，补给线的过度延伸暴露出致命弱点。乌军在前线抵抗的同时，对后方车队持续袭扰，使俄军补给运输遭

---

<sup>①</sup> “The Invisible Russia-Ukraine Battlefield”, *Wired*, December 23, 2024, <https://www.wired.com/story/electronic-warfare-russia-ukraine>

受重大打击。<sup>①</sup>关键道路桥梁被毁后得不到及时抢修，许多装甲车辆因燃油短缺被随意丢弃。这一地理距离造成的补给困难，直接导致俄军坦克和装甲车辆在距离基辅仅 40 公里处被迫停滞，此后二十多天也未能展开大规模作战行动。<sup>②</sup>这一案例清楚地表明，即使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物理距离和地理空间仍然对军事行动构成根本性制约。

能源地理分布与传输路线同样体现了地理因素的持久影响力。2021 年，俄罗斯作为欧盟最大的单一天然气供应方，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了 1524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约 27.4% 经由乌克兰过境。然而，2022 年 2 月冲突升级后，俄罗斯对欧输气量呈现断崖式下跌，至 2024 年输气总量已骤降至 232 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仍占俄对欧管道天然气出口总量的约 50%，凸显乌克兰作为关键能源通道的战略地位。<sup>③</sup>这一数据变化，既反映了地缘政治冲突对能源贸易的直接冲击，也揭示了欧洲能源供应格局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欧洲能源危机的爆发反映出能源供应对地理位置的深度依赖。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使其在对俄制裁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这种“管道政治”现象印证了卡普兰的论断——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及其运输路线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变量。

领土控制作为战争最终目标的重要性也未因技术进步而减弱。俄乌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着对顿巴斯地区、克里米亚半岛等特定地理区域的控制权争夺。这些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如顿巴斯的工业基础和克里米亚的黑海出海口，还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和民族认同内涵。人口地理分布对政治控制的重要性也在冲突中得到凸显。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受俄罗斯影响较深，该地区使用俄语的比例超过 70%，这一人口地理特征成为俄罗斯宣称“保护俄语人口”的借口之一。这些案例表明，领土和人口的地理分布仍然是地缘政治冲突的核心驱动因素。

---

① 徐侃：“俄乌冲突中的俄军物资储供保障问题及对我军的启示”，《中国军转民》，2024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② “Ukraine: Why Has Russia’s 64km Convoy Near Kyiv Stopped Moving?” BBC, March 3,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0596629>

③ “俄罗斯输欧天然气‘断供’！俄乌欧‘三输’，美国坐收渔利”，中国日报网，2025 年 1 月 5 日, <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501/05/WS677a246fa310b59111dac761.html>

## （二）技术能力的差异化影响

虽然地理因素保持着基础性影响，但技术能力的差异化应用确实正在改变地缘政治的某些传统逻辑。在俄乌冲突中，技术应用的不均衡性及其战略后果尤为明显。

技术应用的不均衡性首先体现在双方对精确打击能力的掌握差异上。乌克兰利用西方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sup>①</sup>精准打击俄军后方的弹药库、指挥中心和交通枢纽等关键目标，有效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延缓了俄军的进攻速度，并曾在战场上一度获得主动。相比之下，俄罗斯在精确打击能力上存在明显缺陷。尽管俄军拥有大量弹药和远程火力，但在目标选定和打击效率方面表现不理想。俄军目标选定人员普遍存在优先级错配问题，宝贵的“伊斯坎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被用于打击小股部队集结点，而针对大型机场的打击编组仅包含少量巡航导弹。<sup>②</sup>这种技术能力差距使得乌克兰能够更加精准地打击俄军后勤节点和指挥中心，部分抵消了俄方在常规兵力上的优势。

然而，技术对地理条件的突破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乌克兰地理多样性在冲突中演变为多模态作战场景：敖德萨的无人机火海与顿巴斯的战壕对峙并存，印证了技术变革使单一地理空间呈现出碎片化的战争形态。<sup>③</sup>在城市战等特定地理环境中，技术优势的效果往往被大幅削弱。马里乌波尔围城战就是典型案例。尽管俄军拥有火力与空中优势，乌克兰“亚速营”仍依托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地形展开顽强抵抗。该部队利用亚速钢铁厂最深达6层的多层次地下工事和部分混凝土掩体厚达4米的坚固厂房构建防御体系，通过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实施机动防御。城市环境极大削弱了俄军的重火力优势，迫使俄军转入逐楼争夺的消耗战。虽然俄军最终完成了合围并切断了补给线，但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围城战凸显了，在现代城市巷战中防御方依托预设工事

① “乌首次承认利用西方武器越境攻击俄目标”，新华网，2024年8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pro/20240823/fb630e6f34b44b90a761285de8fd8f9c/c.html>

② “战火下的适应性转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杀伤链规模、速度与精度升级”，搜狐网，2025年5月3日，[https://www.sohu.com/a/891586732\\_358040](https://www.sohu.com/a/891586732_358040)

③ 弗拉基米尔·舍洛夫-伊格纳季耶夫、班婕：“俄罗斯地区：地理多样性、外贸开放度以及制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4期，第182-200页。

和地形优势所能形成的持久防御能力。<sup>①</sup>在城市战环境中，进攻方通常需要 5:1 甚至更高的兵力优势才能取得成功，而在开阔地形作战，这一比例约为 3:1。<sup>②</sup>这表明，在特定地理条件下，技术优势的效果会受到显著限制，传统的地理约束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三）地理-技术互构的复合体系

俄乌冲突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启示是，地理因素与技术能力已经形成了相互嵌套、彼此影响的复合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要求我们超越卡普兰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框架进行重新理解。俄乌的文明断层线在数字化战场中被重新编码，俄裔聚居区的空间聚集特征与地理空间情报（GEOINT）的热力图分析高度重合，形成了“地理-数字”的双重边疆。<sup>③</sup>

地理因素与技术能力相互作用的机制首先体现在适应性战略调整上。乌克兰军队针对其领土面积小、战略纵深不足的地理劣势，采取了“分散化、机动化、网络化”的技术适应策略。具体而言，乌军采用小型、分散的作战单元，配合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在保持网络化指挥的同时降低了集中打击的风险。根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评估，这种战术调整使乌军成功规避了俄军的火力优势，并利用前者对本土地理环境的熟悉程度实施了多次有效的反击行动。这种战略创新本质上是将地理劣势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战术优势的尝试。<sup>④</sup>

俄乌双方对地理-技术关系认识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战略效果。俄军在战争初期过于依赖技术优势，忽视了乌克兰地形条件的特殊性，特别是春季泥泞期对重型装备机动性的严重限制。<sup>⑤</sup>这一战略误判导致俄军在 2022 年 2

---

① 肖东风、柳玉鹏、陈山：“‘马里乌波尔围城战’持续近两个月，现代城市巷战为什么这么难”，《环球时报》，2022 年 4 月 19 日第 8 版。

② Louis DiMarco, “Urban Operations in Ukraine: Size, Ratios, And the Principles of War”, Modern War Institute, June 20, 2022, <https://mwi.westpoint.edu/urban-operations-in-ukraine-size-ratios-and-the-principles-of-war>

③ 方亮：“二元结构与本土立场：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视野下的文明断层线与乌克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59-82 页。

④ Michael T. Hackett, John A. Nagl, “A Long, Hard Year: Russia-Ukraine War Lessons Learned 2023”, US Army War College, August 29, 2024, <https://publications.armywarcollege.edu/News/Display/Article/3890256/a-long-hard-year-russia-ukraine-war-lessons-learned-2023>

⑤ Seth G. Jones, Alexander Palmer, Joseph S. Bermudez Jr., *Ukraine's Offensive Operations: Shifting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CSIS Briefs, June 9, 2023, p.2.

月至3月间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辆陷入泥泞，无法按计划推进。相比之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战略规划更加注重地理与技术的结合。乌军充分利用第聂伯河作为天然防线，在关键河流沿岸部署反坦克导弹系统，形成了技术与地理优势的有效结合。这种差异表明，对地理-技术复合体系的深刻理解已成为决定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

地理-技术复合体系的形成还体现在防御性基础设施的新型构建方式上。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强调边界防御和缓冲区，而俄乌冲突展示了技术赋能下的新型防御概念。截至2023年年底，乌军已经建立了超过3000公里的战壕和防御工事，<sup>①</sup>但与传统防线不同的是，这些防御体系深度整合了电子战、无人机侦察和精确火力打击能力。俄罗斯则在占领区构建了“苏罗维金防线”多层次防御体系，该体系结合了传统的反坦克壕沟、混凝土“龙牙”障碍物与现代传感器网络和电子战系统。<sup>②</sup>这种防御概念的演变表明，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已经与技术应用深度融合，并促进了新型地缘战略考量因素的形成。

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制约，而俄乌冲突的实践表明，这一理论需要通过引入技术能力作为关键变量进行扩展。地理因素与技术能力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动态平衡的复合体系。这一体系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地理决定论”，也不能过分夸大技术的革命性作用。在这一复合体系中，地理因素仍然提供基础约束条件，而技术能力则决定了行为体如何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战略效益。两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理解当代地缘政治冲突的新分析框架。

#### 四、地缘政治理论的修正与发展方向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也使现代地缘政治理论面临深刻的挑战。我们将系统评估卡普兰理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

---

<sup>①</sup> “Trenches, Logs and Concrete: The Ukrainian General Staff Showe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tifications”, *Top War*, December 21, 2023, <https://en.topwar.ru/232746-okopy-brevna-i-beton-ukrainskij-genshtab-pokazal-vozvedenie-fortifikacij.html>

<sup>②</sup> 吴大辉：“乌克兰危机与新军事革命：‘龙牙防线’篇”，《世界知识》，2024年第2期，第72-73页。

适应性，探索地缘政治理论的整合性发展路径，并分析由此产生的政策与战略含义。

### （一）卡普兰理论的现实适应性评估

卡普兰坚称地理因素始终是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力量，而非暂时性变量。然而，俄乌冲突的实践正在挑战这一命题，揭示出技术进步是如何改变地理因素的作用方式与影响强度的。第聂伯河作为乌克兰东部的天然屏障，在卡普兰理论框架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在现代军事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一地理障碍的防御效能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俄军通过先进渡河装备与电子战系统，在多处实现了对这一自然障碍的突破。这一事实表明，地理障碍的战略价值愈发取决于对抗双方技术能力的相对差距，而非地理条件本身的物理特征。

同样值得反思的是对平原地形军事价值的传统评估。按照卡普兰的地缘政治视角，乌克兰的广袤平原应为机械化部队提供理想的机动空间。然而，无人机侦察系统与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应用，反而使开阔地形成了现代战场的高风险区域。数据显示，俄军在开阔地形中的装甲损失率显著高于城市和森林地区，部分部队的装甲车辆损失率高达 90%，<sup>①</sup>这直接挑战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地形军事价值的基本判断。

同时，地理因素在不同战争阶段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冲突初期，地理距离与后勤线拉长导致俄军北线攻势受挫，印证了“战略纵深”的经典地缘政治逻辑。但随着冲突演变为持久战，技术因素对地理约束的突破日益明显：高超音速导弹、远程无人机与电子战系统使双方能够跨越传统地理障碍实施打击，战场边界日趋模糊。这种动态变化表明，卡普兰理论虽然在短期冲突的某些维度能保持解释力，但其对技术变量重视不足的理论局限在长期冲突中变得愈发明显。

俄乌冲突的战争实践表明，地理因素仍然重要，但其作用方式正在由静态约束转向动态影响，技术进步正在重塑地理约束的边界与强度。因此，当代地缘政治理论需要超越单一的地理分析框架，构建一个能够兼顾地理持久

---

<sup>①</sup> “Scooters, Bikes, Cars and Golf Carts Now Account for 90% of Russian Losses”, *Trench Art*, May 1, 2025, <https://www.trenchart.us/p/scooters-bikes-cars-and-golf-carts>

性与技术变革性的综合分析体系。

## （二）地缘政治理论的整合性发展路径

面对俄乌冲突揭示的理论挑战，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在保留地理核心地位的同时，将技术因素作为关键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技术因素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技术对地理障碍的直接跨越能力，如高超音速武器对防空识别区的穿透；二是技术对地理空间感知方式的改变，如卫星监视与数字地图技术；三是技术对地理资源价值的重新定义，如能源革命改变对传统资源的依赖。在俄乌冲突中，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为乌军提供了稳定通信，有效克服了地理分散性带来的指挥协调困难。这表明技术不仅是突破地理约束的工具，更是重塑地理意义的核心变量。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概念：地理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实际影响，越来越依赖于冲突各方的技术能力来实现。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技术转化能力决定了地理条件能否转化为战略优势。具体而言，技术转化能力包括三个内生维度：技术获取能力（通过自主研发或外部援助获得先进技术）、技术适配能力（将技术有效应用于特定地理环境）、技术对抗能力（相对于对手的技术优势）。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了地理条件的战略效能。以乌克兰为例，其通过西方技术援助增强了技术获取能力，通过本土化改进提升了技术适配能力，通过灵活战术运用强化了技术对抗能力，从而在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仍能有效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这一框架既保留了地理因素的基础地位，又纳入了技术变量的动态调节作用，避免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倾向。

从比较案例来看，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也展现了类似特征。卡拉巴赫山区地形本应有利于防守方亚美尼亚，但阿塞拜疆通过土耳其和以色列提供的先进无人机系统成功突破了山地防线。这与俄乌冲突中技术对地理约束的突破极为相似，进一步证实了整合性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然而，技术对地理的重构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与条件依赖性。在俄乌冲突中，冬季极端气候条件仍然显著限制了双方的军事行动能力，即使拥有先进技术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体现了地理环境作为战争基础约束的持续性。与此同时，无人机技术虽然能够突破山地障碍，却在城市作战中因建筑物遮

蔽而效能下降；精确制导武器可以跨越距离实施打击，但仍需要稳定的情报支持和后勤保障体系。此外，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也表明，无人机技术和外部援助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终胜负仍取决于地面部队的控制能力。<sup>①</sup>这种辩证关系揭示了一条关键规律，即技术能够改变地理约束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度，但无法消除地理因素作为战争物质基础的根本地位；技术优势可以放大或补偿地理优劣势，但其效能始终受制于特定地理条件与战争形态。

### （三）政策与战略含义

地缘战略需要进行技术调适，重新平衡物理空间控制与技术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传统领土缓冲区价值正在相对下降，而技术赋能的监控、打击与防御能力则日益重要。俄罗斯在冲突中过度强调领土控制而忽视信息域与电磁频谱域争夺的教训尤为突出，其战术挫折与电子战、信息战准备不足直接相关。这表明大国需要超越传统地缘思维，构建将地理空间与技术空间视为同等重要战略场域的多域融合安全战略。

与此同时，技术赋能为弱小国家提供了突破地理劣势的新选择。乌克兰作为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通过西方技术支持和本土创新，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俄罗斯的地理优势。这启示地理弱势国家应优先发展能够放大自身有限资源效能的非对称技术，构建基于技术优势的国防体系，而非仅依赖传统地理防御。

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地理-技术动态平衡的变化正在重塑全球力量投射模式。先进技术大幅降低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距离衰减率”，这意味着大国竞争的地理边界正在扩展。因此，国际安全治理需要重新审视安全边界的界定方式，将技术连通性与地理毗邻性同等看待。

俄乌冲突清晰地表明，地缘政治理论需要从静态的地理分析向动态的地理-技术互动模型转型。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虽然仍具有基础价值，但需要通过纳入技术变量进行系统性修正，才能为 21 世纪的国际冲突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

<sup>①</sup> Alexander Stronell, “Learning the Lessons of Nagorno-Karabakh the Russian Wa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10, 2021,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1/03/lessons-of-nagorno-karabakh>

## 五、结 论

俄乌冲突作为一场横跨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型地缘冲突，既验证了地理因素的持久重要性，又展示了技术对地理约束的选择性突破。我们选择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系统考察了地理因素与技术变革在这场冲突中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这一核心概念，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需要说明的是，卡普兰理论作为当代地缘政治学说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对地理因素的强调具有典型性，但并不能完全代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全部观点。我们的分析过程主要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对卡普兰理论的检视，希望可以推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理论反思。

地理因素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呈现出延续与变革的双重特征。从延续性看，东乌克兰平原的开阔地形影响着军事行动节奏，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出海口仍是战略争夺焦点，顿巴斯地区的资源禀赋继续影响着各方战略考量。这些现象印证了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选择的约束作用。从变革性看，网络战、卫星通信系统和远程精确打击等现代技术手段正在改变地理空间的传统意义。信息技术使军事决策摆脱了传统地理信息收集的限制，大数据分析使战场态势感知超越了物理距离的限制，而星链系统则部分化解了通信受地理环境限制的难题。然而，这种变革并非全面且均质，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网络空间的地理无关性与物资补给线受地理条件影响的持续性并存，电子战对传统侦察手段的替代与阵地战中地形地貌重要性的延续并存。这表明，技术变革使地理因素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作用机制更加多元，但并未消解其根本重要性。

本研究提出的“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概念，强调地理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实际影响越来越依赖于冲突各方的技术转化能力。这一能力包括技术获取、技术适配和技术对抗三个内生维度，它们共同决定了地理条件能否转化为战略优势。俄乌冲突的实践表明，技术转化能力的差异直接影响地理约束的实际效力：乌克兰通过西方技术援助和本土创新，在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仍能有效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而俄罗斯尽管拥有地理优势，却因技

术适配能力不足而未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代国际冲突中地理与技术的复杂互动，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基于此，地缘政治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应是整合而非替代。既需要保留对地理因素基础性作用的核心洞见，又需要纳入技术变革对地理约束选择性突破的新视角；既要关注传统地理空间，又要重视信息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意义；既要分析物理距离的持续影响，也要研究连通性、数据主权等新型地缘政治概念。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技术如何重塑地理效应的内在机制，以及不同区域、不同技术条件下地理约束的差异化表现，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具解释力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

**【Abstract】**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ffers a distinctive lens through which to reassess Robert D. Kaplan's geopolitical theory.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modern technological power revealed in the conflict highlights new dynamics of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on a digitized battlefield and challenges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e terr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nbas region,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the Crimean Peninsula, and the Dnieper River's role as a natural barrier continue to profoundly shape the course of the war. The open terrain of eastern Ukraine's plains facilitates mechanized maneuver, while dense urban areas serve as bastions of resistance, corroborating Kaplan's core proposition that geographic forms constrain military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reshap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eography matters. Cyber warfare can strike across physical distance; Starlink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effectively circumvent traditional signal jamming; and drone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 systems enhance the power-projection capabilities of smaller states, giving traditional geographic barriers a new feature of "selective permeability". Technology has thu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altering geopolitical balances. While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elements, such as terrain, distance, and resources, remain important, their modes of influence are being reconfigured by technology. Technology can both reinforce certain geographic advantages and weaken particular geographic limitations, producing "technology-mediated geographical effects". For major powers, geostrategy needs to re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ol of physical spa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For relatively weaker state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fers new options for overcoming geographic disadvantages. At the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hifts in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geography and technology will reshape patterns of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Key Words】** Geopolitical Theor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eographical

### Constraints,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Kaplan's Geopolitical Theory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уникаль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для переосмысливания geopol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Каплана. Слож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ощи в конфликте выявляет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 цифровом поле боя, бросая вызов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geopol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ельефа Донбасс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рым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и роль Днепра как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барьера продолжают оказывать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ход войны. Открытая местность равнин на востоке Украины облегчает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ых войск,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густонаселённые городские районы служат опор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одтвержда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Каплана о том, ч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военные операции. Однак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меняют механизм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ибервойна может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ы на больших физических расстояниях, спутни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вязи Starlink эффективно обходит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помехи сигнала, 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и и системы высокоточ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расширя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оецирования силы мал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ридава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барьерам новую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я стала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изменения geopolитического баланса. Важнос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таких как рельеф, расстояние и ресурсы,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о механизмы их действия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технологий. Технология может как усиливать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так и ослаблять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оздава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 опосредованны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эффект». Для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требует пе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к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онтролем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наращиванием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дл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олее слабых стран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едлагает новый вариант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ом балансе между географией и технологией изменят глобальную модель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сил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Каплана

---

(责任编辑 崔 玘)

# 地缘战略新变化与美国的“新疆界”

王英伦 李 航\*

**【内容提要】**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和全球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力正面临严峻挑战。当代国际博弈的核心从对传统地理空间的物理占领，转向对技术、资源、规则等多维战略支点的控制权争夺。战略支点的价值已从单一军事属性演化为“军事-经济-技术”复合体，而其控制方式也正向“规则主导”转型。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新疆界”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领土边界，而是扩展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链、太空轨道、海底光缆、网络根服务器以及前沿技术标准等有形与无形的领域。关键矿产和无形疆域是美国界定其国家利益“新疆界”的两大重要方向。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通过“去风险化”战略推动全球供应链重塑，力图降低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这使得中亚地区上演新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南美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矿产三难”困境不断凸显。在无形疆域中，美国既操弄“天缘政治”概念争夺太空制高点，又大力推动“网权”博弈，使得地缘政治竞争的权力疆域扩展到太空和数字空间。理解并适应地缘战略支点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是各国在新时代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

**【关键词】**地缘政治 战略支点 美国新疆界 关键矿产 天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048(21)

当今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驱动着地缘政治博弈逻辑的根本性重塑。从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到杜黑的空权论，这些塑造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其核心内容都是争夺特定地理空间的控制权。<sup>①</sup>然而，在全

\* 王英伦，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李航，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① Alfred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 Vol.23, No.4, pp.421-437;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trans. Dino Ferrari,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8.

球化、信息化与技术化的浪潮面前，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在面对一个由陆、海、空、天、网等构成的多维博弈空间时，开始显得捉襟见肘。经典理论诞生于工业时代，分析单位是主权国家，分析场域是二维地理平面，目标是进行领土控制，这已无法完全应对数字和太空时代的复杂格局。

历史规律的发展演变表明，战略支点的价值已经从单一军事属性向“军事-经济-技术”复合体转型，控制方式从物理占领转向规则主导。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当前地缘战略的新变化提供了核心的理论透镜。传统的运河、海峡、军事基地仍然重要，但其战略价值正日益受到芯片工厂、海底光缆节点、卫星星座轨道乃至国际技术标准等无形支点的挑战与替代。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再仅仅通过陆军规模或海军吨位来衡量，更要看其能否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实现领先并制定标准，能否确保数据流动的安全，以及能否在近地轨道拥有“交通管理权”等。<sup>①</sup>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美国的“新疆界”（New Frontiers）概念<sup>②</sup>正在被重新定义。特朗普政府所展现的“美国优先”姿态，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战术性调整，而是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美国对其国家利益边界的重新认知。这条新疆界，不局限于美墨边境的实体墙，而是延伸至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对近地轨道的优先使用权、对全球数据流动的监控能力，以及对未来技术（如 6G）标准制定的主导权等。美国正试图通过控制这些新的战略支点，来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维护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这是从领土安全向体系安全的观念转变，<sup>③</sup>其防御和进攻的场域日趋全球化和数字化。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全球地缘战略支点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美

---

① “交通管理权”在此处为比喻性说法，指对卫星轨道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监管能力。See Joan Johnson-Freese, *Space as a Strategic Ass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65-88.

② “新疆界”概念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Kennedy）提出的纲领性口号，宣称要“探索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征服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实质是增强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为美国在全球争霸乃至宇宙空间扩张奠定基础。在当代，“新疆界”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比喻）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并应用到了 21 世纪的新挑战和新竞争领域。其核心内涵——对未知、高风险、高回报领域的探索和主导权的争夺——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但焦点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

③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0, Vol.105, No.2, pp.177-192.

国的“新疆界”呈现出哪些新特征，美国如何围绕这些新的疆界展开全球布局与博弈，处于博弈前沿的资源富集国家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抉择？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回顾战略支点的理论演变；接着剖析关键矿产和无形疆域这两个美国新疆界的核心方向，并结合中亚和南美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本文内容加以总结，揭示美国新疆界战略的本质意涵。

## 一、战略支点的历史演变与理论革新

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识别并控制那些能够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支点。这些支点的性质与形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而不断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具有范式意义的阶段，清晰地勾勒出地缘博弈焦点从二维平面向多维空间跃迁的轨迹。

### （一）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的陆海争霸

第一阶段始于 19 世纪，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核心是陆权与海权的二元对立。马汉的海权论强调，通过控制关键的海上通道，便能主宰全球贸易与军事投送。与此理论相呼应，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等地成为帝国竞逐的焦点。这些通道如同全球体系的咽喉，一旦被某国控制，便意味着该国掌握了制约他国经济命脉与军事机动能力的战略杠杆。英国通过扼守直布罗陀海峡，既可以对通过该水道的敌军舰队进行打击，又能顺畅地开展自身的对外贸易。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也是海权支点价值的经典体现。1875 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出售给英国，英国随后出兵控制运河区和整个埃及，就此取得了对该运河近一个世纪的控制权。苏伊士运河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据统计，在运河通航的第一年，在通过运河的 489 条船中有英国船 324 条，占总数的 66%，通过运河的货物吨位 43.7 万吨，其中英国货物 29.1 万吨，也占总数的 66%，英国凭借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商船和对外贸易的优势，在运河道路上独领风骚。<sup>①</sup>不仅如此，苏伊士运河还支撑起了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行动。英国通过运河进行兵力与物

---

<sup>①</sup> 赵军秀：“略论 1875 年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4—1994）》，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95 页。

资输送，从而将各殖民地的战略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为英国提供了超 100 万士兵与劳工，这些人员绝大部分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被快速运送到欧洲战场的。同样，运河也是英军增援印度和反攻缅甸的重要通道。可以说，对苏伊士运河等一系列战略支点的控制，是英国对海权理论的完美实践，并奠定了近现代国际秩序中海洋霸权的基本范式。

作为对海权论的回应，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岛”与“心脏地带”学说，认为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控制是主导世界的关键。根据麦金德的阐述，横贯大陆的铁路可以彻底改变陆上强国的地位，尤其是在封闭的欧亚心脏地带，若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打破力量平衡并占据优势，它便能利用庞大的大陆资源组建舰队，进而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无论是 19 世纪英俄在中亚展开的大博弈，还是二战后美苏围绕柏林墙的对峙，都体现了这一核心逻辑。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阴谋策动西藏“独立”以及扶持奥斯曼帝国，都旨在遏制沙俄在中亚地区的势力扩张，沙俄则竭力防范英帝国的势力渗透中亚。虽然双方始终未在中亚地区爆发全面战争，但围绕势力范围划分的外交博弈、代理人战争，却反复冲击着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二战后，面对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拓展，美国通过柏林空运等方式加以遏制，也反映了双方对“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这一理念的深刻认同。

## （二）冷战时期的空权制胜

第二阶段以杜黑的空权论为标志，从航空技术的成熟开始，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这一阶段，战略支点的形态随之升级。空中力量的出现，使得对空域的控制成为新的制胜关键。杜黑认为，作战飞机的活动半径取决于机场和自身动力两大因素，取得制空权的最好办法是摧毁敌人的机场、供应基地和生产中心。无论是从进攻还是从防御的角度来说，航空设施都是制空权的关键。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力发展战略轰炸机为手段提高核打击能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庞大的航空运输系统，各种空军基地成为其在全球投射空权的核心支点，为对敌侦察、快速反应和介入国际危机、实施战略威慑提供坚实支撑。同样，作为能搭载空中力量进入各热点区域的海上作战平台，航空母舰也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冷

战期间发生在亚洲的 43 次国际危机中，33 次都有美国航母的参与，<sup>①</sup>这得益于其高度的领土独立性、机动性和灵活性。<sup>②</sup>海湾战争证明了空权的重要性，美国凭借各种形式的空中力量，包括战略、战术、空运、太空、空中加油、预警、监视、拦截、后勤、近距离空中支援、隐形、防御压制、精确制导等主导了这场战争，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力量投射基地是这种优势形成的基础。<sup>③</sup>

古巴导弹危机则凸显了能够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支点的极端重要性。美国估计，苏联从本土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至多可以摧毁美国 400~500 件核武器，但如果苏联把导弹部署在古巴，就能够毁灭美国 80% 的核武器。同时，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打击范围几乎可以覆盖整个美国，比苏联本土的导弹更快、更精准，从而大大提升苏联有限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sup>④</sup>对于两个核大国而言，导弹基地的靠前部署不仅可以极大地降低对方预警和反应的时间，增强打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而且还能大大扩展火力覆盖范围，在洲际导弹储备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足够的战略威慑。同时，卫星侦察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地缘博弈迈入新的维度。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正是着眼于防御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试图通过部署太空武器提高自身的反导能力，同时还要建成针对苏联卫星的打击体系，这使得空权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对外太空的控制，对航天发射基地、卫星、空间站的争夺由此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

### （三）21 世纪以来多域协同下的新支点范式

进入 21 世纪，地缘博弈的范式再次发生深刻变革。当前国际博弈的地缘要素已从传统的地理空间扩展为陆、海、空、天、网等多维领域。在这一新的态势之下，战略支点的内涵与外延均被极大地丰富和重塑。

---

① Edward Marolda, “The Aircraft Carrier and U.S. Far East Foreign Policy, 1945-2010”, AIAA Centennial of Naval Aviation Forum “100 Years of Achievement and Progress”, September 21, 2011.

② Ben Ho Wan Beng, “The Combat Utility of The U.S. Fleet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Post-War Period”,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16, Vol.16, No.4, pp.67-100.

③ Carl H. Builder, *The Icarus Syndrome: The Role of Air Power Theory in the Evolution and Fate of the U.S. Air Forc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4, pp.17-18.

④ 赵学功：“美国对古巴导弹危机政策的再考察”，《国家安全论坛》，2022 年第 4 期，第 3-22 页。

首先，支点价值从单一军事属性向“军事-经济-技术”复合体转型。作为一个现代战略支点，它既可能是控制关键通道的交通咽喉，也可能是资源富集或技术中枢的节点，还可能是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杠杆点。例如，作为美军“第二岛链”核心的关岛基地，其价值不仅在于军事方面，还在于对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辐射与影响。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关岛几乎成了美国维持区域主导地位的标志，是亚太盟友判断美国战略动向和制定对美政策的重要参考。另外，为保障关岛军事基地的有效运行，美国还需要采取政治与军事承诺、精心选择的相互防御安排、各种形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贸易协议和技术援助等配套措施，<sup>①</sup>这意味着该军事基地事实上是一个巩固联盟关系的枢纽。正如美国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史蒂文森所言，除了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外，强大的海外部署态势还可以强化对对手的威慑、对盟伴的安全保障，以及保持更紧密的外交和军事接触。<sup>②</sup>

其次，控制方式从物理占领转向规则主导。在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成本极高的今天，通过主导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技术标准和议程设置来实现对战略支点的控制，已成为更常见也更隐蔽的手段。各国竞相争夺技术标准的制定权，目的是通过制定并主导技术标准来建立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既可能是强制性的也可能是权威性的。第一，一国可以通过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技术标准或者有选择性地推行技术治理规范，来构筑市场壁垒，其他国家将产品推向该国市场都必须接受这套标准和通过相关认证。第二，技术标准也能影响其他国家看待问题的方式，即让它们从内心认定这套技术标准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技术先发国通过对技术知识、专利与标准的占有，来实现对技术发展轨道的锁定，从而形成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服从关系。<sup>③</sup>美国试图通过《阿尔忒弥斯协定》主导月球探索规则的制定，实质就是对未来太空资源开发这一无形支点的规则控制权之争。一旦某国的规则成为国际公

---

① Townsend Hoopes, “Overseas Bases in American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5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58-10-01/overseas-bases-american-strategy>

② Jonathan Stevenson, “Chapter One: Overseas Bases and US Strategic Posture”, IISS, September 28, 2022,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2/09/overseas-bases-and-us-strategic-posture/>

③ 沈逸、宫云牧：“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以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为例”，《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6期，第126-151页。

认的标准，该国就可以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限制对手发展威胁性技术，还可以迫使别国接受本国的技术体系，从而在国际供应链中获取“卡脖子”权力。

再次，无形支点的价值日益凸显，甚至超越传统地理支点。在数字时代，全球大部分海底光缆由美英两国掌控，这使得数据通道的控制权成为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工具。海底光缆作为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一环，一条光缆的中断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关键设施的瘫痪，因而跨国科技公司也逐渐作为该竞争的参与者开展设施建设的争夺。<sup>①</sup>华为海洋网络公司遭受美国制裁，正是“网权”支点激烈争夺的体现。同样，台积电的 3 纳米芯片工厂，因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被形容为比军事基地更关键的“硅盾”（Silicon Shield），<sup>②</sup>属于典型的技术中枢型无形支点。

最后，多域协同成为制胜关键。未来的冲突形态是融合了陆战、信息战、网络战、认知战的混合战争。俄乌冲突中交战双方对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证明，单一的军事打击手段已不合时宜，这种军事变革趋势引起了美国军界的高度关注。美国的“联合全域指挥系统”（JADC2）旨在实现陆、海、空、天、网五域数据的秒级共享，<sup>③</sup>正是为了在这种多域协同的博弈中占据先机。实际上，美国已经在南海等地融合外交、政治、信息、军事、经济、金融、法律、情报等多种手段发起了混合战争，目的是在实现霸权护持的同时规避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sup>④</sup>目前，能在多领域掌握全方位优势的国家尚属少数，谁能率先实现军事打击体系的多域协同，谁就更可能在大国竞争乃至军事冲突中获得制胜优势。

综上所述，对地缘战略支点范式革命的理解，是把握美国“新疆界”战略意图及其全球布局的前提。

---

① Christian Bueger, Tobias Liebetrau, “Protecting Hidden Infrastructure: The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Global Submarine Data Cable Network”,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1, Vol.42, No.3, pp.391-413.

② Craig Addison, “Taiwan’s ‘Silicon Shield’: How TSMC Has Becom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ompany”, *The Economist*, March 6,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23/03/06/taiwans-dominance-of-the-chip-industry-makes-it-more-important>

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JADC2) Strategy”, March 2022.

④ 陈翔：“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海上混合战争’战略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5 年第 4 期，第 131-147 页。

## 二、美国的新疆界之一：关键矿产的全球博弈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关键矿产已成为维系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的命脉。这些矿产，包括稀土、锂、钴、石墨、铌等，是制造从 F-35 战机到电动汽车电池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的必需品。因此，确保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已成为美国界定国家利益“新疆界”的核心方向之一。其战略核心在于降低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主导地位的结构性依赖，<sup>①</sup>并为此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一疆界并非静态的地理线，而是一张动态的、遍布全球的供应链网络，其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技术霸权和军事优势。

### （一）“去风险化”战略与全球供应链重塑

美国政府将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去风险化”置于经济议程的优先位置，并将其包装成更具盟友色彩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其核心逻辑是，中国在全球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开采和加工环节占据优势地位，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为实现“去风险化”，美国采取了行政指令、财政激励与多边机制并举的系统性策略。在美国国内，白宫依据《国防生产法》为本土关键矿产的开采和加工项目提供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借助《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要求采购电池所需关键矿产的至少 40%必须来自美国或自由贸易协定（FTA）合作伙伴国家，以支持国内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在国际上，美国积极推动离岸来源多元化，通过其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向“友好国家”的相关项目提供投资支持，以减少各国在关键矿产上对中国的依赖，并解决全球关键矿产贸易中所谓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利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多边机制，<sup>②</sup>试图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矿产安全网络，以形成对中国优势地位的战略对冲。这场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博弈，使得中亚和南美等资源富集地区，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June 2021.

<sup>②</s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state.gov/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

这一战略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传统的贸易调整，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旨在重构全球关键矿产的治理架构。在具体操作上，美国商务部和地质调查局定期更新关键矿产清单（目前已包含 50 种矿物），为政策的精准发力提供依据。同时，美国能源部通过其贷款项目办公室（Loan Programs Office）为国内电池材料加工和回收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旨在补齐本土供应链中最薄弱的中游环节。2022 年 12 月，美国能源部宣布向美国通用汽车与韩国 LG 新能源解决方案合资企业 Ultium Cells LLC 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以帮助该公司在俄亥俄州、田纳西州和密歇根州建设新的锂离子电池芯制造设施。<sup>①</sup>该项目不仅有助于在美国本土扩大电池芯生产、建设安全优先的电池矿产和材料供应链，还创造了 1.1 万个高薪就业岗位，有力贯彻了拜登政府的服务中产阶级政策。

“友岸外包”则更是地缘政治逻辑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这不仅仅是选择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而是优先选择政治上可靠、价值观相近的盟友作为供应链伙伴。<sup>②</sup>加拿大、澳大利亚因丰富的资源储量和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成为该战略的首要受益者。2023 年 3 月，美加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共同打造一个强大、环保且有韧性的北美关键矿产供应链。<sup>③</sup>两国还签订了《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在地质测绘、资源开发、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深度捆绑。美澳成立了关键矿产合作联盟，共同支持此类矿产的投资、研究和开发，尤其是促进澳大利亚向美国扩大稀土出口，以实现供应多元化。美国除了通过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澳大利亚稀土公司莱纳斯（Lynas）提供融资支持外，还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安全框架下探讨关键矿产的联合储备与供应保障问题，将矿产安全与军事安全深度融合。

MSP 则扮演了多边协调平台的角色。该机制由美国主导，成员包括主

---

①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nounces \$2.5 Billion Loan to Ultium Cells for Three Domestic Battery Cell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December 12, 2022,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us-department-energy-announces-25-billion-loan-ultium-cells-three-domestic-battery-cell>

② Vlado Vivoda, Ron Matthews, “‘Friend-shoring’ as a Panacea to Western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ies”, *Mineral Economics*, 2024, Vol.37, pp.463-476.

③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Trudeau”, March 24,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24/joint-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trudeau>

要西方工业国和资源富裕国。MSP 的目标是通过汇集成员国的财政和技术资源，共同投资于全球范围内符合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ESG）的采矿和加工项目，从而为市场提供中国制造之外的“高标准”替代品。截至 2024 年 9 月，美国领导的 MSP 已筹集了超过 1710 亿美元资金，拥有 34 万亿美元管理资产和 26 万亿美元市值，32 个 MSP 项目中有 19 个聚焦上游采矿和矿物提取，15 个服务中游加工，3 个致力于回收和恢复，几乎涵盖了用于清洁能源产品制造的各大矿物，遍及非洲、美洲、亚太、欧洲等多地。<sup>①</sup>MSP 的本质是建立一个由美国为主导、以西方标准为规范的平行供应链体系，以此削弱中国在现有体系中的影响力。

## （二）中亚：“大博弈”在新时代的重演

中亚地区因巨大的资源潜力和地处大国利益交汇点的战略位置，成为美国构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点关注区域。美国意图在此开辟一个绕开中俄的资源获取渠道。美国在中亚的战略不仅是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是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布局，意图削弱俄罗斯对传统后院的影响力，并为“一带一路”倡议设置对冲。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铬、铀和稀土储量，这使其成为美国寻求关键矿产进口多元化的重要目标。美国通过“C5+1”机制启动与中亚国家的战略矿产对话，以促进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深化公私联系以及推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sup>②</sup>美国鼓励本国企业（如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和盟友企业（如获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更多地关注该地区的关键矿产开发。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哈萨克斯坦的部分矿产缺乏本土精炼技术，高度依赖外部支持，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的核心优势所在。美国的策略是多管齐下。首先，通过高层外交访问和商业代表团到访，向哈萨克斯坦政府积极推介美国的技术和投资方案。2024 年 6 月，在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热赫梅图林（Akan Rakhatmetullin）访问美国之际，双方在战略伙伴关系对话中强调要加强技术援助，以及合作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关键矿

---

<sup>①</sup> “Joint Statement of th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Principals’ Meeting 2024”, *Asia 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September 30, 2024, <https://asiapacificdefencereporter.com/joint-statement-on-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

<sup>②</sup> “C5+1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Kazakhstan, September 25, 2023, <https://kz.usembassy.gov/c51-leaders-joint-statement/>

产。<sup>①</sup>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也曾在该地区开展过旨在改善投资环境和法律框架的项目，为美国企业的进入铺平了道路。其次，美国试图利用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引导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流向中亚地区的“可持续”矿业项目，并强调其在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方面的高标准，以此与中国模式形成对比。再次，美国探索通过第三方合作模式介入。例如，鼓励韩国、日本等拥有先进加工技术的盟国企业与哈萨克斯坦企业合资生产，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加工厂，美国则通过提供市场准入担保（如签订长期承购协议）和政治风险保险来支持这类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进入了美国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大量的铜、金、铀和稀有的铼资源。2024 年 9 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关键矿产领域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地质勘探和开采领域的对话。美国将重点投资于地质勘探、开采和高压辊磨综合设施（HPGR）建设。塔吉克斯坦拥有全球除中国外最大的锑矿储量，锑是制造阻燃剂和军事装备的关键材料。美国正通过各种渠道，探讨投资这些战略资源的可能。

美国在中亚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地理上的劣势导致运输成本高昂，所有潜在的运输路线都必须经过俄罗斯和中国，或者途经政治不稳定的阿富汗和伊朗。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美方任何可能削弱俄方影响力的举动都会遭到反制。中国凭借地理毗邻、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该地区建立了深厚的经济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中亚国家普遍采取精明的多向平衡策略，在欢迎美国投资的同时，维持并深化与中俄的合作，避免在地缘政治竞争中选边站队，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 （三）南美洲：“矿产三难”下的战略抉择

南美洲因其丰富的锂、铜、石墨、铌等关键矿产，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热点。该地区的国家正面临着所谓的“矿产三难”（minerals trilemma），即需要在国家安全、经济可行性与可持续性之间找到平衡。<sup>②</sup>美国的战略举

---

<sup>①</sup>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Kazakhstan Enhanc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alogue”,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Kazakhstan, June 5, 2024.

<sup>②</sup> Carlos Solar,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 America”,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August 1, 2025,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critical-minerals-and-us-china-rivalry-south-america>

措，正使得这一平衡变得愈发困难。美国对南美的战略目标不仅是确保资源供应，更是要在此地阻断中国影响力的延伸，维护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美国争取巴西的关键矿产资源，尤其关注铌。巴西控制着全球约 90% 的铌供应，这种金属对美国和北约的航空航天及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和商业合作，鼓励巴西减少对华稀土依赖，并加强在铌等战略矿产方面的合作，以确保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的稳定。美国国防部与巴西矿冶公司（CBMM）保持着密切联系，确保铌的稳定供应。同时，美国积极拉拢巴西加入前述的 MSP 机制，希望通过多边框架锁定巴西的战略资源。巴西于 2024 年年底启动的塞拉贝尔德（Serra Verde）稀土项目由 MSP 背书推动，在巴西本土实现了混合稀土精矿（MREC）的商业化产出。此外，美国还利用在环保和人权领域的软实力，支持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土著社区和环保组织，对一些矿产开发项目进行监督和施压，这在客观上对所有外国投资者（包括中国企业）都构成了一定的制约，但美国企业往往能凭借其更成熟的 ESG 合规体系，在这一“规则战”中占据优势。

在阿根廷，美国的战略取得了更明显的进展。阿根廷地处锂三角的核心地带，是中美电池博弈的中心。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总统上台后，阿根廷的地缘政治天平明显向美国倾斜。美国随即加强了与阿根廷在锂矿开发方面的合作，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次访问该地区，强调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sup>①</sup>并推动美国企业（如 Livent 公司）加大在阿根廷的投资，旨在将阿根廷的锂资源整合进由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中。除了军事和经济手段，美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加影响。在阿根廷面临严重债务危机时，美国在 IMF 中的投票权是重要的谈判筹码，用以换取阿根廷在关键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如 5G 网络）等领域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并对中国投资设置更严格的审查。

对于智利和秘鲁，美国则采取了规则与市场双重施压的策略。智利是全球锂矿和铜矿超级大国，美国利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税收减免等方式，激励和施压智利构建一条绕开中国加工环节的锂供应链。该法案规定，

---

<sup>①</sup> “U.S. Southern Command Chief Visits Argentina, Focuses on Lithium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uenos Aires Times*, April 4, 2024.

要获得全额的电动汽车补贴，电池中的关键矿产成分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美国或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且不能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主要指中国）加工。<sup>①</sup>这迫使包括智利矿企在内的全球供应链参与者必须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否则有可能失去美国市场。在秘鲁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深度参与到采矿业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美国通过加强与秘鲁的海军合作以及外交沟通，试图平衡中国在该国的影响力，以确保美国稳定获取铜矿等资源。对于中远海运集团投资的秘鲁钱凯港，美国官员公开表示担忧，认为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sup>②</sup>这种安全化叙事旨在向秘鲁政府施压，要求其在未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更加倾向于西方投资者。

对这些南美国家而言，如何在“矿产三难”的夹缝中利用大国竞争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维护战略自主权，是其面临的关键考验。目前来看，多数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对冲策略：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同时在安全和政治上向美国靠拢，以期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然而，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这种模糊的中间地带被不断挤压。

### 三、美国的新疆界之二：无形疆域的控制权

如果说关键矿产构成了美国新疆界的物质基础，那么太空和网络等无形疆域的控制权，则决定了其权力的广度与深度。在 21 世纪，对信息流、数据、标准和太空轨道资源<sup>③</sup>的控制，其战略意义丝毫不亚于对传统领土和资源的控制。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将影响力边界拓展到这些新兴的、无形的战略前沿。这些疆域的特点是物理边界模糊、技术迭代迅速、规则体系尚不完善，为美国利用先发优势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战略环境提供了绝佳机会。

---

①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Releases Proposed Guidance on New Clean Vehicle Credit to Lower Costs for Consumers, Build U.S. Industrial Base,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March 31,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379>

② Martin Cassinelli, “What the Peruvian President’s State Visit to China Means for US Economic Diplomacy”, Atlantic Council, July 2,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at-the-peruvian-presidents-state-visit-to-china-means-for-us-economic-diplomacy/>

③ 这里的轨道资源主要指地球静止轨道（GEO）上有限的卫星泊位以及低轨（LEO）等可利用的太空空间。

### （一）“天缘政治”与太空制高点的争夺

近年来，“天缘政治”（Astropolitics）概念逐渐被炒热，<sup>①</sup>太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的战略竞技场。美国将确保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视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石，其战略可被归纳为基础设施主导、军事威慑支撑、规则制定引领。

首先，制天权决定信息权。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星链计划为代表的低轨卫星星座，正在重塑全球通信格局。截至 2025 年下半年，星链在轨卫星数量已超过 8000 颗，<sup>②</sup>其庞大的网络不仅能提供商业通信服务，更具备瘫痪航天器通信、提供战场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以及为武器制导的巨大军事潜力。在俄乌冲突中，星链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战场通信，使其指挥和控制系统在面对俄军的电子战和网络攻击时仍能有效运作，充分展示了商业太空能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同时，星链还显著增强了军队的空间态势感知能力，支撑起了一体化联合作战。美国空军 F-35A 战机通过星链卫星成功传输数据，证明配备星链的无人设备可以成为通信中继平台，使操作员能够同时指挥多架无人机进行作战。<sup>③</sup>星链项目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上的领先，更在于通过商业化运作快速抢占了宝贵的近地轨道和频谱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优势。这种先占先得的模式，实际上是将马汉海权论中的航道控制理念升级为轨道覆盖。此外，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柯伊伯计划（Project Kuiper）也在加紧布局。美方的意图是形成主导性的低轨星座矩阵，巩固在全球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霸权。

其次，太空力量是军事威慑的支撑。轨道资源的军事化日益凸显，宝贵的地球静止轨道因位置有限，已引发大国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反卫星武器（ASAT）的研发与试验，彻底击碎了太空非军事化的幻想。美国于 2018 年发布《国家太空战略》，强调要建立有弹性的太空架构，强化对对手的太空威慑，改进态势感知、情报搜集和分析过程，从而实现在太空“以实力求和

<sup>①</sup> Everett C. Dolman,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 London: Frank Cass, 2002.

<sup>②</sup> Jonathan McDowell, “Jonathan’s Space Report”, October 14, 2025, <https://planet4589.org/>

<sup>③</sup> Arushi Singh, “The Role of Starlink During Military Conflict”, Defence Research and Studies, March 2, 2024, <https://dras.in/the-role-of-starlink-during-military-conflict/>

平”的目标。<sup>①</sup>2019 年，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军（U.S. Space Force），这是自空军成立以来美国新增的第一个军种，凸显了太空作为独立作战领域的战略地位。太空军的任务不仅是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如 GPS 导航卫星和军事通信卫星，还包括发展进攻性的太空作战能力，以“在需要时，从太空、经由太空、向太空投送作战力量”。美国在 2024 年组建了第 9 太空三角洲部队，就是为了加强太空作战能力，进行轨道战演练，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并威慑对手。2025 年 1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启动“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任命太空作战部副部长迈克尔·盖特莱因（Michael Gutelein）上将为负责人。该计划将整合多种拦截系统、太空传感器、在轨动能武器，以“保护美国国土免受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的袭击”。<sup>②</sup>此外，美国还加快了先进太空武器技术的研发与部署。X-37B 这样的可重复使用无人空天飞机，在轨时间长、机动能力强、任务高度保密，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发展未来太空武器的试验平台。通过展示摧毁对手太空系统的能力，美国旨在建立太空领域的延伸威慑，阻止其他国家挑战其太空主导地位。

最后，太空竞争是太空规则的制定权之争。谁制定规则，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美国通过主导《阿尔忒弥斯协定》，<sup>③</sup>试图为未来的月球探索和资源开发定下由其主导的规则框架。该协定强调建立“安全区”、承认太空资源的私人开采权等，这些条款被批评者视为攫取太空霸权的工具，因为绕开了联合国框架下更为普适、强调太空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月球协定》。通过组建一个以自身及盟友为核心的“太空俱乐部”，美国试图将国内法和政策偏好包装成新的国际规范，从而在未来的太空资源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法律和道义地位。以小圈子排挤联合国多边框架的做法，是美国在新疆界进行

---

①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Unveiling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March 23,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unveiling-america-first-national-space-strategy/>

② U.S. Department of War,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Statement on Golden Dome for America”, May 20, 2025, <https://www.war.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4193417/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statement-on-golden-dome-for-america/>

③ NASA, “The Artemis Accords: Principle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Civil Exploration and Use of the Moon, Mars, Comets, and Asteroids”,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nasa.gov/specials/artemis-accords/index.html>

规则扩张的典型手段。这不但破坏了太空安全治理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导致全球太空治理出现严重失序，而且扩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国在太空事业发展和治理能力上的鸿沟，加剧了太空领域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sup>①</sup>

## （二）“网权”博弈与数字疆界的划分

网络空间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无形疆域。对“网权”（Cyber Power）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对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和关键技术节点的控制上。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开放但有选择准入的全球数字秩序，确保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同时阻止竞争对手利用数字技术挑战其优势地位。

首先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目前，全球大部分海底光缆由美英两国公司掌控，这些海底光缆是全球数据的“大动脉”，承载了95%以上的国际数据流量。<sup>②</sup>为遏制中国海底光缆技术的发展，美国反复宣称中国会利用海底光缆实施监控窃听，并于2019年将华为海洋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该公司由华为与英国全球海事系统公司联合成立，短短几年就成为全球顶尖的海底光缆通信网络公司，负责多项高难度的海缆建设项目。为规避美国制裁，华为将不得不把华为海洋的股份出售给中国最大的电力和光缆制造商亨通集团。同时，美国通过实施“清洁网络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排挤华为的5G技术和海底光缆业务。该计划不仅游说美国盟友在5G建设中排除华为，还进一步扩展到“清洁运营商”、“清洁应用商店”、“清洁云”和“清洁光缆”等多个层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对全球关键网络节点的物理和规则控制权，既确保数据流经盟友而非对手的基础设施，还力图掌控全球数据的流动路径与规则。例如，2020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取消四条连接美国与香港的电缆项目，迫使谷歌等公司将原定的香港登陆点改至台湾和菲律宾。<sup>③</sup>2025年7月16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计划出台新

---

<sup>①</sup> 张东冬：“美国近年太空军事化发展态势及其安全影响”，《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3期，第130-157页。

<sup>②</sup> Colin Wall, Pierre Morcos, “Invisible and Vital: Undersea Cables and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SIS, June 11,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visible-and-vital-undersea-cables-and-transatlantic-security>

<sup>③</sup> John Hendel, Betsy Woodruff Swan, “Justice Department Opposes Google, Facebook Cable Link to Hong Kong”, Politico, June 17,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6/17/justice-department-hong-kong-google-facebook-cable-326688>

规，禁止使用中国技术和设备的公司建设连接美国的海底电缆。<sup>①</sup>美国还联合盟友加快在发展中国家铺设使用美国技术的电缆。2021 年，在施压密克罗尼西亚中止与中国华海通信合作的“东密克罗尼西亚海底电缆项目”后，美国顺势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提供替代性项目。这表明海底光缆的铺设路线和登陆点的选择，已不再是纯粹的商业决策，而是被赋予了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

其次是技术标准的制定。5G 技术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标准之争。随着国际电信联盟即将启动 6G 标准的制定，一场新的竞争大幕已经拉开。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领域抢先制定标准，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技术生态。例如，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等平台，美国正联合欧洲盟友协调人工智能治理和技术标准，意图在全球规则形成之前抢占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正被积极推广为全球标准。2025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明确指示 NIST 牵头加速人工智能系统国家标准的制定与落地，并依托美国在国际外交与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地位，大力倡导能够促进创新、反映美国价值观且对抗“威权主义”影响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方式。<sup>②</sup>此外，无人机这类军民两用色彩浓厚的技术也成为标准竞争的高地。2023 年，北约发布了新的无人航空器（UA）控制系统互操作性标准，要求通过“北约舱”项目实现接口兼容性，以支持多国无人机系统的统一控制。通过将自身的技术路径和价值观嵌入国际标准之中，美国不仅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如专利费），更能意识形态和规则层面构建起对竞争对手的长期优势。

最后是关键技术节点的“锁喉”。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关键技术节点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美国深刻认识到台积电等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是一个强大的“硅盾”。近年来，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大力扶持本土芯片制造业，另一方面联合日本、荷兰等国，对向中国出口先

---

<sup>①</sup> David Shepardson, “US Aims to Ban Chinese Technology in Undersea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s”, *Reuters*, July 1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aims-ban-chinese-technology-submarine-cables-ft-reports-2025-07-16/>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July 2025, p.20.

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技术施加严格管制，并对台积电等关键企业施加巨大影响。<sup>①</sup>《芯片与科学法案》不仅为在美国建厂的芯片企业提供高达 520 亿美元的补贴，还附加了严格的护栏条款，禁止获得补贴的企业在未来十年内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新建或扩建先进工艺的晶圆厂。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迫使台积电、三星等全球芯片巨头将最先进的生产能力转移至美国本土。2025 年 3 月，在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家访美之时，特朗普宣布台积电将在美国新增投资 1000 亿美元，包含新建三座晶圆加工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家大型研发中心，这使得台积电对美投资总计达到 1650 亿美元。<sup>②</sup>三星也承诺投资 450 亿美元在美国得州泰勒市建设两座先进逻辑晶圆厂和一座先进封装设施。同时，美国通过出口管制，联合荷兰（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和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领域优势明显）组建针对中国的芯片联盟，精准地在芯片制造的设备和技术环节对中国进行“锁喉”，旨在延缓甚至阻断中国的技术追赶步伐。荷兰、日本虽然在对华半导体限制上一直态度不明，但与美国达成了协议，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技术和半导体设备实施限制。<sup>③</sup>美国的种种举措，正是为了在这一决定未来科技走向的关键节点上，建立绝对的技术代差优势，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技术“新疆界”。

#### 四、结语

21 世纪的地缘战略格局，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命和全球权力转移共同驱动的根本性变革。传统地缘政治中以地理空间为核心的战略支点，已经演化为一个涵盖陆、海、空、天、网五大维度，集军事、经济、技术属性于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Another Historic Investment Secured Under President Trump”, March 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another-historic-investment-secured-under-president-trump/>

<sup>③</sup> Pieter Haeck, Brendan Bordelon, Mark Scott, “US, Netherlands Strike Deal on Blocking Chip Exports to China”, *Politico*, January 27,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s-dutch-officials-meet-to-hammer-out-chips-control-deal-export-blocks-china/>

一身的复合体。在这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对自身国家利益边界的认知，即其“新疆界”，也发生了同步的、深刻的扩展。

美国的新疆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边界线，而是一张由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跨洋海底光缆、近地卫星轨道、互联网根服务器以及前沿技术标准等一系列有形与无形战略节点构成的动态网络。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是通过“去风险化”重塑供应链、构建排他性的技术联盟以及主导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系统性挑战，维护并巩固自身在这张全球权力网络里的中心地位。这场围绕新战略支点的全球博弈，将中亚、南美等资源富集地区推向了大国竞争的前沿。与此同时，在太空和网络这两个无形疆域，美国凭借技术和先发优势，正通过部署星链等基础设施和主导《阿尔忒弥斯协定》等规则，力图划定并固化其主导地位。从争夺深海矿藏到控制近地轨道，从锁定芯片技术到制定网络标准，美国新疆界的扩张，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博弈逻辑已从控制领土转向控制节点与体系的深刻变迁。

---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multipolar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theory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shifting from the physical occupation of traditional geographic space to struggles over control of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pivots, such as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rules. The value of strategic pivots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 military attribute into a “military-economic-technological” complex, and the mode of control is moving toward a rule-led paradigm. Against this backdrop, America’s “new frontiers” are no longer merely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 the geographic sense; they extend into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domains such as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orbital space, subsea fiber-optic cables, Internet root servers, and standards for frontier technologies. Critical minerals and intangible frontiers constitute two major directions through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defines the “new frontiers”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minerals,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s a

“de-risking” strategy to reshap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reduce structural dependence on China, triggering a new round of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increasingly exposing the “critical minerals trilemma” confronting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In the realm of intangible frontiers, the United States both mobilizes the concept of “astropolitics” to compete for dominance in outer space and vigorously promotes competition over sovereignty and power in cyberspace, thereby extending the domain of geopolitical rivalry into space and the digital sphere. Understanding and adapting to this historic shift in geostrategic pivots has become a required course for all countries seek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eopolitics, Strategic Pivot, America’s New Frontiers, Critical Minerals, Astropoli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ускоряющейс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ногополяриз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ласти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сил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еорий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ерьёз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Суть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сместились от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 борьбе за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многомерным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такими как технологии, ресурсы и правила. Ценнос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эволюционировала от од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атрибута к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комплексу, а методы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ними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тся в сторону «правил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На этом фоне «новый рубеж» США – это уже не прос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а область, охватывающая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такие как цепочки поставок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орбиты, подводные оптические кабели, корневые серверы сетей и перед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тандарты.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е минералы и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 два важ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л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США своего «нового рубеж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В секторе

kriticheskiy важnykh mineralov USA prodvigayut perestroyku globalnykh zhepochej postavok posredstvom strategii «snizheniya riskov», стремясь уmenyshchit svoyu strukturnuyu zavisimost' ot Kitaya. Esto privelo k novoy geopoliticheskoy igre v Central'noy Azii, i «tri mineral'nye dilemmы», s kotorymi stalkivaются strany Yuzhnay Ameriki, становятся vse bol'se zamenytyimi v etom processe. V sfere nevidimykh territorij USA ne tol'ko manipuliruyut konцепsiyey «kosmicheskoy politiki», стремясь k dominirovaniyu v kosmose, no i aktivno prodvigayut igru «kiber силы», расширяя sfery vliyaniya geopoliticheskoy konkurenции v kosmicheskoye i cifrovoye prostранstvo. Poniyanie i adaptatsiya k etomu istoricheskому s'dvigu v geostrategicheskikh poverotakh yavlyayetsya vажnym urokom dlya vseh stran, стремящихся k vyjivaniyu i razvitiyu v novyuyu epohu.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оворот, новый рубеж США,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е минералы, геополитик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国防工业与动员机制

# 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与战争潜力

蔺陆洲\*

**【内容提要】**军事工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俄乌冲突具备当代智能化战争的典型特征，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在这场冲突中消耗了海量的武器与弹药。在战争经济的视角下，军事工业的生产情况是评估战场态势和预测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冲突各方的军事工业基础、国防动员体制和最终运行效果，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在行政指令下能够迅速响应国防动员的需求，充分发挥国家的战争潜力，显著地提高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产能，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西方国家市场化的军事工业虽然也得到了大量的投资，但是无法实现有效的国防动员，限制其将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更符合智能化战争的需求。在军事工业中完全采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既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还会损害国家安全。

**【关键词】**俄罗斯军事工业 俄乌冲突 国防动员 战争经济

**【中图分类号】**D8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069(29)

军事装备与后勤物资的持续供给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武器和弹药，庞大的军队与高昂的士气在战场上将毫无价值。军事工业是将各种原材料加工成为军品的产业，涉及武器装备、弹药零件、食品燃料、被服装具等领域。<sup>①</sup>作为军品生产单位与能力的集合，军事工业既是战争经济的主导，也是将国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主要手段。在 2022 年 2 月俄乌

\* 蔺陆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讲师。

① 张振龙：《国防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243 页。

冲突爆发之后，各方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主导着战争的胜负。围绕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西方学者研究了俄罗斯的战争经济，认为虽然俄罗斯成功实施了国防动员，但是国民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sup>①</sup>俄罗斯学者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国防动员历史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国防动员的相关法律进行了研究。<sup>②</sup>中国学者主要研究俄罗斯的军民融合问题，重点关注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影响。<sup>③</sup>总体上来看，冲突参与方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难以客观评价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而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拟从回顾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体制出发，通过对比冲突各方军事工业的情况，判断其对于国防动员的效果，进而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进行科学评估。

## 一、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体系

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继承了苏联的遗产，经过整合后保持了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并形成了五家国有超大型企业主导的格局，国防动员在多轮军改后回归到了最初的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指挥下，俄罗斯的军事工业较为成功地实施了国防动员。

---

① 欧美对俄罗斯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下列文献：J. Watling, O. Danylyuk, *Winning the Industrial War: Comparing Russia, Europe and Ukraine, 2022-2024*,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2025; A. Laufer, J. Shatz, O. Danaf, *Implications of Russia's War on Ukraine for the US and Allie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s*, RAND, 2025; O. Semenenko, et al. "Impact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2024, Vol.36, No.1, pp.41-57.

② 俄罗斯对其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下列文献：Винокуров В. А. Частичная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понятие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оенное право. 2022. №.6. С.9-14; Сморчкова Л. Н. Правов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аво и практика. 2023. №.2. С.46-50; Глушаченко С. Б., Демиденко В. В. История зарожд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 Росси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5. №.1. С.31-55.

③ 中国对俄罗斯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相关研究可参考下列文献：郑雪平、雷磊、鲁炜：“俄罗斯军民融合的发展历程、主要经验与启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71-82页；李抒音、董媛琪：“美国及西方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国防工业进口替代战略”，《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4期，第50-65页。

### （一）俄罗斯军事工业的继承与发展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遗产。苏联解体后，约 1700 家军工企业和 650 家科研机构与设计局归属于俄罗斯，俄罗斯获得了原苏联所有大型常规武器装备及核、生化武器的生产设施。<sup>①</sup>这相当于拥有了原苏联 70% 的军工企业、85% 的军工生产设备、80% 的军工科研与生产能力。<sup>②</sup>在苏联遗留的工业基础上，俄罗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保留了独立完整且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体制。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由军队、政府和企业组成。总参谋部代表军队提出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军队所属的科研单位负责装备的试验与鉴定，并拥有参与一定的研发工作的权利。国防部负责计划和监督，制定战略规划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任务，管理国防预算和资金分配，下达国防订单并进行军备采购。工业和贸易部负责组织军品的研发与生产。军工企业承担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任务。这些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多轮改革和重组，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联合体。国防工业委员会负责整个军事工业系统运行的总体协调。

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长期面临管理水平落后、经济效益低下、技术设备老化、供应链断裂与人才短缺等多重困境。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经济转型过程，最终形成了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体，经济低迷且增长乏力。这就使得国家财政资金紧张、国防预算有限，国防订货数量的持续减少导致军事工业的规模萎缩。此外，在产业结构上还呈现出传统常规机械化武器工业规模过大且生产过剩、新兴信息化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sup>③</sup>针对这一状况，俄罗斯对军事工业的管理进行了多轮改革，制定了外向型的发展策略。

**1. 改革管理机制。**俄罗斯放弃了分散的多头管理模式，回归苏联式的集中管理体制。俄罗斯在 1991 年实行由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领导，采用科技工业部与常规武器、航空航天、指挥系统、弹药和造船共五个军工局的

<sup>①</sup> J. R. Blasi, M. Kroumova, D. Kruse, *Kremlin Capitalism: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Russian Econom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6-55.

<sup>②</sup> 孙迁杰：“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展之路”，《军事文摘》，2016 年第 11 期，第 17-20 页。

<sup>③</sup> 党建伟：“冷战后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探析”，《技术与创新管理》，2006 年第 6 期，第 23-26 页。

“一部五局”分散管理模式。随着私有化改革的失败，俄罗斯为了有效控制军工企业，在 2006 年重新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作为政府常设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军事工业回归传统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五个军工局被撤销之后，其职能全部转移至工业和贸易部，负责管理军事工业并进行业务指导；2016 年，《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的国家计划制定，该计划在 2021 年得到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sup>①</sup>垂直领导能够聚合俄罗斯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军事工业，在战时易于组织和动员，可以依靠行政手段强化军事工业的生产。

**2. 扩大军贸出口。**由于国内需求锐减，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主要依靠军火出口从国际市场获取资金。苏联解体初期，军事工业的分散管理体制使得俄罗斯设立了多家军品出口公司，虽然在业务上各有侧重，但是界限模糊，相互竞争压价不仅降低了企业收入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俄罗斯在 2000 年将武器出口公司（Росвооружение）和工业出口公司（Промэкспорт）合并为国防出口公司（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作为国家唯一的军火出口商，有效遏制了恶性竞争，显著提升了对外军售的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俄制装备在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力。从 2000 年到 2020 年的二十年间，俄罗斯的军贸出口扩大了 5 倍，与 12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约 2.6 万份合同并交付了总价值超过 1800 亿美元的武器产品。<sup>②</sup>俄罗斯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军援军贸的重点，还依靠私营军事公司利用“冲突矿产”构建了“军事安全-资源贸易”的商业模式。<sup>③</sup>

**3. 合并军工企业。**俄罗斯在 1991 年对军工企业实施了私有化改革，同时推动“军转民”的发展，但是转型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俄罗斯的军工生产到 1994 年缩减了 60% 以上，大批军工企业陷入困境。<sup>④</sup>冷战结束后，全球军工企业掀起了并购浪潮，俄罗斯转而进行规模化与集团化的整合，通过资产

---

① Глазкова В. В. Состояние и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E-management. 2021. Т.4. №.4. С.16-23.

② Сергей Птичкин.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 за 20 лет продал за рубеж продукцию на 180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2 ноября 2020 г. <https://rg.ru/2020/11/02/rosoboroneksport-za-20-let-prodal-za-rubezh-produkciu-na-180-mlrd-dollarov.html>

③ 蔺陆洲：“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69-196 页。

④ 海运、李静杰、友谊：《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61 页。

控制的方式重新掌握了军事工业。在保留重点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合并相关设计局和研究所，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将科研、设计、试验、生产、销售和维护集合为一个整体，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加快成果转化。同时还吸收金融机构和外贸部门加入集团，进行多元化的生产经营，降低军事工业的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到 1998 年，俄罗斯已将 1700 多家军工企业合并为 670 家并组建了 30 家大型军工金融集团。为了避免垄断企业操控军品市场，2001 年俄罗斯政府借鉴美国的经验，计划在每个领域建立 2~3 家大型集团，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保持市场活力，进而将军工企业合并为 36 家超大型国防科研综合体。<sup>①</sup>由于组建竞争性集团的方案执行不力，俄罗斯政府转向组建垄断性专业集团。

目前，俄罗斯形成了五家国有超大型企业主导军事工业的格局。自 2007 年以来，俄罗斯开展行业重组，形成了具有生产和管理双重职能的垄断性专业集团。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Ростех）拥有 800 多家科研及生产企业，形成了航空、电子和军备三大产业集群，旗下拥有直升机公司、联合航空发动机公司、研制半导体设备的俄罗斯电子、研制光学设备的施贝瓦、生产重型汽车的卡玛斯、制造坦克的乌拉尔车辆厂、研发多管火箭炮的合金公司、生产轻武器的卡拉什尼科夫联合体等著名军工企业，涉及直升机、无人机、电子信息、雷达、导弹、坦克、火炮、车辆、枪械、弹药、化学原料等领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Роскосмос）生产各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配套的火箭燃料、发动机与控制系统，研制的遥感、导航和通信卫星可提供军事侦察、战场联络与位置服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Росатом）是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综合体，拥有 360 多家研究院、试验场和工业生产企业，同时也生产反坦克导弹、激光武器、图像识别系统等非核武器。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ОАК）合并了伊尔库特、米高扬、苏霍伊、图波列夫和雅科夫列夫等著名设计局，生产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各类军用固定翼飞机。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ОСК）整合了大部分造船资源，拥有 50 多家设计局、造船厂和修船厂，能够建造货轮、驱逐舰、护卫舰和各型潜艇。此外，俄罗斯科

<sup>①</sup> Леонович А. Н.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онце XX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Вестник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ономика. 2014. №.5. С.90-98.

学院（PAH）也参与武器装备的设计与生产。

## （二）俄罗斯军事工业国防动员体制的演变

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是通过转变产业的运行机制从而扩大生产，充分调动国家的经济能力，为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来进行的。进入战争状态后，战略重心完全转移，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成为一切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前提。军事工业通过国防动员转入战时轨道，经济活动围绕保障前线所需的作战物资而开展，形成以军事供给为中心的战时经济。由此，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失效，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根据国家计划向军事工业集中，军品生产比重急剧增加，民品生产受到严格管制。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授权国防动员机构，依据动员计划和相关的法规对经济实行广泛的统制与干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主要经历了继承与保留、探索与改革、回归与重塑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第一阶段是 1991—2007 年的继承与保留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缩减，主要依靠核力量，在保留苏联原有国防动员体制的基础上重点维持核工业。1994 年爆发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国防动员体制。俄军既缺少有经验的作战部队，也缺乏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方面，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愿意进行国防动员；另一方面，苏联式的国防动员是为大规模战争而设计的，并不适用于小型的局部高强度冲突，俄军只能依靠现有人员和装备组织作战。<sup>①</sup>失败的国防动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效能，车臣在 1996 年的停火中获得了非正式的独立地位。实践证明，俄罗斯不能依靠传统的国防动员模式提升战备状态。在 1999 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主要使用多兵种战术群（OTG），其动员方式是调配不同战备部队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一支常备化的精锐部队提升作战能力，这种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为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转型埋下了伏笔。<sup>②</sup>

第二阶段是 2008—2012 年的探索与改革阶段。基于车臣战争的经验，

---

<sup>①</sup> D. Bakshi, “The War in Chechnya: a military analysis”, *Strategic Analysis*, 2000, Vol.24, pp.883-898.

<sup>②</sup> Q. Hodgson, “Is the Russian bear learning? An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of the second Chechen war, 1999-2002”,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03, Vol.26, pp.64-91.

俄罗斯的国防动员转向维持小规模、高常备率的精锐单位，希望能够在局部冲突中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俄罗斯的这种新动员模式支持自己在 2008 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装备老化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加强了俄罗斯军队转型的决心。在时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的主持下，俄罗斯于同年启动了名为“新面貌”的军事改革，推行“师改旅”缩减部队编制，不再保留面向大规模战争动员进行军队扩编所准备的“缺编师”和“架子师”，仅保留个别的武器存储与生产基地。为解决资金匮乏的问题，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思路，重点增强军事技术的储备，军事工业更加注重研发而非生产，有限资金用于采购少量的高技术装备。以采购法国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为代表，俄罗斯希望通过武器装备外采的方式引入新的竞争机制，提高军队在武器选型中的议价能力，打破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封闭和垄断，改善管理与技术水平。<sup>①</sup>但是，这次改革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利益，未能成功推行。

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今的回归与重塑阶段。绍伊古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后，重新设计了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恢复了之前裁撤的部分军队机关，将一些部队改回了“师-团”的编制。发展军事工业的核心是改善国防部与军工企业之间的关系，加大了武器装备的采购数量。自 2014 年起，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年增长率超过了 20%。<sup>②</sup>乌克兰“颜色革命”、克里米亚危机、顿巴斯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冲突进一步刺激了军事需求，使得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在注重小批量研发高技术装备的同时恢复了部分武器和弹药的产能。此外，为了应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对军事工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逐渐摆脱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武器装备中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国产化。<sup>③</sup>军事工业产能的扩张和技术的自主可控，为恢复苏联式的国防动员体制奠定了基础。

<sup>①</sup> P. Lannon, “Russia’s New Look army reform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11, Vol.24, pp.26-54.

<sup>②</sup> K. Zysk, “Managing military change in Russia”, *Security, Strategy and Military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155-177.

<sup>③</sup> Абдулкадыров А. С.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Ф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роцесса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9. №.3-4. С.1-5.

目前，俄罗斯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军事工业国防动员体制。以 1997 年通过的《关于在俄罗斯联邦进行动员准备和动员的联邦法律》为基础，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俄罗斯构建起了调整动员准备和组织开展国防动员活动的框架。<sup>①</sup>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流程主要包括动员准备、法律调整、动员拨款、动员征召、任务下达和动员实施等具体环节。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代表军队提出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需求。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作为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最高机构下设“动员准备与动员跨部门委员会”，负责领导与决策。国防动员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特别计划总局（GUSP）拟定的总统令开展，总统令规定了动员的规模、程序、时间和执行条件。工业贸易部统一调度全国军工企业的转产，其他中央政府的部委、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进行配合。军工企业则按照国防部的订货需求组织生产。

### （三）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已经为冲突的长期化开始了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准备。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方首轮突袭失利。随着战况的日益胶着，双方陷入持久战和消耗战，俄军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形势愈发困难。普京总统在 2022 年 9 月 21 日发布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宣布部分军事动员的法令》，开始实施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sup>②</sup>截至 2024 年年底，俄罗斯动员了超过 4000 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的生产，对 1400 家实体实施了管制，其中 25% 为科研机构，75% 为制造企业。<sup>③</sup>依靠国家的严格管理与高效组织，俄罗斯成功整合了现有各类资源。以产能扩张为目标，俄罗斯在四个方面实施了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

**1. 执行动员计划。**在部分动员令发布以后，俄罗斯在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协调委员会，以保障战时所需的武器、装备、燃料、被服和

---

<sup>①</sup> 刘鹏：“俄罗斯联邦的动员准备和动员制度”，《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74-77 页。

<sup>②</sup>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09.2022 № 647, «Об объявлении частич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2209210001>

<sup>③</sup> Разъяснения касательно процедуры включе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водный реестр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29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ekonom73.ru/news/29-09-2022/35566/>

药品等物资供应。<sup>①</sup>按照国防动员计划，军工企业扩大生产以满足部队的需求。首先，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议价，强制企业签订合同或协议，必须完成军需物资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其次，实施价格管制，监督军需物资的采购，对武器、弹药和相关军品进行限价。同时根据需要，扩大国家监管的国防采购产品目录和领域。最后，开展劳动力动员，在维持现有产业工人的基础上，组织待业人员、在校学生、服刑人员等多类劳动力参与军事生产，军工从业人员从冲突前的 121 万人扩大到 450 万人。<sup>②</sup>

**2. 启用储备物资。**首先，开始调用国家武器储备。俄罗斯动员所有可以参与军事工业生产的库存物资、原材料、零部件，启动封存的工业生产设备与设施。其次，翻新库存武器弹药。俄罗斯储备了大量苏联时期遗留的军事装备，翻新与修复的装备是俄军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23 年交付俄军的 2000 辆坦克中只有约 200 辆为新制坦克，其他均为修复和改装的 T-62、T-72 和 T-80 等库存坦克。<sup>③</sup>同样，俄罗斯空天军使用的大量航空炸弹是苏联时期生产的非制导炸弹，俄罗斯将其改装为滑翔制导炸弹。各类库存炮弹翻新为制导炮弹，部分解决了俄军高精度武器不足的问题。启动库存不仅能够满足前线的需要，而且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最后，推动军民融合，不完全依赖军工企业，通过俄军后勤单位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提高武器装备的修复效率并实现再生产。

**3. 修改相关法规。**首先，在劳动法规方面，军工企业在部分动员后开始实行每周六天的三班倒制度，同时限制劳工的权利，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到 12 个小时，取消周末、节假日和年假的休息。其次，在优惠政策方面，军工企业的员工可以推迟或者免于应征入伍，军工综合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跨地区搬迁或调任中可以享受特殊人才奖励，确保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

<sup>①</sup>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ругих войск, воин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и органов. 24 октября 2022 г. <http://government.ru/news/46874/>

<sup>②</sup> V. Bekrenev, S. Vakina, “Labour resources under conditions of military danger as a key factor in increasing industrial potential”, *Journal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2024, Vol.2, pp.14-26.

<sup>③</sup> T. Malmlöf, *Russia's defence industry at war: Can it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Russia and Eurasia Studies programme, 2023, <https://www.foi.se/est-api/report/FOI%20Memo%208231>

秩序，完成军需订单。<sup>①</sup>最后，在采购法规方面，俄罗斯停止了《国防采购法》相关的军品采办程序，单一供应商不受限制，不进行多家比价或招投标，改为根据前线需要以管制价格直接订购。<sup>②</sup>

**4. 提供资金保障。**首先，在财政上，俄罗斯增加了用于军事工业的国防支出。俄罗斯国防预算从 2022 年的 5.51 万亿卢布（805 亿美元）增加到 2025 年的 13.5 万亿卢布（1450 亿美元）且还在持续扩大，其中约 40% 的预算用于武器装备的采购。<sup>③</sup>其次，在融资方面，俄罗斯工业通信银行（PSB）作为服务军工企业的政策性银行支持开展国防动员。由于俄罗斯国防部必须按合同进度分阶段付款，军工企业无法获得全款，但是为了履行合同可以从银行获得优惠贷款。俄罗斯央行的基准利率已经从 2023 年的 8.5% 上升到 2024 年的 21%，而军工企业则可获得 5%~6% 的政府贴息贷款。<sup>④</sup>因此，企业能够使用远超年度国防采购预算的资金生产武器装备和军需品。最后，在投资方面，大量军工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例如，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投资了 700 亿卢布（约 10 亿美元）用于更新和扩建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的军工企业，其中最重要的喀山火药厂新建了 40 处设施，并购置了数百台设备。<sup>⑤</sup>

## 二、冲突各方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对比

乌克兰与俄罗斯类似，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苏联动员模式，较好地适应了战场的需要。美国和欧盟的军事工业由于采用了高度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扩大生产，无法实现有效

① Кудюкин П. М. Элементы чрезвычайности и правовые коллиз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и труд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диггер. 2023. Т.4. №.1-2. С.62-69.

② Пурге А. 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ско-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оронного контракта в Росси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право. 2023. №.2. С.80-90.

③ A. Yakovlev, “Busines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After 2022: Resources, Incentives, Expectation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25, Vol.326, pp.2-5.

④ O. V. Buklemishev,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forceful defense spending growth”,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Vol.10, pp.319-331.

⑤ Ростех направит 70 млрд рублей н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оборо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Подробнее. Татар-информ. 18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www.tatar-inform.ru/news/rostex-napravit-70-mlrd-rublei-na-modernizaciyu-oboronnnyx-predpriyatiy-v-tatarstane-5943443>

的国防动员。

### （一）乌克兰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

乌克兰拥有较为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继承了原苏联约 30% 的军工联合体，拥有 3594 家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约 300 万员工，其中 700 家直接开展武器装备的生产，共有 145 万员工，<sup>①</sup>包括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伊夫琴科进步设计局和马达西奇公司、制造飞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弹道导弹的南方设计局、生产燃气轮机的曙光设计局等知名军工企业，其中莫洛佐夫设计局和马雷舍夫制造厂还曾是原苏联最大的坦克生产基地。乌克兰能够生产运输机、主战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各类导弹、雷达和通信系统等高技术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冷战后国防订单的急剧缩减，乌克兰无力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工业，军工企业的数量到 1993 年减少至 267 家，并持续下降。这些企业完全依靠国际市场生存，其 95% 的军品用于外贸出口。<sup>②</sup>1996 年，乌克兰成功向巴基斯坦出口了 320 辆 T-80UD “堡垒”坦克，保障了每年 110 辆的产能，但依然远不及原先每年 900 辆的产量。而且，乌克兰出口的大部分军品是作为原有武器系统的供应部件销往俄罗斯。根据 1990 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 1994 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乌克兰同意放弃核导弹并大幅削减常规武器的库存。2010 年，乌克兰整合了 125 家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了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UKrOboronProm），作为军事工业的核心支柱。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乌克兰政府在 2020 年成立了战略工业部，负责管理军工企业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计划。到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拥有 250 多家军工企业和 10 万名员工。<sup>③</sup>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军事工业进行了国防动员。

**1. 资金筹措。**首先，增加财政拨款，乌克兰国防预算从 2022 年年初的 2800 亿格里夫纳（69 亿美元）大幅上升到 2 万亿格里夫纳（500 亿美元），其中 15% 用于生产和购买武器装备。乌克兰重启了武器弹药的生产线并增加

<sup>①</sup> 张国凤：“乌克兰军事工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24 页。

<sup>②</sup> 宋博、蔡鹏鸣：“乌克兰危机对乌国防工业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3 期，第 114-130 页。

<sup>③</sup>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ОПК, который Украина потеряла.... 22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zn.ua/ukraina-1991-2020/opk-kotoryj-ukraina-poterjala.html>

产能，维护乌军现有装备和西方国家援助的军事装备。<sup>①</sup>其次，提供优惠贷款，政府对银行利息进行补贴，军工企业可以获得利率 5% 的优惠贷款，但资金规模仅为 1200 万美元。<sup>②</sup>

**2. 修复装备是乌克兰军事工业动员的重点。**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地区冲突发生后，乌克兰武装部队修复了超过 1.2 万件军事装备。<sup>③</sup>乌克兰军工企业更换了现有武器装备中的俄罗斯部件，转而从国际市场采购。同时开始研发“海王星”反舰导弹、“博格丹”自行榴弹炮、“布科维尔”电子战系统等新型武器。

**3. 分散布局。**为避免遭受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军工企业进行了分散，重组了生产流程，避免大量零部件与成品的集中存放，将生产设施迁移至固定的地下掩体，形成了新的分布式生产模式。

**4. 积极创新。**乌克兰广泛利用新技术发展军事工业。在无人机领域新建了 120 多家企业，其中 15 家专业公司能够设计和生产高性能无人机，其余大部分则是进行无人机组装。在全国范围内，每月可以生产超过 10 万架各类无人机，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人机产地。<sup>④</sup>此外，互联网公司还利用遍布全国的麦克风传感器开发了“天空堡垒”分布式防控系统。

**5. 寻求外援。**乌克兰从北约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援助，同时也获得了生产武器弹药的资金、标准、授权许可和技术支持。如果缺少西方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军队将迅速崩溃。<sup>⑤</sup>

乌克兰通过国防动员使得军事工业快速适应了战争的需要。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乌克兰主要依靠原苏联的军事工业遗产保持生产能力，但是俄

---

① N. Sokrovolska, G. Kucher, K. Pyvovarov, et al., “The Functioning of Ukraine’s Budgetary System in Wartime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25, Vol.15, pp.268-277

② V. Hmyria, O. Kostiuk, L. Fedoryshyna, et al., “Innovations in the defense-industrial complex: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Naukovyi Visnyk Natsionalnoho Hirnychoho Universytetu*, 2025, No.1, pp.125-131.

③ O. Sampir, “Improved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system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equipment recovery of a separate mechanized brigad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2021, Vol.11, pp.165-178.

④ D. Petru-Eduart, Maintenance aspects of Ukrainian drones, *Strategic Impact*, 2024, Vol.91, No.2, pp.112-129.

⑤ J. Szöke, K. Kusica,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Russo-Ukrainian War”, *Social Sciences*, 2023, Vol.12, p.294.

军自 2023 年起加强了对乌克兰后方基础设施和工厂的大规模空袭和打击，乌克兰大型军事工业的系统性生产能力已经被摧毁殆尽。乌克兰只能对军事工业进行分散，使用隐蔽的地下军工厂生产自杀式无人机和少量弹药，维持坦克和装甲车的维修与改装，已经完全失去了大型装甲载具、火炮单位和高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总体上看，乌克兰根据自身特点在能力范围内成功实施了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截至 2024 年年底，乌克兰军工企业数量增加到 500 家，员工人数扩大到 30 万人。<sup>①</sup>但是新增的大部分工厂均为规模较小的企业，产品质量难以控制，有限的资金和获取零部件的困难严重限制了乌克兰军事工业的产能。同时，由于国家采购系统的瘫痪，乌克兰军队不得不自行采购所需的物资，国家难以集中资源开展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sup>②</sup>实践证明，分散式的生产和采购远不如集中式系统有效。乌克兰小规模分散式的军事工业仅适合短期动员，无法实现对军队的长期系统性保障。

## （二）美国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

美国的军事工业依靠市场机制驱动。美军没有庞大的军事科研与生产部门，绝大部分武器装备由私营企业制造，武器的研发与采购通过国防部与军兵种实现两级管理。五角大楼根据每年的国防授权法制定预算，批准项目，审定价格，调拨经费并完成采办；军兵种根据国防部的原则和计划具体组织本军兵种的武器装备研发与采购工作，军兵种下设的型号办公室和科研机构负责武器装备的研究、试验、鉴定、管理和应用。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实行合同承包制，军兵种提出需求后面向企业进行招标，经过竞争后与承包商逐级签订合同。美国的军事工业包括营利性公司、非营利的研究所与实验室、国防部靶场与检测设施等政府维护的单位。美国的军事工业实力强大，1985 年军事工业的从业人数达到 350 万人。冷战结束后国防开支从 1991 年的 3197 亿美元下降到 1996 年的 2660 亿美元。<sup>③</sup>由于需求大量减少，国防部推动军

<sup>①</sup> V. Shemaiev, P. Tolok, A. Onofriichuk, “International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Amid Armed Aggress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Advancing the Defence Industry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2023, No.1, pp.101-114.

<sup>②</sup> Y. Alshamy, C. Coyne, N. Goodman, et al., “Polycentric defense, Ukraine style: explaining Ukrainian resilience against invasion”, *Journa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2024, Vol.39, pp.36-58.

<sup>③</sup> A. Yalta, F. Tüzün, “Time varying determinants of US demand for defense spend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21, Vol.32, pp.829-846.

工企业进行了并购重组。目前，美国的军工企业主要由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通用动力、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这五大集团主导。这五家公司在 2022 年获得了美国国防部 1184 亿美元的合同，占总合同额的 30%，也是美军近 3/4 核心武器系统的主要承包商。由于美国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要求，每年约有 3 万家小公司能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合同，此类创新型公司可以推动先进技术的军事应用与发展。美国在 2021 年约有 6 万家军工企业，雇用了约 110 万名员工。<sup>①</sup>

美国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输送了大批武器装备。随着需求的扩大，美国以《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为框架，通过多种方式对军事工业进行国防动员。

**1. 扩大采购规模。**美国加大了装备的采购力度，在 2023 年拨款 1420 亿美元采购武器系统，其中 248 亿用于弹药采购；在 2024 年拨款 1675 亿美元采购武器系统，其中 306 亿用于弹药采购。<sup>②</sup>不仅如此，美国还加大了对武器弹药生产线的更新和扩建。例如，6 亿美元投资雷神公司用于重启 2020 年停产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生产线；15 亿美元用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和得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扩建现有兵工厂，增加 155 毫米炮弹的产量。<sup>③</sup>

**2. 改革国防采办。**传统上，美国国防部只能通过年度合同与年度拨款进行采购。2023 年后，国会授权美军签订拓展至 2~5 年的多年期军火采购合同，为军工企业提供更强的稳定性，从而鼓励国防承包商在合同期内建立新的生产线并引入劳动力，通过扩大采购实现规模效益。<sup>④</sup>

**3. 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商业航天的军事应用，利用星链（Starlink）的

---

① Jennifer Stewart, Robert Van Steenburg, et al., *Vital signs 2023: Posturing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3, [https://www.ndia.org/-/media/sites/ndia/policy/vital-signs/2023/ndia\\_vitalsigns2023\\_final\\_v3.pdf?download=1?download=1](https://www.ndia.org/-/media/sites/ndia/policy/vital-signs/2023/ndia_vitalsigns2023_final_v3.pdf?download=1?download=1)

② P. Joyce, O. Krupa, “Budgetary responses by the USA to support Ukrain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2025, Vol.45, pp.237-246.

③ S. Jones, *Empty bins in a wartime environment: The challenge to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3, pp.11-19

④ R. Greenway, J. Fein, R. Stern, et al., *Strategy to Revitalize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 21st Century*, Heritage Foundation, 2025,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strategy-revitalize-the-defense-industrial-base-the-21st-century>

卫星通信服务保障战场联络；将麦克萨（Maxar）、行星实验室（Planet Labs）、冰眼（ICEYE）等商业卫星遥感公司提供的数据交由帕兰蒂尔（Palantir）开展分析，高效识别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实现战场感知。<sup>①</sup>在 2024 和 2025 财年投资 5 亿美元探索颠覆性技术的军事应用，开发无人机、巡航导弹、无人水面舰艇、反无人机系统等，以形成新型作战能力。<sup>②</sup>

美国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难以适应当前大规模高强度混合战争的需要。

一是市场机制存在缺陷。美国的军工企业追求效益，很少单纯制造武器装备，普遍开展多元化经营，这种军民复合的生产模式降低了军事工业的维护成本。在军品需求低迷、利润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企业为了寻求降本增效，会关闭武器装备的生产线或者完全退出军工业务。目前，美国有 640 家核心军工产品制造商，其中 86% 的制造商从国防部获得的收入仅占其收入的 10%。<sup>③</sup>由于军品业务占比不高，对国防动员需求的响应很慢。即便同国防部签订了多年期合同，经费仍然是按年拨付，而且国会未来还可能会调整预算，因而对军工企业的吸引力不足。美国的国防动员受制于市场。例如，由于美国庞大的民用枪械市场，2020 年美国共生产了 86 亿发子弹，因此能够轻易向乌克兰提供 4 亿发子弹的援助。<sup>④</sup>但是炮弹、火箭弹、导弹则面临严重的库存与产能危机（见表 1）。

二是战略需求难以平衡。美国需要同时满足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以色列、亚太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热点地区的军事需求。在不改变对外战略的情况下，当前美国的国家需求与企业利益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了美国军事工业产能的提升，武器与弹药的短缺状况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改善。

① 黄志澄：“从乌克兰战场看商业航天的军事价值”，《国际太空》，2023 年第 4 期，第 12-17 页。

② J. Caverley, “Horses, nails, and messages: Three defense industries of the Ukraine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3, Vol.44, pp.606-623.

③ C. Maria, D. Vlad, P. Brîndușa, “Evolution of defense budget allocations in the past 20 years: Comparison between NATO countries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fense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2024, No.1, pp.86-90.

④ K. Kowalski, B. Sahmali, “NATO and the Defence Production Challenge: A Policy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Capacity Defence Pledge”,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24, Vol.23, pp.242-262.

表 1 2025 年美军主要精确制导武器存量

弹药类型	供应情况	库存状态
制导多管火箭炮 (GMLRS)	紧张	已生产 6 万枚, 快速消耗, 库存约 1000 枚, 年产 6000 枚
神剑制导炮弹 (Excalibur)	紧张	已生产 5 万枚, 快速消耗, 库存约 2 万枚, 年产 1000 枚
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紧张	已生产 1600 枚, 库存约 1000 枚
标枪反坦克导弹 (Javelin)	严重短缺	美国已援助乌克兰库存量的 40%, 接近极限, 年产 2000 枚
激光制导火箭弹 (APKWS)	充足	已生产 4 万枚, 年产 3 万枚
航空精确制导炸弹 (JDAM)	充足	已生产 50 万枚, 年产 4 万枚
航空滑翔炸弹 (SDB)	充足	I型已生产 3.7 万枚, II型已生产 1900 枚, 年产约 3000 枚
钻地炸弹 (Bunker Buster)	紧张	特种武器, 库存量极少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sup>①</sup>

### （三）欧盟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

欧洲的军事工业具有雄厚的基础。冷战结束后, 由于国防订单大量减少, 欧洲的军工企业已经合并为少数几家公司。目前, 主要是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法国的泰雷兹 (Thales)、达索航空 (Dassault Aviation) 和赛峰 (Safran)、意大利的莱昂纳多 (Leonardo) 和芬坎蒂尼 (Fincantieri)、德国的克虏伯

<sup>①</sup> 作者根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对马克·坎西安 (Mark Cancian) 的访谈 (Can the United States Equip Israel while Simultaneously Equipping Ukraine and Taiwan?) 并综合美国国防部相关新闻与报告计算得出。

（Krupp）和莱茵金属（Rheinmetall）、瑞典的萨博（Saab）以及空客防务（Airbus）等跨国公司。这些军工企业从 2002 年开始以交叉持股、建立特定领域合资企业等方式加强合作。目前，欧洲军事工业的雇员约为 50 万人。不同于美国的私营企业，欧洲军工企业中 3% 为国家控股，36% 为国有参股，55% 为公私合营。<sup>①</sup>欧洲的军事工业高度分散，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军队规模太小，无法支持其军工企业的生存，只能通过合作来扩大军备采购的规模。在欧盟框架下主要依靠欧洲防务局（EDA）、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和欧洲防务基金（EDF）等机制开展合作。欧盟委员会在 2021 年成立了国防工业和航天总司（DG DEFIS）管理军事工业。欧盟虽然可以资助军事技术研发并鼓励武器生产，但是无法整合欧洲的军事工业，这是因为欧盟缺少统一的防务政策，不能直接组织军品采办，必须由欧洲各国独立进行武器采购。因此，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欧洲军事工业在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和竞争。此外，欧盟重点考虑自身能力的发展，北约则强调指挥控制系统间的互操作，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格局更加碎片化。

欧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开展了多层次的军事工业国防动员。

**1. 加大拨款和采购。**2021 年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总额为 2140 亿欧元，2024 年达到 3260 亿欧元，增长了 30%，且其中超过 900 亿用于采购武器和弹药。<sup>②</sup>在俄乌冲突的初期，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标枪”、“毒刺”、“星光”等便携式防空与反坦克导弹以及各类小型武器，之后开始援助火炮、坦克和战斗机。但是由于武器弹药的储备不足，同时也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欧洲国家转而从国际市场采购武器弹药，此外也通过向乌克兰军工企业购买武器装备再转赠给乌克兰军队的方式提供援助。<sup>③</sup>

<sup>①</sup> J. Mejino-Lopez, G. Wolff, “A European defence industrial strategy in a hostile world”, *Bruegel Policy Brief*, No.29, 2024,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322554/1/1926953711.pdf>

<sup>②</sup> N. Marsh, B. Martins, J. Mawdsley, “European defense spending: Trade-off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alignment”, *EconPol Forum*, 2024, Vol.25, No.4, pp.20-23.

<sup>③</sup> H. Aries, B. Giegerich, T. Lawrenson, “The Guns of Europe: Defence-industrial Challenges in a Time of War”, *Survival*, 2023, pp.7-23.

**2. 加强武器弹药生产。**欧盟在 2023 年 7 月通过《弹药生产支持法案》(ASAP)，提供 5 亿欧元的资助，为欧洲的军工企业解决资源、物流和生产等问题，帮助成员国补充弹药库存并向乌克兰提供弹药援助。在 2023 年 10 月又通过《通过共同采购加强欧洲国防工业法案》(EDIRPA)，将在两年内投入 3 亿欧元，为至少三个成员国组成的武器装备联合采购提供部分补偿，刺激欧洲本土军工企业的生产。<sup>①</sup>

**3. 推动国防采办改革。**欧盟在 2024 年开始规划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EDIS)，以增强成员国军事工业的合作和国防动员的响应能力。在此基础上，《欧洲国防工业计划》(EDIP) 计划在 2025 年至 2027 年提供 15 亿欧元提升欧洲的军事工业能力和战备水平，以《欧洲军备计划结构》(SEAP) 扩大成员国的军事工业合作。<sup>②</sup>

欧洲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效果不佳，三年来未能实现产能的有效扩张。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失灵。欧洲的军工企业虽然是国家控股或者参股，但是军事工业仍然以市场机制运行。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和未来军事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欧洲军工企业不能得到政府长期订单的保证。如果投资扩大产能但是未来局势改善后订货下降，企业很可能无法收回投资。因此，面对国家需求，欧洲军工企业的策略是延长军品的交货时间而非投资增加短期产能。第二，规模有限。欧洲国家只订购少量军品用来维持生产线最低水平的运转，将主要资金投入研制新装备，以此保持武器的先进性和市场竞争力，这种模式很难在短期内扩大生产能力。同时，由于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维护成本很高，因而欧洲国家的库存也很少。第三，目标差异。乌克兰的军事需求与欧洲国家的国防需求不完全一致，支持乌克兰的产能扩张并不能提升本国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会阻碍本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延缓新武器装备研发将导致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政府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财政资金向军工企业提供补贴。第四，缺乏组织。欧盟曾经尝试与军工企业谈判

---

① F. Fabbrini, “European Defence Union ASAP: The Act in Support of Ammunition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 defence capabil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war in Ukraine”,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24, Vol.29, pp. 67-84.

② G. Wolff, “The European defence industrial strategy: important, but raising many questions”, Bruegel, March 19, 2024, <https://www.bruegel.org/analysis/european-defence-industrial-strategy-important-raising-many-questions>

签署框架协议，以固定价格采购炮弹并由欧洲国家分别自行支付，力图将分散的小订单合并成大订单，但是这种模式由于需求总量的不确定而失败。而且，由于各国单独与国内企业签订合同，导致军工企业相互竞价，推高了硝化纤维素等原材料的价格，增加了生产成本。此外，欧洲的军事工业还面临能源价格成本飙升和知识产权争议等问题。

### 三、俄罗斯军事工业的战争潜力评估

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消耗与生产是评估战争潜力的核心指标。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在国防动员后极大地提升了产能，基本能够满足军队和前线的需求，相比于欧美国家武器弹药的短缺，证明了苏联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弊端与隐患。

#### （一）战场需求与军工生产

从战场形态来看，在冲突初期的突击作战结束后，双方主要依靠“填线”步兵和炮兵的火力支援形成战线，在装甲单位的支援下实施进攻。俄罗斯空军由于对方强大的防空火力只能执行战区外的远程打击任务，无人机则大放异彩。<sup>①</sup>因此，冲突已经演变为一场惨烈且持久的消耗战，坦克、装甲车、炮弹和无人机成为这场消耗战中的关键要素。俄乌冲突大量消耗了各方的军事装备与后勤物资，军事工业的产能成为影响持续时间和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总体上看，俄罗斯通过国防动员成功地提升了武器弹药的产量，基本能够满足前线的需求；乌克兰和西方盟友的军事工业则未能实现有效的国防动员，在短期内无法扩大生产，供应已经接近极限。

第一，武器装备的消耗与生产。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的一年内就损失了大量的技术装备（见表 2）。截至 2024 年底的初步估算，俄军至少已经损失了 1200 辆 T-72 坦克、700 辆 T-80 以及 100 辆 T-90 坦克；4000 辆 BMP 系列步兵战车、1500 辆 MT-LB 履带装甲车、1500 辆 BTR 系列轮式装甲运输车和 700 辆 BMD 系列伞兵战车；45 架苏-25 攻击机和 40 架苏-34 战斗轰炸机、50 架米-8 直升机和 70 架卡-52 武装直升机；1 艘“光荣”级巡洋舰

<sup>①</sup> A. Kharuk, “Ukraine’s Air Defence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2022-2024): Progress in Regression”, *Faces of War*, 2024, No.2, pp.141-154.

“莫斯科号”、3 艘“蟾蜍”级登陆舰、1 艘“基洛”级常规动力潜艇以及 2 艘 22800 型护卫舰。此外，俄罗斯在 2025 年还损失了 7 架图-95MS “熊”战略轰炸机和 4 架图-22M “逆火”超音速轰炸机，这相当于俄军 10% 的战略轰炸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通过国防动员恢复了坦克与装甲车的生产能力，下塔吉尔乌拉尔机械车辆厂和鄂木斯克运输机器制造厂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与修复。目前，俄罗斯每年能够生产 2000 辆坦克和 3000 辆装甲车，其中 15% 为新制造的装备，其余则为库存或翻修装备。<sup>①</sup>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和装甲车库存，总量不少于 16000 辆，其中 T-72 不少于 2000 辆，T-90 和 T-80 不少于 1000 辆。<sup>②</sup>因此，俄罗斯军事工业的产能足以覆盖坦克与装甲车的损耗，在现有库存和生产水平下，至少可以满足未来 3 到 4 年的前线需求。

表 2 俄罗斯武装部队主要武器装备战损表

武器装备类型		装备现役数量（2022 年）	装备损失数量（2023 年）	战损比
坦克	普通主战坦克	3417	1908	55.8%
	先进型号坦克	2007	731	36.4%
装甲车	步兵战车	4600	1993	43.3%
	装甲运输车	4370	729	16.7%
	伞兵战车	2173	456	21%
飞机	固定翼飞机	1225	94	7.7%
	直升机	407	76	18.7%
舰船	大型舰艇	73	16	21.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开源情报平台 Oryx 的报告统计得出。

<sup>①</sup> D. Massicot, R. Connolly, *Russian Military Reconstitution: 2030 Pathways and Prospec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4, <https://seawaves.com/wp-content/uploads/2024/09/Massicot-Reconstitution-final.pdf>

<sup>②</sup> 郭正祥、杜莉莉：“陆军的钢铁脊梁：俄罗斯坦克工业百年发展”，《坦克装甲车辆》，2021 年第 9 期，第 9-17 页。

与此相比较，乌克兰在 2023 年损失了超过 4798 辆坦克和装甲车，已经严重缺乏重型武器和补给。<sup>①</sup>随着乌克兰的军事工业遭到摧毁，乌军无法通过生产补充前线的损失，只能依靠外部援助。在军事援助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在 2022 年向乌克兰援助了 4300 辆装甲车和 750 门火炮。在 2023 年转让了 1250 辆重型载具，其中包括 31 辆 M1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61 辆豹-2A 和 14 辆挑战者坦克、600 辆布雷德利和黄鼠狼步兵战车以及其他重型装甲车。波兰援助了 240 辆苏制 T-72 坦克。但是欧洲豹 2 坦克的产量在 2023 年仅有 50 辆，2024 年以后西方国家坦克和装甲车的库存已经严重不足，只能提供翻新的豹-1A 坦克且数量有限。<sup>②</sup>因此，西方国家军事工业的产能在现有的库存、生产和损耗水平下，只能支撑乌军 1 年左右的消耗。

第二，弹药的消耗与生产。炮兵是俄乌冲突中主要的战场杀伤力量。火炮弹药的需求极为重要，由于弹药短缺，火炮系统往往不能实现满负荷运转。俄军炮兵主要使用 152 毫米口径榴弹炮。在 2023 年，俄罗斯每月平均发射 40 万枚炮弹，全年消耗 450 万枚以上。<sup>③</sup>从产能来看，俄罗斯 2022 年生产了 25 万枚，2023 年增加到 100 万枚，2024 年生产了 130 万枚并实现了稳定生产。从库存来看，俄罗斯在 2024 年初除自有库存外，还从朝鲜、白俄罗斯等国家获得了援助，尚有 1000 万枚以上的库存。此外，Kh-101 空射巡航导弹的产量从 2023 年的 200 枚增加到了 2024 年的 500 枚。9M723 弹道导弹的产量从 2023 年的 250 枚增加到 2024 年的 700 多枚。航空炸弹的 UMPK 滑翔制导套件产量从 2023 年的 2000 枚增加到 2024 年的 4 万枚，2025 年预计将超过 7 万枚。以“天竺葵-2”为代表的无人机每日产量已经提升至 30 架，年产量超过 1 万架。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大幅提高了其关键武器系统弹药

<sup>①</sup> M. Piotrowski, *Military-Technical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 Assessment of Its Short-And Medium-Term Needs*,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M), 2022, <https://www.pism.pl/publikacje/military-technical-assistance-to-ukraine-an-assessment-of-its-short-and-medium-term-needs>

<sup>②</sup> N. Marsh, “Responding to need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during the first year after the 2022 invasion”,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3, Vol.39, pp.329-352.

<sup>③</sup> D. Markov, “Use of artillery fire support assets in the attrition approach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nvironment. Technology. Resources.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Conference*, 2024, Vol.4, pp.178-182.

的产量，主要炮弹和导弹的产量增加了 3~5 倍。<sup>①</sup>因此，现在的弹药库存和产能能够支撑前线 3 到 4 年的需求。

与之相比，乌克兰炮兵由于缺少弹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乌克兰主要使用西方国家援助的 155 毫米口径榴弹炮。在 2023 年，乌克兰平均每月发射 10 万枚炮弹，全年消耗 120 万枚以上。<sup>②</sup>截至 2024 年年底，美国已经援助了乌克兰 80 万枚、韩国援助了 50 万枚。在努力增产后，2024 年美国只生产了不到 48 万枚、欧盟生产了 55 万枚、韩国生产了约 50 万枚。考虑到维持自身最低限度弹药库存的需要，乌克兰从西方国家每年可获取的 155 毫米炮弹不到 100 万枚，完全无法满足前线的需求。其中，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 7000 多枚 GPS 精确制导炮弹后，需要 7 年时间才能恢复原有库存，在增加产能的情况下，也需要 4 年以后才能实现。此外，“海马斯”（HIMARS）的火箭弹严重不足导致装备闲置；便携式导弹的弹药更加紧张，年产 2000 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年产 1000 枚的毒刺防空导弹是乌军维持战线的重要武器，但是美国受设备和供应链的影响，在两年内无法实现增产。目前，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数量已经到达了极限，继续转让弹药可能严重危及自身的库存。因此，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增加弹药产量，欧美的军事工业最多只能满足乌军 1 到 2 年的作战需求。

## （二）国防动员的效果与潜力

战争不但是交战双方军力的直接对抗，更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军事工业通过国防动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转化作用。世界主要国家的军事工业的平战转换机制都面临着成本、效率、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与实际需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以便有效地把国家战争潜力转变为军队的战斗力。

战时国防动员的效果取决于平时军事工业的发展。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军事科研与生产能力过剩、军费拮据、国防订单大幅缩减的困境。军工企业普遍遭受劳动力成本上升、设备设施老化、供应

---

① J. Cooper, “Military Production in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Start of the War with Ukraine: To What Extent Has It Increased and How Has This Been Achieved?” *The RUSI Journal*, 2024, Vol.169, pp.10-29.

② F. Gady, M. Kofman, “Ukraine’s strategy of attrition”, *Survival*, 2023, Vol.65, pp.7-22.

链韧性降低等问题的多重打击。如何发展军事工业成为各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和战争的信息化对军事工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国家安全无法回避一组核心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不断裁减军队员额、缩小军队编制规模、降低后勤保障压力；另一方面，战争突发性更强，战争物资消耗呈现出需求量大、类别复杂、技术构成高、保障时效性强等特点。为应对挑战，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军事改革都进行了管理机构的重组，推动了大规模的企业合并与技术转移，降低了军事工业的产业结构比重，促进了军工企业非军品的多元化业务发展。<sup>①</sup>俄乌冲突反映出军事工业与一般的生产活动不同，前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军事工业的管理模式和军工企业维持的规模决定了国防动员的效果。

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更加成功。俄罗斯军事工业保留了苏联时代让社会高效转入军工生产的体系架构，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制定了详细的国防动员计划，组织开展军事工业的生产。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地聚合国家的财力对军工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将民用工业融入军事工业之中，充分调动了国家整体的工业能力，实现了产能的提升。俄军的武器装备虽然技术性能并不先进，但是可靠性强，性价比突出。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扩大了军品供应链的获取渠道，而且价格管控覆盖了几乎所有国防采购领域。例如，俄乌冲突前国际市场 155 毫米炮弹价格为 800 美元/枚~3000 美元/枚，冲突爆发后已上涨至 6000 美元/枚~8000 美元/枚；俄罗斯则将国产的 152 毫米炮弹价格限定为 1000 美元/枚。<sup>②</sup>即便是乌克兰，由于军事工业保留了一定的苏联模式，哪怕缺乏详细的计划并面临资金的短缺，也能够较好地实现国防动员。当然，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管理水平不高，出现了大量的贪污和浪费，同时内部还存在类似米格和苏霍伊两个设计局之间的恶性竞争，然而以最终结果来评价，相较于美欧国家市场化模式的军事工业，其在战争冲突中还是表现得更有效率。因此，从战争经济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军事工业能够更加持久地支撑战争。

<sup>①</sup> 何奇松：“新军事变革下的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调整及其启示”，《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4 期，第 73-82 页。

<sup>②</sup> D. Besancenot, R. Vraneanu, “Explaining the ammunition shortage: the show vs. have military power game”,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25, Vol.36, pp.1-17.

西方国家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接近失败。从基础条件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大部分兵工厂和弹药厂建设于二战和冷战时期，需要升级和更换才能在国防动员中提高生产效率，过度外包则使得企业无法控制供应链，此外还面临基础设施故障、合同不可预见、履约周期短、单点故障、关键矿产和资源储备对外依赖等问题。从组织管理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军备总监会议（CNAD）、工业顾问小组（NIAG）、支持采购局（NSPA）和通信信息局（NCIA）分别负责军工生产的规划、出口许可与技术转让、跨国采购和指挥监督，协调机制极为复杂，效率低下。欧盟则缺少统一协调的国防动员机制，数据和权威不足，欧洲国家之间对本国军工企业的保护加剧了内部竞争。从运行模式看，市场机制能够降低军事工业在和平时期的维护成本，减轻财政压力，然而在战争和冲突中，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只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政府和企业由于缺少对生产和供应链的充分了解，如果单纯使用所谓的经济手段来刺激军事工业的生产，只会导致大量的无序竞争和内耗。因此，美国和欧盟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实际上增加了生产的成本而非扩大了产能，无法将资源投入和战略意图转化为军事工业的产出。

### （三）战争经济的代价与风险

胜利需要付出代价。成功的国防动员有效地提升了军事工业的产量，满足了前线的需求，但是必然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军事工业在成功实现国防动员背后，不仅承担着高昂的成本，而且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

第一，工伤事故。国防动员下的军事工业生产与和平时期的生产截然不同，由于前线战事紧急，在提高产量的要求下高强度生产，极易引发事故。实际上，后方的工厂并不比前线的战壕更加安全。<sup>①</sup>随着国防动员的不断推进，大量非熟练工人加入生产，战争压力和安全事故形成恶性循环，工伤频发不仅造成劳动力损失，而且还会陆续产生家属抚恤、工伤保险、设备损坏等一系列问题。例如，2025 年 8 月 15 日，梁赞州斯科普伊军工联合体的“埃

---

<sup>①</sup> A. E. Kersten, *Labor's Home Front: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66.

拉斯特克”工厂发生爆炸，造成 20 人死亡，134 人受伤，火药车间被完全损毁。<sup>①</sup>事故原因在于设备老化和高强度加班。该军工厂在爆炸发生前的一个月内已经发生了 11 起传输带绞断工人手臂的事故。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属于各类危险源密集的工业部门。在和平时期，事故和伤亡人数由于设备老化和管理松懈等问题已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sup>②</sup>俄乌冲突爆发后情况更加严重。参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在战争动员后第一年美国兵工厂的事故增加了 20%。<sup>③</sup>1943 年发生了 241.4 万起事故，工伤引起的死亡和伤残人数超过了前线士兵的伤亡数量，损失超过 9 亿美元。<sup>④</sup>以类似标准保守估计，2022 年后，俄罗斯每年军工企业的事故应该超过 90 万起，损失超过 50 亿美元。

第二，债务风险。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武器弹药等绝大多数军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便退出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被战争所消费，这实质上是对社会年产品的扣除。军品的生产取决于军事需求，战争时期的军事需求与平时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军事工业在平时有许多专用设备、专用生产线不可能充分利用，不得不封存闲置，战时则需要飞速运转，进行急剧的扩大再生产。因此，军事工业国防动员的经济成本极高，正常的财政不可能覆盖战争支出，国家必须通过举债支撑战争。<sup>⑤</sup>政府战争债务的扩张会导致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从而增加借贷成本，加剧债务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升高，而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则会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偿债能力和债券的投资回报率，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实现了有效的国防动员，但是其实际付出的经济代价远超当前可见的国防预算。考虑到俄罗斯长期以来存在的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冲

① “俄罗斯梁赞州工厂火灾事故遇难人数升至 20 人”，新华网，2025 年 8 月 18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818/ef54179080ee49db85805c0f6da8d137/c.html>

② 瞿小为、沈瑞琪、E. B. 尤尔托夫等：“2009—2018 年俄罗斯兵器工业事故统计分析及启示”，《安全与环境学报》，2020 年第 6 期，第 2456—2464 页。

③ M. H. Hansen, comp.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17. No. 6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p.217.

④ 陆乐：《战争总动员：美国二战国内史》，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年，第 207—212 页。

⑤ Shatz H. J., Reach C., *The cost of the Ukraine war for Russia*, RAND, 2023, <https://apps.dtic.mil/sti/html/trecms/AD1216976>

突前已经长期持续膨胀，中央财政可能会在未来遭受致命打击。<sup>①</sup>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存在被债务压垮的风险。

第三，政治风险。战争会严重消耗国家资源，激化社会矛盾，削弱政府权威与合法性，并可能引发外部势力干预，使本就脆弱的政权失去民心和执政能力，最终走向覆灭。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沙皇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上的失败和战争经济的混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民众不满，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市民 1917 年的饥饿抗议活动升级为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sup>②</sup>失误的国防动员可能会引发动乱和革命，促使政治秩序的崩溃。在政治结构上，俄罗斯当前的国防动员已经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地区间的不平衡加剧。<sup>③</sup>此外，国防动员后军事工业的过度发展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苏联的军工复合体虽然增强了国家安全，但是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工业生产参加军备竞赛，忽视民生需求，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④</sup>俄罗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新形成的军工复合体，军事工业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效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更加难以保证，资源和利益分配更加容易被操控，由决策失误引发系统性的政治风险。

#### 四、结 论

金钱买不到安全。大量研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不具有威慑力，因为在 2022 年其经济规模仅为 2 万亿美元，而北约国家的经济规模高达 46 万亿美元。但是经济规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尽管经济发展困难，俄罗斯在冲突爆发以后武器弹药的产量却超过了北约国家的总和。俄乌冲突的实践证明，国家需要全面考虑军事工业的发展模式，否则在战争中将无法

<sup>①</sup> 杨攻研、曲文轶：“俄罗斯政府债务演进的政治经济逻辑及风险研究”，《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77-100 页。

<sup>②</sup> Шапкин И. Н.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2017. Т.204. С.259-266.

<sup>③</sup> I. Busygina, M. Filippov, “The Impact of War on Center-Regional Relations in Russia: The Case of Defense-Linked Regions”, *Russian Politics*, 2025, Vol.10, pp.1-21.

<sup>④</sup> C. Dav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in the USSR”,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92-124.

实现有效的国防动员。武器装备的研发周期长且风险高，在和平时期的采购量少、价格昂贵，生产和储存的成本巨大，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因此，军事工业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具有天然的计划经济属性。军事工业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处于核心地位。政府通过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维持军事工业的成本，但必将面对市场失灵的考验。西方国家妄图利用市场，将运营军工企业的风险转嫁给资本市场的投资人，这实际上是政府一种逃避责任的选择，最终也会遭到国家安全的反噬。军工企业如果被推入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保证其获得必要的收益，否则恶性竞争会严重伤害军事工业，导致在战时无法实现有效的国防动员。因此，即便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家在和平时期也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对本国的军事工业进行超额补助，保持强大的军事工业才能实施有效的国防动员，高效地转化国家的战争潜力是最终赢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Abstrac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sector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outcome of wa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isplays typical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intelligentized warfare, in which Russia,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expended massive quantities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r economy, the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sector is a key indicator for assessing battlefield dynamics and anticipating future trajectories. By compar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 foundations,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s, and ultimate operational resul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Russia's highly centralized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an, under administrative directives, respond rapidly to defense mobilization requirements, fully leverage national war potential, and significantly expand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hereby providing continuous supplies to the front. Western countries' market-based military-industrial sectors, although receiving substantial investment, have struggled to achieve effective defense mobilization, which constrains their ability to translate economic strength into military combat power. Practice suggests that,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Russia's model of defense mobilization i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sector is better aligned with the demands of intelligentized warfare. A fully market-driven approach i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sector is not only inconsistent with principle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but may also undermine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Russi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efense Mobilization, War Economy

**【Аннотация】**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грает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в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исхода войны.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типичные черт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войны, в которой Россия, Украина,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потребляют огромные объемы оружия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показателем для оценки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и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будущих событий. Сравнивая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базу, систему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обороны и конечную оперативну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онфликтующих сторон,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высоко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ая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действу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и директивами, способна быстр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обороны,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траны,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наращива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мощности по выпуску оружия, техники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а также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непрерывное снабжение фронта. Хотя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на рынок военные отрасли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также получи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они не смогли добиться эффектив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обороны, что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еобразовыва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мощь в бо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актика показала, что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войны. Внедрени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ыноч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м секторе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принцип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но и подрыва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в оборонном секторе,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责任编辑 崔 玘)

# 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动员机制与 国家能力增长问题研究

张君义\*

**【内容提要】**在俄乌冲突升级后，尽管俄罗斯受到极限制裁与军事冲突的影响，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仍然处于较高的增长态势，而既有的理论和方法尚且不能对这一现象给出有效的解释。在梳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研究、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军事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作者以苏联学/俄罗斯学的新兴理论——动员型发展模式理论为工具，以俄罗斯在法律、财政、劳动力和科技领域启动的动员政策为切入点，以动员政策在“稳经济、保供应”方面的绩效表现为证据，展示动员政策的引入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研究发现，俄式动员的底层逻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依托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前提下，俄罗斯以建立中央政府对全社会资源和产能的强力控制和构建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力且严密的供应链规划，为跨越政策启动的最低资源阈限创造条件，并以资源在宏观层面的集中调配和在指定领域的超额投放的方法来提高关键政策目标的实现速度和成功率。应用分析表明，在绩效层面，动员政策的启动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还满足了俄罗斯的军事需求。但是，既有的动员政策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且会对俄罗斯国家能力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动员机制 国家能力 俄乌冲突 总体战

**【中图分类号】**D8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098(34)

\* 张君义，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实际意义

截至 2025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了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的泥潭，但它的西方对手却更早进入了战争疲劳状态（War fatigue）。和 2022 年的乐观情绪相比，西方国家的公众在 2024 年已经对俄乌冲突表现出极大的厌倦情绪。<sup>①</sup>毫无疑问，这种厌倦情绪已经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对俄决策的关键内政因素之一。<sup>②</sup>这种厌倦情绪带来的内部压力将会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的欧亚政策，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开始在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大国博弈中取得了相对优势。<sup>③</sup>

这种情况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出乎意料的。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即 2014 年前），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和俄罗斯研究界对俄罗斯是否属于第一等（tier 1）强国这一问题展开了许多辩论。较早期的一些著作和研究认为：俄罗斯孱弱的国民经济不足以支撑其内外政策，经济上虚弱的俄罗斯将很快沦为二等强国。这种观念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他们坚信，只需要强有力的对俄制裁和适当的对乌援助，俄罗斯必定会在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崩溃，<sup>④</sup>随之而来的就是普京政权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总崩盘。<sup>⑤</sup>

但事实并未按照西方政客和学者的预期发展。在经济上，俄罗斯国民经济在经历了极限制裁初期的短暂波动后，在当年就实现了企稳回升，并在

---

① “Support for Ukraine ‘until it wins’ falls sharply in western Europe, poll finds”, *Guardian*, December 26,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dec/26/support-for-ukraine-russia-war-yougov-poll-survey>

② “Americans Prioritize Domestic Spending over Foreign Aid”, *Global affairs*, August 12, 2024, <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prioritize-domestic-spending-over-foreign-aid>

③ 从 2022 年 9 月底启动部分动员开始计算，约 40 个月的消耗加深了援乌阵营的裂隙，表明消耗战战法的政治效应开始凸显。See “The Second Front in The War of Attrition: Moscow is achieving greater success in destabilising European politics than on the battlefield in Donbas”, October 10, 2025, <https://re-russia.net/en/Analytics/0353/>

④ “Defeating Putin in Ukraine Is Vital t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022,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defeating-putin-in-ukraine-is-vital-to-the-future-of-democracy>

⑤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September 2022,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2/09/regime-change-in-russia.html>

2023 年和 2024 年表现出色，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政治上，国家治理和政治体系也相当稳健。俄军的撤退、部分动员的启动和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大规模“武装上访”等，都没有对政权稳定性带来直接冲击。随后，俄罗斯的总统大选、议会上下院改选、地方杜马的改选大都顺利进行。在意识形态方面，俄罗斯平民和精英对“反西救国”叙事的认可程度也在逐步提高。<sup>①</sup>在军事上，长期、高烈度的消耗战并没有耗尽俄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前线态势和整体态势一直在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乌克兰经营了十余年的永备工事群和筑垒地域在俄军新战术和新战法面前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俄罗斯军事工业已经初步走出产能爬坡周期，俄军的纵深打击能力和打击强度明显提高。显而易见，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对一些既有研究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些研究不过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迎合民选政客主观判断的陈词滥调。<sup>②</sup>

新的现象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一些俄裔和东欧裔研究人员寻求基于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的解释。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军事生产支出作为高科技生产的一种形式，可以发展整个技术部门，并为民用生产的各种经济指标设定标准。与此同时，这种增加的支出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从而通过增加总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物质利益与国家的军事努力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军事凯恩斯主义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正面政治影响，通过增加军费开支，便可以从相应的社会群体处获得忠诚和支持。支持该观点的学者包括伊什琴科、马特维耶夫、茹拉夫列夫、伊诺泽姆采夫等人。<sup>③</sup>

---

① “Two types of Anti-Western Sentiment: How Russians’ views on Russia’s place in the world differ from Putin’s views”, October 10, 2024, <https://re-russia.net/en/review/779>; K. Pynnoniemi, K. Parppi, “Understanding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Political, eschatological and cataclysmic dimens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24, Vol.47, No.6, pp.832-859.

② “Reforging the Russian World: Gorbachev, Puti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 *American affairs journal*, May 2024, <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24/05/reforging-the-russian-world-gorbachev-putin-and-russian-nationalism>

③ “Russia’s military Keynesianism”, October 26,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2/10/26/russias-military-keynesianism>; “Russian Military Keynesianism: Who Benefits from the War in Ukraine?” September 2022,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Pepm\\_865\\_Ishchenko\\_Matveev\\_Zhuravlev\\_November2023.pdf](https://www.ponarseur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Pepm_865_Ishchenko_Matveev_Zhuravlev_November2023.pdf); “Will Russia’s Central Bank be able to stop the economy from overheating?” August 2, 2024, <https://ridl.io/will-russia-s-central-bank-be-able-to-stop-the-economy-from-overheating/>

具体而言，这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创造了大量的经济需求，而外部制裁使得原本会流向西方国家的“资源卢布”流回俄罗斯，构建了一套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内循环体系。相当部分俄罗斯人受益于这种经济内循环体系，如在军事工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工作的工人、工程师及管理人员，强力部门的雇员，致力于阶层跃升的志愿兵，<sup>①</sup>致力于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企业主，<sup>②</sup>甚至是发战争横财的寡头。<sup>③</sup>相应地，对于这些人而言，支持现政权变成了一种主观和客观上都十分合理的选择。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并不能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解释为什么俄罗斯能够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迅速集中资源并扩充军工生产能力，也无法预测俄罗斯能够坚持多久。

除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认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韧性，是执行一种名为“俄罗斯堡垒”的战略带来的。<sup>④</sup>目前，由于该战略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的思想脉络还没有被清楚地披露和总结，所以“俄罗斯堡垒”更类似于一种政策修辞，而非解释现象的理论。

因为既有的那些常见理论难以解释俄罗斯在恶劣国际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韧性（即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来推行其政策），所以西方乃至乌克兰政界正在拥抱一种新的、基于阴谋论的解释，即“中国祸首论”。在一些西方和乌克兰政客看来，俄罗斯原本虚弱无比，中国的直接援助才是俄罗斯在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所体现的韧性的根源，甚至据此将欧洲乱局的责任推给中国。<sup>⑤</sup>

① “Keynes in jackboots: can defense spending sustain Russian economic growth?” June 23, 2023, <https://en.thebell.io/keynes-in-khaki-can-defense-spending-sustain-russian-economic-growth>

② “How Russian Elites Made Peace with the War”, *Foreign Affairs*, June 28,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how-russian-elites-made-peace-war>

③ “Proekt: Some 81 Russian oligarchs involved in business with Russian defence industry and army”, *Novaya Gazeta*, July 31, 2023,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3/07/31/proekt-some-81-russian-oligarchs-Involved-in-business-with-russian-defence-industry-and-army-en-news>

④ 李勇慧、吕贞蓉：“俄战略界抛出‘俄罗斯堡垒’论”，《世界知识》，2024年第10期，第57-59页。

⑤ “中国反驳向俄罗斯供应火药等物资反对政治操弄”，联合早报，2025年5月27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me/china/story20250527-6484552>

所以，我们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希望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当前情况的理论工具，并回答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俄罗斯能够在恶劣国际环境中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来推行其政策？现实意义主要包括：第一，该理论工具可以为分析和预测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创造条件；第二，该理论工具也可应用在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强化的场景，有助于增强对特定国际问题叙事方案的说服力。

## 二、动员作为解释俄罗斯增强其国家能力的一种路径

国家能力通常可被简明地理解为“国家将自己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由“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调控能力（steering capacity）、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 capacity）以及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组成。<sup>①</sup>我国学者张宇燕指出，“国家间博弈的基础在于国家能力”，依照国家能力的目的分类，“可以笼统地分解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毁灭文明的能力”<sup>②</sup>。

相应地，俄罗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的态势转换，反映出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家能力增长，特别是对内的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强制能力、以及对外毁灭能力的增长。所以，除了上文提到的解释路径外，还有一种基于俄苏研究的解释路径，即围绕术语“动员”展开。此种路径早在 2022 年之前就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许多学者的支持，<sup>③</sup>俄文和英文的相关成果产

---

①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7 页。

② “张宇燕：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2022 年 2 月 9 日，[https://brgg.fudan.edu.cn/articleinfo\\_4595.html](https://brgg.fudan.edu.cn/articleinfo_4595.html)

③ Баканов С. А.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его компоненты.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 №.6. С.127-132; Баканов С. А.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 №.18. С.87-92; Воронцов С. А.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XXI в.// Власть. 2015. №.5. С.23-28. 2015—2016 年，西方军界和军控界就关注到俄罗斯尝试重建具有举国特征的动员机制。See “Russian State Mobilization: Moving the Country on to a War Footing”，May 2016,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16/05/russian-state-mobilization-moving-country-war-footing>; J. Cooper,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a more Militant Russia”，*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2, No.2, pp.129-145.

出，自 2022 年起呈现出井喷之势。<sup>①</sup>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动员与俄罗斯国家能力迅速增长之间的关系。

“动员”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军事科学领域，指一国政府为全面战争（total war，又译为“总体战”）而调动所能控制的一切资源，以谋求在军事领域获得优势。所以，动员在传统意义上与国家能力的“黑色部分”，即和“毁灭文明的能力”紧密相关。

俄罗斯的动员是一种建立在坚实的、久经考验的军事运筹学理论基础上的决策。1915 年，沙俄军官奥西波夫（М. Осипов）推导出一组可用于描述和分析战斗损耗的公式。他指出，在技术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战斗力与部队规模的平方成正比，且人数最多的一方承受的绝对损失较小。如己方在质量上相对占优势，那么通过增加现役部队的数量就可以为己方赢得时间，减少损失。如对手方在质量上相对占优势，那么通过增加现役部队的数量就能使对手蒙受更大损失，而不会增加己方的损失。<sup>②</sup>此外，由于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作战想定和实际情况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战事开始后，提高部队的补充速度和换装速度是确保战场主动权的最有效工具之一。<sup>③</sup>此

① Иванов О. Б., Бухвальд Е. М.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нализ, практика. 2022. №3. С.7-27; Шапсугова М. Д. Моб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спос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3. С.177-186; J. Cooper, “Military Production in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Start of the War with Ukraine: To What Extent has it Increased and how has This Been Achieved?” *The RUSI Journal*, 2024, Vol.169, No.4, pp.10-29; A. Yakovlev, “From Hybrid to Mobilisation: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and the challenges of it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July 1, 2025, <https://re-russia.net/en/expertise/0315>

② 定性分析作者参考了美国陆军研究人员的罗伯特·赫姆博尔德（Robert Helmbold）的论文，详细数学推导可参考 R. Helmbold, “Osipov: The ‘Russian Lanchester’”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65, No.2, pp.278-288; 当前俄罗斯军事运筹学教材仍然将奥西波夫-兰彻斯特定律（Закон Осипова-Ланчестера）视为理论分析的关键模型之一。См. Новикова Д. А. (под ред.) Модели военных, боевых 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М.: ЛЕНАНД. 2025. С.199; 康涅狄格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在 2023 年就运用这一工具预测动员启动后俄乌战场的态势变化。See P. Turchin, “What Osipov and Lanchester Tell Us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 July 11, 2023, <https://peterturchin.com/what-osipov-and-lanchester-tell-us-about-the-war-in-ukraine>

③ “Mobiliz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y University Press*, March-April 2021,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Journals/Military-Review/English-Edition-Archives/March-April-2021/Bachmann-Mobilization/>

即俄罗斯/苏联传统消耗战军事学说的军事运筹学基础。这也意味着，政治决策必须尊重战争的基本规律，即当战争——特别是消耗战和全面战争——作为政治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出现和施行的时候，战争期间政治架构的重塑和治理体制转型，必须要向着能够为战争提供更多可用资源的方向发展。德国在一战期间的总动员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在战争条件下具有弹性，可以通过特定的政治技术促使其向满足长期消耗战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动员”虽然是一个诞生在一战时期的概念，但其基本理念却更早在俄罗斯的文化潜意识中扎下了根。俄国革命史<sup>②</sup>、苏联史<sup>③</sup>、俄罗斯现代史<sup>④</sup>表明，无论俄国人信奉何种意识形态，建立何种政体，他们都热衷于奉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管理原则。所以，俄罗斯经济学家普罗霍罗夫（А. П.

---

① F. Asschenfeldt, M. Trecker, “From Ludendorff to Lenin? 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s of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Europe-Asia Studies*, 2023, Vol.76, No.1, pp.10-28.

② 俄罗斯早期左翼革命者，如涅恰耶夫等人热衷于将人民编入统一的劳动集体，通过执行严酷的劳动纪律和生活纪律，来最大化集体产出，最小化消费。这些被称为兵营共产主义（казарм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的观念旨在将物资进行集中，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苏俄早期计划经济实践则被认为受一战期间德国的总动员影响颇大。See F. Asschenfeldt, M. Trecker. “From Ludendorff to Lenin? 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s of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Europe-Asia Studies*, 2023, Vol. 76, No.1, pp.10-28; 所以一些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视为兵营共产主义的实践史。См. Бутенко А. П., Кадочникова Т.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казарме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0. №.6.

③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直接将苏联的计划经济归类为一种以准备战争为目的的经济。See O. Lange, “The Role of Planning in a Socialist Economy”, in P. F. Knightsfield (ed.)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xford: Pergamon Press &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70; R.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Vol.5, No.4. pp.11-27; L. Schapiro, *Totalitarianism*. N.Y.: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Харченко И. С., Харченко Л. И., Иванов В. Е., Иванова Д. 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2021. №.3. С.146-153; Седов В. В.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дель. Челябинск: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3. С.177.

④ 一方面，这是指当代俄罗斯人依赖苏联经验，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另一方面，这是指把持社会和国家的强力集团更习惯使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来管理社会和国家。См. Плискевич Н. М. “Path dependence” и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Мир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я. Этнология. 2016. №.2. С.123-144; 亚·卢金、周良：“普京的俄罗斯——法律的独裁还是合法的独裁”，《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4期，第134-137页。

Прохоров) 在《俄罗斯管理模式》(Русская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一书中深刻地指出, 由于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的四战之地, 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战事早已使社会分化为生产者和战斗者两个部分。将维持和扩大再生产以外的全部资源投入关键项目(如战争)以谋求生存, 是俄罗斯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sup>①</sup>这也意味着, 俄罗斯人习惯于使用同一种管理逻辑来增强国家能力的另一个部分, 即“创造财富”。<sup>②</sup>

所以, 术语“动员”在当代也被研究人员借用至社会科学领域, 用来描述和解释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迥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sup>③</sup>一般而言, 在苏联/俄罗斯研究领域, “动员”一词首先是指在紧急条件下对资源的高强度汲取和高强度集中运用, <sup>④</sup>特别是强调国家对社会所有可支配资源建立控制并指导它们实现单一主导目标的愿望和行为。<sup>⑤</sup>可被动员的资源的种类可以根据其性质进行划分: 物质资料、智力资源、时间、人力资本等。<sup>⑥</sup>由于“动员”这一术语的内涵还强调资源集中是为了实现单一主导目标, 所以这些目标可以是具体的或者是笼统的: 如应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危机, <sup>⑦</sup>通过最有效地利用既有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生产现代化, <sup>⑧</sup>还可以是“优先发展某些战略领域”。<sup>⑨</sup>根据这些目的, 动员也可以分为几种可以互相切换的类型,

---

① Прохоров А. П. Русская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тудии Артемия Лебедева, 2017. С.106-114.

② Никифорук В. П.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ида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2001. С.1-30.

③ Баканов С. А.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 №.18. С.87-92.

④ Там же.

⑤ L. Schapiro, *Totalitarianism*. N.Y.: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⑥ Шадрин А. Ю.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в СССР (1945-1991 гг.). Кризис и попытки его преодоления// *Genesis: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3. №.2. С.29-50.

⑦ Седов В. В.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от практики к теор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елябинс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9. С.7-8.

⑧ Глазьев С. Ю. Пора объявлять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 апреля 1999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15386>

⑨ Дутин А. Г. Дл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еобходимы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2006. <http://viperson.ru/wind.php?ID=408055&soch=1>

即军事动员、生产动员和投资动员。<sup>①</sup>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动员的实质是通过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和生产力，并为特定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治意志的落实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sup>②</sup>

除此之外，在俄语语境下，“动员”这一概念还强调所暗含的，具有强制性、指令性、目的性<sup>③</sup>和应急性<sup>④</sup>的组织和管理办法在和平时期和战时的广泛应用。这些组织和管理办法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政治意志（首长决心）主导：制度建设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常是以强化制度建设的形式来应对具体问题；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导向：以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否有利于完成任务为指导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在该体制内，圆满完成任务被视为一种政治责任；高度集中的管理、指挥和控制模式，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科层制和等级制，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高度的政治团结；通过政治鼓动、意识形态拉动、物质刺激和刑事处罚来确保劳动纪律；根据政治需要制定优先级列表，对高优先级项目进行重点保障；根据任务需要组建结构性任务单元，每个单元只负责指定任务，并针对任务需求高度特异化且只对直接上级负责。<sup>⑤</sup>

在俄罗斯，动员经济（*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在内涵上具有特殊性。汉语术语“经济”一词可对应在俄语语境中两个语义互相矛盾的概念。俄语词 *экономика* 更强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俄语词 *хозяйство* 更加强调确保实际生存需求。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动员状态下已经没有 *экономика* 的概念了，因为经济刺激和杠杆已经完全失效——这里只有必须完成的生产任务，即 *хозяйство* 的范畴，而较少甚至完全不考虑

---

① Иванов О. Б., Бухвальд Е. М.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нализ, практика. 2022. №.3. С.7-27.

② Шапсугова М. Д. Моб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спос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3. С.177-186.

③ Воронцов С. А.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XXI в. //Власть. 2015. №.5. С.23-28.

④ Фонотов А. Г. Россия: от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73-100.

⑤ Баканов С. А.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его компоненты» // *Magistra Vita*: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наукам и археологии. 2013. №.6. С.127-132; Лубский Р. А. Поняти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2013. №.4. С.110-114.

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或产品的经济性。在动员状态下的生产任务通常有时限、数量和一定的质量要求，<sup>①</sup>而且其产品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满足市场参与者的直接需求无关。<sup>②</sup>

一般来说，俄式动员经济的基本特征如下：就目的而言，俄式动员经济旨在为确保国家安全提供物质保障，实现最大可能的进口替代；国民经济建设的优先方向以政治文件的形式确定，具体的实现形式（经济计划）被赋予法律地位；具有明确数据指标的经济计划变成一种指令，完成这些计划被视为一种政治义务；国家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集中所需资源；更重视实体产品的生产，强调高积累率的实现；实现高积累率的手段是有限的市场和货币关系；即在确保社会所有成员基础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由国家占有绝大部分经济产出。<sup>③</sup>但需要强调的是，俄式动员经济并不意味着和计划经济捆绑，仍然可以在市场条件下运作。<sup>④</sup>

在经济管理模式上，更具体地说，其特征是：集中控制、规划式管理，上级对任务计划、绩效评价、奖励多寡拥有绝对、任意的控制权；严格的、高度集中、精确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正式配给——即对生产者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实物或准实物性质的行政或类行政分配；全面且精细的价格控制，建立相对固定的价格体系；经济绩效评估以产量为核心，成本为辅助，不重视单

---

① Берсенев В. Л.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Magistra Vitae*. 2016. №.1. С.15-20.

② Берсенев В. Л.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ки: опыт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Шестая ежег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афедры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8 февраля 2016.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МЦ УПИ, 2016. С.16-20.

③ Седов В. В.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дель. Челябинск: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3; Воронцов С. А.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типа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XXI в.//*Власть*. 2015. №.5. С.23-28; Харченко И. С., Харченко Л. И., Иванов В. Е., Иванова Д. 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2021. №.3. С.146-153; Лагутин О.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мод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в условиях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до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2021. №.2. С.208-222; R.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Vol.5, No.4, pp.11-27; Шапсугова М. Д. Моб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спос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3. С.177-186.

④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уть к процветанию или развалу России?»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редак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ы (1999). <https://rusotchestvo.narod.ru/finansy/f49.html>

一企业实现货币利润。<sup>①</sup>

综上所述，俄式动员政策的核心是通过以下手段实现给定的政治目标：建立起中央政府对全社会资源和产能的强有力控制和支配，构建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力且严密的供应链规划（包括价格控制、稀缺资源的集中分配），在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中广泛普及泰罗制管理模式以及国民经济和国家管理的泛政治化转型。这四类手段分别对应增强俄罗斯的国家汲取能力、国家调控能力以及国家强制能力，所以必然有助于增强俄罗斯“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即国家能力）。”<sup>②</sup>

而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说，动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进而提高俄罗斯在大国博弈中的议价权，<sup>③</sup>可以从以下角度解释：第一，通过压缩民间需求，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增强国家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相应的，由于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占社会总可支配资源比例高，所以更能满足特定政策执行的物质资料需求（更易跨越政策启动的最低资源阈限）；第二，由于资源在指定领域的集中调配和超额投放，所以关键政策目标的实现速度和成功几率也会随之上升。<sup>④</sup>

显而易见，俄罗斯在恶劣国际环境下国家能力的增长，可被视为执行典型战备动员政策的必然结果。所以，作者可以从理论角度作出预测：第一，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增长，特别是抗制裁能力和军事能力相关部分的增长，可以通过执行动员政策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提高；第二，动员同样会成为这种国

---

① R.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Vol.5, No.4, pp.11-27; Шапсугова М. Д. Моб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спос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3. С.177-186.

②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7 页。

③ 关于动员措施如何影响大国博弈还可以参考 A.Tarar, “Military Mobilization and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3, Vol.39, No.3, pp.343-366.

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兰德公司的对苏研判均有提及类似结论。See “Soviet In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June 1, 1998,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26296.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26296.pd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oviet Military Spending”, April 1, 1975,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80724.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380724.pdf); S. A. Becker, *The Burden of Soviet Defense: A Political-Economic Essa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81. <http://www.rand.org/pubs/reports/2008/R2752.pdf>; W. Charles Jr., S. W. Popper, *Defense and the Soviet Economy: Military Muscle and Economic Weaknes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2.

家能力增长的限制性因素。

### 三、俄罗斯已采取的部分动员措施

正如上文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具有在恶劣地缘政治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国家能力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储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这种历史经验和制度储备不仅体现为专注于军事层面的部分动员政策，而且体现为一系列旨在集中俄罗斯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其注入国家核心项目的一系列政策。

#### （一）在法律上启动动员

正如俄罗斯法学家马扎耶夫（В. Д. Мазаев）所指出的那样，“动员经济的宪法和法律外壳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旨在集中社会和国家的资源，利用与经济相关的紧急和/或非常性质的法律手段和方法来解决经济发展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了实现普遍重要的目标，扩大了公共当局的权力，并在经济层面限制了公民的权利”<sup>①</sup>。这种限制本身，必须以法律上特殊情况的引入和前所未有威胁存在为前提。

在俄乌冲突发生的第二天，俄罗斯就从法律上启动了经济动员机制。2022年2月25日生效的29-ФЗ号法令规定，商业银行须按照政府指令为承接国防订单的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sup>②</sup>随后，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新的立法，规定承接政府合同和国防订单的法人实体将无权拒绝由行政机关分配的、旨在实现和保障俄罗斯海外利益的政府合同和国防订单。<sup>③</sup>

俄乌冲突爆发近半年后，2022年7月25日生效的272-ФЗ号法令明确规定，俄罗斯政府有权为确保在境内或境外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而引入经济动员措施，并有权为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限和排班方案提供法律保障。<sup>④</sup>

---

① Мазаев В. Д.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и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в экономике // Право. Журнал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2, №.5. С.177-197.

② Внесе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закон о гособоронзаказе. 25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67867>

③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военных операций РФ за рубежом в экономике могут вводиться спецмеры. 5 июля 2022 г. <http://duma.gov.ru/news/54834/>

④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4.07.2022 N 272-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除此之外，2022 年 8 月 1 日，在 1365 号法令中引入了特殊许可，允许承接政府和国防订单的企业在未经雇员同意的情况下，确保其在一年内每周必须工作 60 小时以上。当面临政府和国防订单未能按期交付的情况，承接订单的企业有权在未经雇员同意的情况下延迟年假和休假的兑现。<sup>①</sup>2022 年 9 月 24 日签署的 365-Ф3 号法令修改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部分内容，新增了对未能完成国防和政府订单的责任人的刑事处罚条款。对于未能按时、保质保量交付政府和国防订单的企业法人或相关责任人，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将会被判处十年监禁。与此同时，承接国防和政府订单将被视为企业应当负担的强制性的社会义务（特别是在军队和政府认为企业拒绝承接政府和国防订单理由不够合理的情况下），<sup>②</sup>而无法确保国防和政府订单的按期交付将会受到刑事处罚。

而军事动员状态的部分引入，则是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普京签署第 647 号总统令开始的。<sup>③</sup>随后，在 2022 年 10 月 19 日，普京签署了第 756 号和 757 号总统令，<sup>④</sup>要求在新并入俄罗斯的地区实施戒严，并根据地理区位和对于“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对不同联邦主体和行业进行有组织、分批次、多层次和强度不同的军事生产动员。2023 年 10 月，俄罗斯政府通过决定，允许军事工业根据订单需求使用所有类型的战略储备，并且不对数量作出限制。<sup>⑤</sup>总的来说，俄罗斯在法律上确保了资源、产能向保障军事行动的方向集中。

---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1.08.2022 № 1365 «Об о 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труд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их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х и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ктах».

② 在军队和政府认为拒绝理由不够合理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军队和政府与所确定企业强制签订政府和国防订单。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ВАС РФ от 01.07.2014 N2449/14 по делу N A55-14242/2013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09.2022 № 647 «Об объявлении частич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9.10.2022 № 756 «О введении воен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и Херсон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9.10.2022 № 757 «О мерах,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ых в субъект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9 октября 2022 г. № 756».

⑤ Шойгу заявил, что кабмин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прав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 ОПК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се резервы. 17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armiya-i-opk/19034111>

## （二）启动财政动员

当代俄罗斯的动员实践并不排斥市场机制。相对复杂的计划经济而言，国家可以在市场条件下通过“非常简单而且具有高度方向性”的动员经济工具来从国内外每一个法人和自然人身上获取到所需的实物和产能资源。<sup>①</sup>这意味着，货币的性质在动员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在动员政策的视角下，货币并非“一般等价物”，而是通过市场手段调动资源的凭证——有货币，就可以调动资源。所以，当代俄罗斯的经济动员更加侧重于通过货币的政策性汇集和集中运用来引导和约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运转，也就是所谓的“余钱收集制”。

“余钱收集制”的第一个外在表现是增税。在新的税收结构中，暴利税（windfall tax）的比重大幅提高。2023年，俄罗斯政府对利润超过10亿卢布的公司征收暴利税，筹集了3190亿卢布。当局还对出口产品征收临时汇率税，从2023年10月1日起直至2024年年底。2024年初，包括利润税和所得税在内的一系列的税额也有所调整，其中所得税税负较之前提高了14%，企业利润税税负提高了25%。按照新的税率和去年已征收的税额来计算，2024年的企业利润税将为俄罗斯国库带来超过10万亿卢布的直接收入。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提高了特定行业的矿产开采税，涉及黄金、肥料等多个行业。<sup>②</sup>俄罗斯政府还在2025年第三季度调整了税务政策，将增值税征税比例从以前的20%增加到22%。预计这一调整将每年最高为俄罗斯国库带来2万亿卢布的税务收入。此外，小企业的税务优惠门槛也被大幅度提高：任何年营收超过1000万卢布的小型企业，将不再享有增值税税收优惠。彩票业也被要求为胜利“作出贡献”，作为合规要求，全俄所有彩票公司必须将5%的流水和25%的利润缴纳给政府。<sup>③</sup>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税收稽征工作也在

---

<sup>①</sup> Шапсугова М. Д. Мобил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к спос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3. №3. С.177-186.

<sup>②</sup> “Russia Turns to Tax Hikes, Other Measures to Fund Its War”, Carnegie Endowment, June 7,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politika/2024/06/russia-war-economy-mon-ey?lang=en>

<sup>③</sup> “The Kremlin is raising taxes to fund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September 25, 2025, <https://meduza.io/en/cards/the-kremlin-is-raising-taxes-to-fund-the-war-against-ukraine-here-s-what-you-need-to-know>

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份立法提案显示，俄罗斯政府计划自 2027 年起，向低于 200 欧元的跨境电商订单征收每单销售额 5% 的增值税。到 2030 年，增值税稽征比例将达到每单销售额的 20%。<sup>①</sup>

“余钱收集制”的第二个外在表现是吸引居民储蓄。20 世纪 90 年代的混乱使得俄罗斯人养成了用高储蓄来应对风险的生活习惯。整体而言，俄罗斯人大约有 40 万亿卢布~50 万亿卢布的个人储蓄。这些资金基本不参与经济活动，因此有必要通过经济和政治工具将这笔资金注入国内市场。<sup>②</sup>俄罗斯政府和央行被指派负责此类任务。他们在 2024 年吸引了 2500 亿卢布的存款以助力国家项目运作。<sup>③</sup>而在 2025 年，他们计划利用类似的办法再吸纳 7500 亿卢布的新存款，并力争使这一数字在 2026 年达到 GDP 的 1%。<sup>④</sup>高利率还使得俄罗斯人存款意愿上升，来自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高速增长。根据俄央行披露的数据，2023 年俄罗斯人的银行存款增加了约 9 万亿卢布，2024 年则为约 13 万亿卢布。储蓄总额在 2025 年 7 月达到了约 70 万亿卢布的新峰值。<sup>⑤</sup>

“余钱收集制”的第三个外在表现是强外汇管制。长期以来，资本流失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一项顽疾。俄罗斯的资本流失问题首先表现为富人在海外的大量直接存款。根据俄罗斯政府部门的相关估计，俄乌冲突爆发前，约 59 万俄罗斯税务居民在海外拥有超过等值 13 万亿卢布的直接存款。<sup>⑥</sup>资本外逃的现象也十分严重。2015—2020 年，仅通过俄罗斯跨国企业外逃的资本总额就达到了 GDP 的 0.8%，累计金额约 1540 亿美元。<sup>⑦</sup>为了应对资本流

---

① “Russia Legislates for VAT On B2C E-Commerce Sales”, October 8, 2025, <https://www.vitallaw.com/news/russia-legislates-for-vat-on-b2c-e-commerce-sales/gdn01171541>

② Минфин планирует привлечь 40 трлн рублей средств граждан для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экономику. 21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9602203>

③ Минфин запланировал привлечь ₽750 млрд в программу ПДС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5 марта 2025 г. <https://www.rbc.ru/quote/news/article/67c8425d9a7947761f83535a>

④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поитогам 14-го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форума ВТБ «Россия зовёт!». 14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acts/assignments/orders/73267>

⑤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households sector”, Central Bank of Russia, October 3, 2025, [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households/hh/](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households/hh/)

⑥ ФНС назвала объем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четов россиян. 14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0459951>

⑦ A. S. Bulatov, “MNEs and capital flight: The case of Russia”,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2, No.2, pp.174-188.

失对俄罗斯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自 2022 年 3 月起，俄罗斯实施了历史上最严厉的外汇和资本管制措施。2022 年 2 月 28 日签署的第 79 号总统令公布了以下管制措施：（1）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俄罗斯税务居民，必须出售 80%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根据外贸合同汇入自己授权银行账户的外币收入；（2）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禁止俄罗斯居民根据借款合同向非俄罗斯居民提供外汇借款，也不得将外汇汇入自己在俄罗斯境外开立的银行账户或金融市场中其他机构的账户；（3）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禁止俄罗斯居民利用外国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支付系统进行资金汇款。<sup>①</sup>俄罗斯政府还出台政策，禁止俄罗斯税务居民和公民以任何形式履行对包括有非俄罗斯税务居民份额的实体财产（授权、股本、合作社单位基金）的出资义务。<sup>②</sup>与此同时，不友好国家的企业和投资人在俄罗斯设立的企业的股权转让也需要行政当局的批准和审查，且转让时须折价出售并向政府支付高额税款。<sup>③</sup>

“余钱收集制”的第四个外在表现是执行高关键利率。在动员理论视角下，高关键利率的目的是遏制非政策指定部门和非高增长部门的运作，通过遏制它们的扩大生产、限制它们的投资和需求，来确保政策指定部门能够获得最充沛的资源供应。目前，在俄罗斯，军事工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以及政策指定的科技型企业享有远低于关键利率（名义利率约为 17%~21%）的政策性贷款（名义利率约为 3%~5%），以帮助他们从其他非政策指定部门获取劳动力和所需资源。与此同时，高关键利率削弱了非政策指定部门企业聚焦主业的经营意愿，以使他们更愿意将沉淀在企业账户上的资金用于购买

<sup>①</sup>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8.02.2022 N 79 (ред. от 09.06.2022, с изм. от 20.05.2024)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ер в связи с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и примкнувших к ни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sup>②</sup>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8.03.2022 N 126 (ред. от 14.11.2024)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временных мера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финансов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фере валют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sup>③</sup> “Russian Countermeasures: The Governmental Commission Tightens Conditions for Exits by Investors from Unfriendly Jurisdictions”, *Clear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atch*, November 4, 2024, <https://www.clearygottlieb.com/news-and-insights/publication-listing/russian-countermeasures-the-governmental-commission-tightens-conditions-for-exits-by-investors-from-unfriendly-jurisdictions>

债券以获取稳定的收入。<sup>①</sup>高利率也促使俄罗斯家庭和个人主动推迟大额消费，将各类收入化零为整，进行投资。<sup>②</sup>

这些通过经济手段获取的且沉淀在国有银行体系的货币，将会被用于购买政府和政策指定企业的债券，以便为中央财政在关键时刻扩大支出和执行特定战略提供货币支撑。<sup>③</sup>目前，已经确定的 2025 年俄罗斯政府预算达 41.5 万亿卢布，而直接军费开支有约 13.2 万亿卢布。<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在动员条件下，这笔军费的实际购买力极其惊人：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的测算，13.2 万亿卢布的军费的购买力与美国 4600 亿美元~4700 亿美元军费的购买力相当。<sup>⑤</sup>

### （三）启动劳动力动员

对于一个拥有极大自然资源储量的国家而言，劳动力是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工业制成品的关键资源之一。俄罗斯军事工业在战前约有 200 万~450 万名职工，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又招募了不少于 52 万名职工，但仍不足以弥补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缺口。<sup>⑥</sup>此外，由于军事工业和军队使用高薪办法吸引劳动力，所以导致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供应在全俄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

---

① “Russian government advisers warn of corporate bankruptcies wave”, *Reuters*, January 2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europe/russian-government-advisers-warn-corporate-bankruptcies-wave-2025-01-27>

② “Summary of the Key Rate Discussion during the quiet period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meeting of the Bank of Russia Board of Directors on 25 April 2025”, *Central Bank of Russia*, April 25, 2025, [https://www.cbr.ru/eng/dkp/mp\\_dec/decision\\_key\\_rate/summary\\_key\\_rate\\_12052025](https://www.cbr.ru/eng/dkp/mp_dec/decision_key_rate/summary_key_rate_12052025)

③ Jan Starosta, “What lies ahead for Russia in 2025?” *Institute of New Europe*, February 2, 2025, <https://ine.org.pl/en/what-lies-ahead-for-russia-in-2025>; Ben Aris, “Russia’s hidden war debt and a looming credit crisis”, *Moscow Times*, January 14, 2025,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5/01/14/russias-hidden-war-debt-creates-a-looming-credit-crisis-a87606>

④ Iwona Wiśniewska, “Russia’s budget for 2025: war above all”,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4-11-22/russia-s-budget-2025-war-above-all>

⑤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5: Launch”, IISS, February 12, 2025, <https://www.iiss.org/events/2025/01/the-military-balance-2025-launch/>

⑥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和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可能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See “Winning the Industrial War: Comparing Russia, Europe and Ukraine”, April 10, 2025,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winning-industrial-war-comparing-russia-europe-and-ukraine-2022-24>; P. Luzin, “Workforce Shortages Plague Russian Arms Manufacturing”,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June 27, 202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workforce-shortages-plague-russian-arms-manufacturing>

更加紧张。这要求俄政府启动一些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劳动力动员项目。

不在前线担负作战任务的部分技术兵种和高年级学生已被纳入可动员劳动力范畴，通常用于基建行业。俄军编内有大量的工程兵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其作为后方（тыл）单位，并未在战区部署。但是，在劳动力严重缺乏的背景下，这些单位作为建设国家项目的补充力量，被部署到自然条件恶劣却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以便按照上级指示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建筑任务。俄军铁道兵部队自 2021 年起<sup>①</sup>就开始深度参与贝阿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现代化改扩建工作。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包括南部军区在内的俄军铁道兵部队<sup>②</sup>仍然深度参与了这些工程，预计在 2032 年前不会脱离铁路干线的建筑工作。<sup>③</sup>

中等和高等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是另一批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人力资源。为了有效利用这批人力资源，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通过学制改革，缩短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周期。2023—2024 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学制改革，将相当部分理工科专业学制从传统的 4 年制本科和 2 年制硕士合并成为五年期的“专家学制”（Специалист 系俄罗斯独有的学制），减少了至少一年的在校时间。此外，教育大纲还要求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学生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一线实习方可获得毕业证书。这意味着俄罗斯理工科毕业生将比以往更早参加工作，且参加工作时的劳动技能也更为熟练。其次，鼓励在校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服务国家的重大项目。<sup>④</sup>仿照苏联全联盟学生建设支

①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войска приступают к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второй ветки БАМа. 5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1067137>

②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ики ЮВО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на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ю 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ой магистрали. 15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rg.ru/2022/03/15/reg-dfo/zheleznodorozhnniki-iuvo-otpravilis-na-rekonstrukciyu-bajkalo-amurskoj-magistrali.html>

③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войска в 2026-2032 годах будут р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ть БАМ. 6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975167>

④ 2022 年 7 月 14 日生效的 239-ФЗ 号联邦法和 2024 年 2 月 14 日生效的 21-ФЗ 号联邦法明确了这些学生为适格劳动力，并享受相关的权利和福利。См.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4.07.2022 г. № 239-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части первую и вторую Налогового код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татьи 18 и 19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п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налог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ая упрощ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4.02.2024 г. № 21-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атью 12-1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мощи».

队（Всесоюзные студенческие 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отряды）成立的俄罗斯学生支队（Российские студенческие отряды）在冲突升级以后也开始向重大国家项目输送以中学和大学高年级学生为主体的劳动力。<sup>①</sup>

在押囚犯也被纳入到可动员的劳动力的范畴。将囚犯用于生产性活动或充军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之一。俄罗斯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法院在判处有期徒刑后得出结论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劳动纠正被定罪人的不当社会行为的，可以不判处监禁。而囚犯在强制劳动期间的收入，将会按照一定比例扣除，成为政府机关的非税收入。<sup>②</sup>俄罗斯囚犯的劳动收入较常人更低，为市场价格的 10%~30%。且俄罗斯囚犯会被优先分配到缺乏劳动力的艰苦劳动行业，如建筑业、农业、资源回收业、以及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大型国家项目。<sup>③</sup>

最近几年，俄罗斯强制劳动规模显著扩大。俄罗斯司法部称，“2023 年，法院判处的以强制劳动为刑罚的案件数量比 2020 年增加了五倍，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sup>④</sup>。随着俄罗斯劳动力缺口的扩大，扩大强制劳动规模的呼声也越来越大。2024 年 4 月，一些倡议者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更多的囚犯甚至失业者都纳入到强制劳动项目中去。<sup>⑤</sup>2024 年 6 月底，俄罗斯司法部发布消息，称其准备制定一项法案，将 65 种以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类型变更为强制劳动。<sup>⑥</sup>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囚犯将被强制要求从事必要但缺乏吸引力的工作，以维持国家和社会在战时条件下的运转。

囚犯对于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还体现在冲锋陷阵上。军事惩戒单位

---

①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туденческие отряды вновь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н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ую студенческую стройку «БАМ 2.0». 17 июня 2024 г. [https://trudkrujt/vi\\_ew-news.html?id=41](https://trudkrujt/vi_ew-news.html?id=41)

② С 1 января 2017 года вводятся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как вид уголовного наказания. 24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s://admmegeion.ru/org/320745/>

③ Во ФСИН рассказали, в каких сферах используют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25 окт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pnp.ru/social/vo-fsin-rasskazali-v-kakikh-sferakh-ispolzuyut-prinuditelnye-raboty.html>

④ Глава Минюста сообщил о резком росте применения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 21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rg.ru/2024/03/21/otrabotaiut-vinu.html>

⑤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ширить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 4 апреля 2024 г. <https://rg.ru/2024/04/04/nakazhut-delom.html>

⑥ Минюст инициирует поправки о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ах для 65 составо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28 июня 2024 г. <https://www.interfax.ru/amp/968472>

(Penal Military Unit) 在俄乌前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俄军地面力量的重要补充之一。这些军事惩戒单位通常从监狱招募囚犯或从审前拘留中心招募犯罪嫌疑人到战区充当突击队员的角色。一般来说，在军事惩戒单位服役的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将在服役期结束后获得赦免，或获得假释机会。一方面，这将有助于节约后方，特别是节约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充实了部队编制、增加了战术多样性并且降低了战后潜在的社会风险。据乌克兰官方估计，在俄军军事惩戒单位和私人防务承包商服役的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累计超过 18 万。<sup>①</sup>

俄罗斯劳动力动员政策的一系列实践表明，俄罗斯正在将碎片化的劳动力资源集零为整，集中投放在与军事生产和作战相关的领域中。

#### （四）启动科技动员

俄罗斯的科技动员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计划，二是政府主导的供应链重构计划。

俄罗斯的进口替代计划首先涉及大规模的仿制代替。当前俄罗斯的仿制代替具有三个不同的操作路径：第一，直接无偿使用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第二，通过情报手段搜集技术档案和样品；第三，逆向工程。

作为对西方极限制裁的对等回应，自 2022 年 2 月起，俄罗斯暂时放弃了对不友好国家知识产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司法保护，为紧急状态下的进口替代和逆向工程活动提供法律保障。自 2022 年 3 月 30 日起，俄罗斯法人实体或自然人可以随意使用非友好国家法人或自然人的知识产权。

俄罗斯政府还加强了对全口径下的科技、工业情报的搜集工作。苏联/俄罗斯领导层习惯于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可获取的资产，即可以通过情报工作来获取他国科技成果，并用来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sup>②</sup>境外科技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工作早在苏联时期就由情报部门和科技部门组成的合作机制负责。

① Ув'язненим за війну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більш не платитимуть – кремль хоче зекономити гроші. 1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szru.gov.ua/news-media/news/uvyazneny\\_m-za-viinu-proti-ukrainy-bilsh-ne-platytymut--kreml-khoche-zekonomity-hroshi?fbclid=IwY2xjawHj6INleHRuA2FlbQIxMAABHRWUcry70t4KCNEn\\_rYhkyhiYsBGbx5bPTYR6dvv9n6qdqT-ID5RH7wHRA\\_aem\\_ADKTV HdpN8Z9OPsEwrMeFA](https://szru.gov.ua/news-media/news/uvyazneny_m-za-viinu-proti-ukrainy-bilsh-ne-platytymut--kreml-khoche-zekonomity-hroshi?fbclid=IwY2xjawHj6INleHRuA2FlbQIxMAABHRWUcry70t4KCNEn_rYhkyhiYsBGbx5bPTYR6dvv9n6qdqT-ID5RH7wHRA_aem_ADKTV HdpN8Z9OPsEwrMeFA)

② 宋兆杰、张敏卿、严建新：“苏联科技创新体系成败的移植文化因素分析”，《科学学研究》，2012 年第 11 期，第 1621-1626 页。

所以，俄罗斯通过直接获取外国技术数据、工艺流程文档、关键零部件样品及其他科技情报来迅速且以相对较低成本减轻制裁影响并有效实现对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sup>①</sup>普京总统于 2022 年 6 月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表的讲话无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俄罗斯将继续强化外国科技情报的搜集工作，以对抗来自西方的禁运和制裁，并为进口替代和逆向工程项目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智力保障。<sup>②</sup>

俄罗斯启动了对关键软硬件的直接逆向工程项目。由于俄罗斯的工业体系高度依赖西方软硬件，所以俄罗斯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逆向工程项目，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制造或设计出西方技术产品的代用品。目前，在全俄范围内已经开展了对最为关键的 300 至 400 项关键软硬件的逆向工程项目。除了启动大量逆向工程项目外，俄罗斯政府还督促莫斯科理工大学、托木斯克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等高校成立了逆向工程及技术支持中心，用于执行逆向工程项目或为相关项目培训人员。

俄罗斯还构建了替代供应链，并启动了影子供应链。对于那些暂时不能由俄罗斯企业供应或不能大批量供应的产品，俄罗斯企业在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寻求来自友好国家的供应商来满足需求。同时，俄罗斯还激活了规模庞大的“影子供应链”。这些自苏联时期便已存在的影子供应链多由俄罗斯情报和安全机构的雇员或相关人士运营，<sup>③</sup>通常用来为俄罗斯政府和受制裁企业采购所需的高技术产品和受管制的两用产品。这些供应链通常由位于土耳其、德国、韩国、意大利、阿联酋和塞尔维亚的空壳公司<sup>④</sup>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关联企业组成。<sup>⑤</sup>

---

① Dmitry Tulupov, “Intelligence Against Sanc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13, 2016,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ntelligence-against-sanctions/>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здравил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и ветеранов СБР со столетием нелег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30 июля 2022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790>

③ J. Anderson “The Chekist Takeover of the Russian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2006, Vol.19, No.2, pp.237-288.

④ “Ore to Ordnance: Disrupting Russia’s Artillery Supply Chains”, *RUSI*, October 10, 2024,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external-publications/ore-ordnance-disrupting-russias-artillery-supply-chains>

⑤ “The U.S. Technology Fueling Russia’s War in Ukrain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ptember 10, 2024, <https://www.hsgac.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09.10.2024-Majority-Staff-Report-The-U.S.-Technology-Fueling-Russias-War-in-Ukraine.pdf>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科技动员政策整体上不像苏联时期那样明确区分军用和民用，而是先根据需求的迫切程度制定优先级列表，再通过集中人力、物力的方式解决供应问题。对于那些可以通过影子供应链和友好国家供应链采购到的软硬件，俄罗斯暂时不急于推动其国产化，以节约有限的工程资源。对于那些在短期内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实现进口替代的软硬件，俄罗斯政府牵头设立逆向工程研究小组进行进口替代，以确保供应的持续性。

#### 四、动员对俄罗斯国家能力影响的评估

俄罗斯的国家能力是否因动员启动而得到增强，可以从俄罗斯国民经济数据和军工产能指标两个方向进行初步研判。

##### （一）基本打破了西方通过“极限制裁”绞杀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图谋

对于史无前例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俄罗斯学界作出了多种预测，其中最悲观的版本包括 2022 年当年名义 GDP 下降四分之一，2023 年将会在这一基础上持续下降。而相对稳健的预估版本是：在失业率达到 7.5%~8% 和通胀率 20%~25% 的条件下，俄罗斯名义 GDP 将下挫 8% 左右。<sup>①</sup>不过，得益于一系列的动员措施启动，俄罗斯当年名义 GDP 仅下降了 1.2%，并且在 2023 年实现了正向增长。2023 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3.6%，2024 年为 4.1%。除了名义增长之外，俄罗斯国民经济的规模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也有增长。

俄罗斯工业在西方极限制裁背景下实现正增长。整体而言，2023 年俄罗斯工业增速为 4.1%，2024 年则为 4.6%。就部门分类而言，制造业增速达到 7.5%，采掘业增速则为 -1.3%。可以看出，工业增长主要是由加工制造业贡献的。<sup>②</sup>其中，与国防需求直接相关的纺织和皮革、电子产品、乘用车、电气设备、其他机械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金属加工产品、运输车辆和设备、食品行业的增长最为迅速。与此同时，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提供

---

<sup>①</sup> Белоусов Д. Си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ля интерес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итоги пяти лет и прогноз на будущее. 23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tass.ru/opinions/22943873>

<sup>②</sup> 徐坡岭：“意外的经济转型：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文化纵横》，2024 年第 2 期，第 64~73 页。

了大量就业岗位，俄罗斯国内失业率已达到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即低于 3%。

得益于财政货币动员和严厉的外汇管制，以及政府和社会对进口替代需求的迅速增长，整体而言，俄罗斯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很快，国内积累也迅速增长。俄罗斯民营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比例升至 2023 年的 61%。2024 年投资继续保持加速增长的势头，上半年投资增长率达到 10.9%，全年预计达到 10% 以上。在外界制裁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2024 年俄罗斯全年总积累（包括库存）增长 20%，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总积累率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6%。<sup>①</sup>这些数据表明，俄罗斯国民经济在超级制裁和不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正积累和正产出。这意味着，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极限制裁破坏俄罗斯国民经济运转的尝试基本失败。

## （二）基本打破西方通过消耗战谋求战场主动权的企图

整体而言，俄罗斯军事工业部门产能激增的关键基础是既有的动员制度残余和新动员措施的引入。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工业部门已不再享有资源分配的最高优先级，但在政治上仍然举足轻重，并具有强大的政治议价能力。军事工业部门仍然是维系俄罗斯国家竞争力和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键部门。一方面，俄罗斯政府依赖军事工业的大产量和新产品来进行大国博弈并引导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许多地方机构的运转依赖规模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运作带来的经济外溢效应。这使得俄罗斯军事工业能够长期维持一个高生产能力、低生产负荷的运行状态。<sup>②</sup>同时，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关键人物往往身兼要职，深度参与高层决策，有能力在战时状态下确保军事工业获得最充足的供应。这些都是苏联时期动员体制的历史遗产。

引入动员措施也很关键。第一，在微观层面，军工企业可以不安排或较少安排职工休假，延长每周劳动时间并实行连续作业；<sup>③</sup>第二，在宏观层面，

---

① 徐坡岭：“俄罗斯战时经济将走向何方”，《世界知识》，2025 年第 1 期，第 28–30 页。

② P. Luzin,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e on Policy: Stuck in a Redistributive Feedback Loop”, *Russian Matters*, November 3, 2021,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russias-defense-industry-and-its-influence-policy-stuck-redistributive-feedback-loop>

③ Сергей Шойг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в два раза. 30 января 2024 г. <https://rg.ru/2024/01/30/sergej-shojgu-proizvodstvo-zenitnyh-raket-uvelichilos-v-dva-raza-minoborony.html>

2022年,俄罗斯组建了专门用于处理和协调军需生产的、跨部门的、有政府最高层和各部主官参与的委员会,为特事特办创造了行政和政治条件。<sup>①</sup>

俄罗斯军事工业在俄乌冲突升级后承担着三项主要任务:第一,为前线作战单位提供补给和补充;第二,为新组建的军事单位提供必要的装备和消耗品;第三,改进既有装备并开发新式装备。目前俄军在战区消耗量最大的装备分别为地面装备和弹药,因此本文将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对动员措施的效果进行简要评估。

俄军地面装备供应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方面,2021年俄罗斯国防部曾表示其地面部队将接收240多辆全新和现代化改装的T-72B3M、T-80BVM和T-90M“突破”坦克,而在动员启动之后的2023年,俄罗斯共交付了1530辆全新制造的、现代化的和翻新的坦克,其中全新制造的有400~600辆。<sup>②</sup>除了主战坦克外,步兵战车和轮式装甲人员输送车的月交付量也在直线上升。俄罗斯国防工业在2023年向作战部队交付了2518辆各类装甲车辆,月均交付约为210辆。<sup>③</sup>这一数字在2024和2025年得到提高,<sup>④</sup>月均交付量为500辆左右。<sup>⑤</sup>

炮兵方面,特别是履带式自行火炮、轮式自行火炮、多管火箭发射器,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能也迅速提高。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的一份公关稿

---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10.2022 г. № 763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ом совете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ругих войск, воин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и органов».

② “Fit for War in Decades: Europe’s and Germany’s Slow Rearmament Vis-A-Vis Russia”, *Kiel Institut*, September 2024,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fit-for-war-in-decades-europe-and-germanys-slow-rearmament-vis-a-vis-russia-33234/>

③ J. Cooper, “Military Production in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Start of the War with Ukraine: To What Extent has it Increased and how has This Been Achieved?” *The RUSI Journal*, 2024, Vol.169, No.4, pp.10-29.

④ “Fit for War in Decades: Europe’s and Germany’s Slow Rearmament Vis-A-Vis Russia”, *Kiel Institut*, September, 2024,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fit-for-war-in-decades-europe-and-germanys-slow-rearmament-vis-a-vis-russia-33234>; “Fit for war by 2030? European rearmament efforts vis-à-vis Russia”, *Kiel Institut*, June 1, 2025, <https://www.kielinstitut.de/publications/fit-for-war-by-2030-european-rearmament-efforts-vis-a-vis-russia-18193>

⑤ 俄军前线使用的步兵战车队伍基本由BMP-2、BMP-3车族构成,而轮式装甲人员输送车队伍主要由BTR-70、BTR-80车族以及较新、较轻型的“虎”式装甲车车族构成。因俄乌战场乌军主战坦克多被无人机、重炮、机载反坦克导弹击毁,所以实际上步兵战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在战术层面战斗力和战场角色没有太大差异。

件宣称，动员启动后，交付部队的自行火炮、牵引火炮、迫击炮数量较动员前提高了十倍到二十倍，而多管火箭炮的交付数量增加了一倍。<sup>①</sup>新型炮兵装备的量产和定型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22 年以来，每个季度均可在前线观察到新型号的履带式、轮式自行火炮，多管火箭发射器及其变体（如火箭布雷车、云爆火箭弹发射器等）进行实战测试和国家试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保产量，俄罗斯国防工业还尝试将一些武器系统（如长身管火炮、迫击炮、防空炮、多管火箭发射器）和轮式底盘广泛结合，以避免挤占坦克、步兵战车等装备的产能。

俄军地面装备供应未受明显影响的另一个间接证据，是猛增的前线兵力。2022 年动员启动前，俄军前线兵力不足 20 万。<sup>②</sup>经过动员和增兵后，前线俄军总兵力在 2025 年 9 月已达到 70 万。<sup>③</sup>由于这些俄军直接部署在战区执行作战任务，因此他们应当被视为野战就绪单位（Field Combat-ready Forces），并按有关条令和军事学说进行了武装。这意味着这些俄军大多装备了与乌军相比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弹药生产的急速扩张是俄罗斯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根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测算，俄罗斯国防工业在 2024 年向部队交付了超过 130 万发 152 毫米炮弹和超过 80 万发 122 毫米炮弹。<sup>④</sup>同时，他们还指出，随着俄罗斯新化工设施的投产，炮弹所需的高爆炸药、发射药和导弹所需的固体推进剂的生产规模还会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当前的炮弹产能并非俄国防工业的极限。<sup>⑤</sup>乌克兰国防部的简报也能够佐证这一点：俄军的炮击强度在 2025 年 10 月并未下降，其中使用多管火箭发射器进行的炮击多达

---

① “Russia increases production of self-propelled artillery systems 10-fold – Rostec”, *Interfax*, July 30, 2024, [https://www.interfax-russia.ru/military/news\\_eng/411002](https://www.interfax-russia.ru/military/news_eng/411002)

② “‘I know we will win – and how’: Ukraine’s top general on turning the tables against Russia”, *Guardian*, July 24,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jul/24/i-know-we-will-win-and-how-ukraines-top-general-on-turning-the-tables-against-russia>

③ Путин: в зоне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находятся 700000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ойцов. 18 сентября 2025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25/09/18/1140304-700-000-boitsov>

④ J. Watling, O. V. Danylyuk, “Winning the Industrial War: Comparing Russia, Europe and Ukraine, 2022-24”, *RUSI*, April 3, 2025,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winning-industrial-war-comparing-russia-europe-and-ukraine-2022-24>

⑤ “A glimpse inside Putin’s secret arms empire”, *Economist*, May 8,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active/briefing/2025/05/08/a-glimpse-inside-putins-secret-arms-empire>

3353 次。<sup>①</sup>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产量也在猛增。据 RUSI 测算, 2023 年, 俄罗斯国防工业向军队交付了 420 枚 Kh-101 巡航导弹, 而 2024 年的交付量超过 500 枚。9M723 导弹的产量从 2023 年的约 250 枚增加到 2024 年的 700 多枚。<sup>②</sup> 更新的测算显示, 2025 年俄罗斯国防工业大致可交付 840 至 1020 枚 9M723 系列导弹 (含其空射变体 Kh-47M2) 以及 720 至 750 枚 Kh-101。<sup>③</sup>

除了传统的纵深打击兵器外, 俄罗斯的长程自杀式无人机产能也在直线上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指出,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3 月, 观察到俄罗斯的长程自杀式无人机发射量从每周 200 架次左右骤增至每周 1100 架次。<sup>④</sup> 而 CSIS 的火力打击追踪器 (Russian Firepower Strike Tracker) 的记录也显示, 俄军的无人机发射架次和导弹发射量随着时间推移, 在排除政治因素的条件下, 呈持续上升趋势。<sup>⑤</sup>

用于攻坚的卫星制导滑翔增程型航弹改装套件则是俄罗斯军事工业在战争中研发并大量交付的新式武器的最佳案例之一。在该型套件的辅助下, 传统航弹具备了 10 米内的圆周概率误差 (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sup>⑥</sup> 打击能力和防区外攻击能力。2023 年, 该类套件的年产能仅为几千套, 而到 2024 年, 则攀升至 4 万套以上, 2025 年的预期产能可达到 7 万~8 万套。<sup>⑦</sup> 由于每一套套件都需按 1:1 的比例搭配航弹使用, 因此这意味着俄罗斯航弹

---

① У жовтні на фронті відбулось 5 480 бомбувань, ворог здійснив майже 140 000 артобстрілів. 3 листопада 2025. <https://mod.gov.ua/news/u-zhovtni-na-fronti-vidbulos-5-480-boyezitknen-vorog-zdijsniv-majzhe-140-000-artobstriliv>

② J. Watling, O. V. Danylyuk, “Winning the Industrial War: Comparing Russia, Europe and Ukraine, 2022-24”, RUSI, April 3, 2025,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winning-industrial-war-comparing-russia-europe-and-ukraine-2022-24>

③ “Swamped? The Math of Ukraine’s Missile Crisis”, CEPA, July 7, 2025, <https://cepa.org/article/swamped-the-math-of-ukraines-missile-crisis>

④ “Drone Saturation: Russia’s Shahed Campaign”, CSIS, May 13,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rone-saturation-russias-shahed-campaign>

⑤ “Russian Firepower Strike Tracker: Analyzing Missile Attacks in Ukraine”, CSIS, <https://www.csis.org/programs/futures-lab/projects/russian-firepower-strike-tracker-analyzing-missile-attacks-ukraine>

⑥ 圆周概率误差是弹道学中的一种测量武器系统精确度的指标。

⑦ J. Watling, O. V. Danylyuk, “Winning the Industrial War: Comparing Russia, Europe and Ukraine, 2022-24”, RUSI, April 3, 2025,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winning-industrial-war-comparing-russia-europe-and-ukraine-2022-24>

的产能也在同步爬坡。由于火工品有储存周期，因此产量的快速上升与前线使用量的快速上升之间有极大的正相关性：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数据显示，俄军仅在 2025 年的头十个月就投掷了超过四万枚各型精确制导航弹（含滑翔增程型），仅 10 月一个月就投掷了超过 5328 枚精确制导航弹。<sup>①</sup>此外，乌克兰方面在 2025 年 10 月观察到俄军将新型的动力增程型滑翔航弹投入了实战。该型航弹可飞行 190 公里，使得俄军战机可以在不进入乌克兰实控空域的情况下对基辅等重要城市进行空袭。<sup>②</sup>

与俄军显著增强的火力优势对应的，是西方难以向乌克兰提供与俄军火力增强规模相对应的军事资产。从微观角度来说，乌克兰士兵反映，2025 年第一季度以来，俄军的火力充裕度有了极大提升，俄军如今可以用炮弹和无人机覆盖任何战场上的任何可疑目标。而从宏观角度来说，北约诸国在和俄罗斯的军工生产竞赛中已经处于下风。<sup>③</sup>在各类精确制导武器方面，西方国家的产能只能满足高强度冲突所需的极小部分，<sup>④</sup>连美国也不得不多次中断对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精确制导火箭弹的交付。<sup>⑤</sup>这说明，西方通过有限军援和逐步升级策略来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获得战场主动权的尝试，基本宣告失败。

### （三）动员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长期负面影响正在凸显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动员作为一柄“双刃剑”，既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国家能力，也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制约国家能力提高的因素。动员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双速经济问题、经济效率和管理能力

---

① Упродовж жовтня російська авіація скинула найбільше КАБів. 4 листопада 2025. <https://mod.gov.ua/news/uprodovzh-zhovtnya-rosijska-aviaciya-skinula-najbilshe-ka-biv>

② “Russia has upgraded its already devastating glide bombs”, *kyivindependent*, October 24, 2025, <https://kyivindependent.com/russias-new-long-range-glide-bombs-aim-to-terrorize-civilians-not-win-battles-experts-say/>

③ “The Interview the Head of NATO Thinks President Trump ‘Deserves All the Prais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7/05/magazine/mark-rutte-interview.html>

④ “The U.S. Is Starving Ukraine’s HIMARS. Where Can Kyiv Get More Rockets for Its Best Launchers?” *Forbes*, March 4, 2025,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daxe/2025/03/04/the-us-is-starving-ukraines-himars-where-can-kyiv-get-more-rockets-for-its-best-launchers>

⑤ 最近一次发生在 2025 年 7 月 1 日。See “US halts weapons shipments to Ukraine over fears its stockpiles are too low”, *Gaurdian*, July 1,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jul/02/us-halts-ukraine-weapons-shipments>

退化问题，两者共同限制了动员的可持续周期。

整体而言，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工业总产出在过去三年中产值增加了大约10%，但其中的非军事部门产值仅增加了3%。<sup>①</sup>这意味着，苏联时期长期困扰当局的“双速经济”（two speed economy）问题再度出现。

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和工程资源主要用于满足直接军事和安全需求，这就导致非军事工业部门的供应链出现了较大的风险敞口。这种风险敞口的第一种外在表现就是：因为缺乏军事工业综合体所享有的政策优惠和特权，所以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工业部门难以在目标日期之前实现供应链重组和进口替代。<sup>②</sup>比如，在冶金、化工、燃料和能源等领域，工业自动化和工业控制系统的进口替代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只有不到2%的生产设施正在进行进口替代工作。<sup>③</sup>而由于缺乏国产航电设备和发动机，2024年，俄罗斯民航制造业甚至一架新国产客机也没有向航空公司交付。<sup>④</sup>不仅如此，新式客机（如MC-21）和成熟国产客机（如ИЛ-96, ТУ-204）扩产工作也已远远落后于时间表。

这种风险敞口的第二种外在表现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开始出现技术状况恶化的问题。由于缺乏备件和技术装备，俄罗斯货运列车的技术速度创下65年来的新低。<sup>⑤</sup>俄罗斯电信运营商由于制裁导致的设备供应中断，迫使他们放弃了对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投资和升级计划。<sup>⑥</sup>俄罗斯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困境是所有俄罗斯非军事关联部门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

① “The Risks of Russia’s Two Speed Economy in 2025”, *Wilson Center*, January 10, 2025.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risks-russias-two-speed-economy-2025>

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условиях санкций: результаты опроса предприятий. 26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cbr.ru/Content/Document/File/154320/analytic\\_note\\_20230926\\_dip.pdf](https://cbr.ru/Content/Document/File/154320/analytic_note_20230926_dip.pdf)

③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мпании не перешли н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и. 3 октября 2024 г. <https://www.vedomosti.ru/technology/articles/2024/10/03/1066162-nekotorie-kompanii-ne-pereshli-na-otchestvennie-sistemi-upravleniya>

④ “The Strategy is Not Taking Off: Russi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is facing the prospect of ‘cannibalisation’, sabotage and declining passenger traffic”, *Re Russia*, December 10, 2024. <https://re-russia.net/en/Analytics/0219/>

⑤ И не захватывает дух на скоростях... (с). 24 июля 2024 г. <https://vgudok.com/lenta/i-ne-zahvatyv-aet-duh-na-skorostyah-s-skorosti-dvizheniya-na-seti-rzhd-itogi-pervogo>

⑥ M. Kolomychenko, “The Impact and Limits of Sanctions on Russia’s Telecoms Industry”,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2, 2024, <https://dgap.org/en/research/publications/impact-and-limits-sanctions-russias-telecoms-industry>

在西方实施对俄制裁后，俄罗斯农业部门难以继续从西方进口设备零部件、良种、农药，同时面临飙升的劳动力价格、农资价格和融资成本带来的生存危机。<sup>①</sup>

这种风险敞口的第三种外在表现是：非军事部门制造业企业的债务负担急剧上升，这些企业面临严重的破产风险。由于高关键利率，2024—2025 年，20%以上的俄罗斯制造业企业的利息负担将超过税前利润的 65%，而这一比例在 2023 年只有 30%。<sup>②</sup>企业的利息负担与技术资产的密集程度密切相关，自动化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反而更可能面临破产威胁。从行业细分来看，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与其距离军事工业的距离呈明显的正比关系，生产纯粹民品的企业在当前局势下比生产军需品的企业更加容易破产。一些俄罗斯人提到：“如果你是俄罗斯的企业家，却不生产弹道导弹，那么你的处境就会很艰难。”<sup>③</sup>

这种风险敞口的第四种外在表现是劳动力的部门间分配不平衡。整体而言，动员对劳动力供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军事和军事工业部门。一方面，受疫情、制裁、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俄罗斯的劳动力缺口明显扩大，在 230 万人到 480 万人之间。<sup>④</sup>另一方面，劳动力缺口分布不均。劳动力短缺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工业和政府机关的非国防相关部门。高薪志愿役的广泛存在锚定了俄罗斯国内劳动力的价格底线，并吸引大量劳动力离开原有岗位。由于军事工业可以享受国家财政的贴息、金融机构的定向贷款和政府的订单保障，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薪。而非军事工业部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即便在享有政策性贷款的条件下，也无力负担如此高昂的劳

---

① T. Rybakova, “Russian Agriculture Has Bigger Problems than the Weather”, *Russia Post*, August 11, 2025, [https://russiapost.info/economy/russian\\_agriculture\\_has\\_problems](https://russiapost.info/economy/russian_agriculture_has_problems)

② Экономисты ЦМАКПа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рисках банкротств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 секторе. 27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5/01/27/1088405-ekonomisti-tsmakpa-predupredili-o-riskah-bankrotstv>

③ “Tensions Rise Among Russia’s Elite as Economic Growth Slow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02/world/europe/russia-economy-war-ukraine.html>

④ Ахапкин Н. Ю.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анкционн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динам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ест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23. №.6. С.7-25; Лебедева А. В., Новикова Е. Н.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ынка труда в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ктор. 2024. №.1. С.60-69.

动力成本。<sup>①</sup>

由于动员理论还强调军事化管理思维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普遍运用，所以，动员政策的启动意味着将俄罗斯社会再度置于一个类军管状态之下。长期来看，会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和经济管理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和政府机关的运行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在军管逻辑下，上级指示的性质是军令，其特点是“三不一有”：命令本身不可置疑、命令内含的指标不可商议、完成任务必须不择手段，完不成任务一定会有惩罚。所以在动员状态下，特别是在泰罗制管理和军事化管理逻辑并行的条件下，下级不会对上级的指示有任何不同看法，只会在完全不考虑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条件下完成上级指示。

而当前的俄罗斯社会正在普遍进入类军管状态。一方面，日益泛滥的军事管理思维正在对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表达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促进了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的军事化。与苏联时期盛行的“战线”（фронт），“突击手”（ударник）一样，诸如“完成既定目标”（готов выполнят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剿灭”（ликвидация），“向长官报告”（должить），“请求发言许可”（разрешите обратиться）之类的军事用语正在成为许多俄罗斯官员发言的关键词汇。“特别军事行动”一词也常被部分改写，以表达和强调某种行动的高政治重要性、高政治优先级的含义。如阿列克谢·涅恰耶夫（А. Нечаев）提出的、受到新人党和自民党支持的“特别经济行动”项目。此外，军队文化正在强力重塑俄罗斯的民间文化。地方行政长官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呼号”来彰显自己的首长身份。另一方面，长期冲突正在深刻改变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再生产结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罗斯启动了一项结合帝俄和苏联经验的新项目“英雄时代”（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该项目为在前线和后方积极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特别培训项目，旨在使项目的参与者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担任管理者。显而易见，一方面，这将加速俄罗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的管理风格军事化的过程，并使任性蛮干的工作作风和法

---

<sup>①</sup> “‘A perfect storm’ Russia is facing a severe labor shortage. Economists say it will only get worse in the coming years”, December 11, 2024. <https://meduza.io/en/feature/2024/12/11/a-perfect-storm>

律虚无主义观念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这将加剧俄国社会的割裂。<sup>①</sup>

## 五、结论与展望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俄罗斯在大国对抗背景下改善和加强其国家能力是可预期的，且完全没有超越既有的俄苏研究文献所给定的知识边界。从动员理论角度来看，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恶劣地缘政治条件下维持和发展其国家能力，从动员理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第一，重视政治领导力建设，使中央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来推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宣布紧急状态、启动动员政策。这些措施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赋予了俄罗斯政府最大限度调配全国一切可支配资源的能力。第二，制定较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一切具体决策以满足特定政策（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进行了严密的供应链规划，在控制民间对各类资源的消耗的同时，维持了对重点任务或项目的集中、超额投入；第四，重视实物生产，重视发展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国防价值。更进一步来说，俄罗斯政府能够再度启动动员，且动员能够发挥作用这一事实首先表明，动员在俄罗斯更接近于类似政治文化的存在。<sup>②</sup>

---

① 最近十年来，俄罗斯社会已经发展为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在该背景下，广义体制外的工作（含自由职业）被认为是不太体面的工作，而广义体制外的人也被认为是不太体面的人。此为第一重割裂。由于“特别军事行动”在俄罗斯国内被视为 21 世纪的卫国战争，所以俄罗斯社会已经开始出现明显优待老兵及其亲属和歧视不参战人士及其家庭成员的现象，此为第二重割裂。而老兵在苏联 / 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对待非公部门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态度整体上偏负面，试图通过舆论、法律和政治手段打压非公部门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称非正式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寄生虫”），并尝试通过国家力量将其“格式化”并“注入”到国民经济中去。See P. Goble, “Moscow Focusing Its Attention on Non-Working Russians to Address Labor Shortag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13, 202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moscow-focusing-its-attention-on-non-working-russians-to-address-labor-shortage>

② 实际上这也是当代俄罗斯政治学类专业的授课重点内容之一。这里可参考原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古拉·巴拉诺夫（Н. Баранов）撰写的教案。См. Лекция 18.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тради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7 мая 2016 г. [https://www.nicbar.ru/politology/study/kurs-politicheskie-otnosheniya-i-politicheskij-protsess-v-sovremennoj-rossii/lektsiya-18-politicheskaya-kultura-rossii-traditsii-i-sovremenost?ysclid=mdguvo8ad7804247446](https://www.nicbar.ru/politology/study/kurs-politicheskie-otnosheniya-i-politicheskij-protsess-v-sovremennoj-rossii/lektsiya-18-politicheskaya-kultura-rossii-traditsii-i-sovremennost?ysclid=mdguvo8ad7804247446)

此外，从动员理论的视角来说，部分动员远远不是俄罗斯动员进程的终点。普罗霍罗夫的钟摆模型及其他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在俄罗斯，部分动员、总动员和长期总动员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可逐步升级且俄罗斯能够长期维持动员状态。此外，许多俄罗斯官员、学者已经将赢得这场冲突视为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sup>①</sup>这意味着，与启动动员的俄罗斯进行对抗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相应地，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阵营内部的步调一致，确保国内历届政府欧亚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就很难在对抗中持续维持优势地位，更遑论实现其政治目标。

---

**【Abstract】** After the escalation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espite the impacts of extreme sanctions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Russia's state capacity has continued to display robust growth, yet exis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not offered any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this phenomenon. Building on a review of the past half-century of work on Soviet studies, Russian studie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udies,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mobilization-based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an emerging theoretical tool, in Soviet and Russian studies. Focusing on mobilization policies launched by Russia in the legal, fiscal, labor,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mains, and us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and securing supplies" as evidence, the study illustrates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mobilization policies on Russia's state capaci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Russian-style mobilization is "concentrating forces to accomplish major tasks". On the premise of strong political leadership, Russia creates conditions to cross the minimum resource threshold for policy initiation by establishing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society-wide resources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by constructing a government-led, strong, and tightly coordinated supply-chain planning system. It then raises the speed and success rate of key policy objectives through centralized macro-leve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

<sup>①</sup> K. Pynnöniemi, K. Parppai, "Understanding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Political, eschatological and cataclysmic dimens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24, Vol.47, No.6, pp.832-859.

and oversized injections into designated sectors. Applied analyses indicate that, in performance terms, the launch of mobilization policies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Russia's state capacity, safeguarding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while meeting military needs. However, existing mobilization policies also exhibit clear shortcomings and may generate long-term negative effects on Russia's state capacity.

**【Key Word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Russia's State Capacit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tal War

**【Аннотац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жёстких санкций и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после эскал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сохранил высоки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не могу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объяснить данное явление. На основе обзора почти полувек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теория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основанных на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 рамках совет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нё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правовой, фискальной, трудовой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ферах,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её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поставок» в качеств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сновная лог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ресурсов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 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и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Россия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жёст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всеми социаль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ми мощностями,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ёт мощный и строгий план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цепочками поставок. Это создаё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превышения минимального ресурсного порога для начала ре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Кроме того, это повышает скорость и

успешность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люче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за счёт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ресурсов на макроуровне и переинвестирования в 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области. Анализ применения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а уровне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реализаци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рост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и, обеспечивая как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рос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ак и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её воен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Однако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акже име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очевидные недостатки и может иметь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негатив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ханизмы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тотальная война

---

(责任编辑 李坤璘)

## 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

# 当代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表意结构<sup>\*</sup>

郑永旺<sup>\*\*</sup>

**【内容提要】**自从19世纪丘特切夫用“俄罗斯拥有独特的身段”定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后，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仿佛找到了认识俄罗斯的金钥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以阐释“俄国魂”，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理想”、阿克萨科夫的“俄罗斯观点”、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更是以“新欧亚主义”回应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危机，为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方案。但俄罗斯“永久的本能”的复杂性在于俄罗斯文化底层逻辑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对国家代码的表意结构进行深度解读，才能发现“独特的身段”的秘密。表意结构既包括语言、象征、神话等文化符号系统，也涵盖了国家叙事、历史记忆与宗教意识等深层文化逻辑。阐释表意结构需要阐释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源文本。我们认为，历史文本《古史纪年》是俄罗斯的文化之根，奠定了弥赛亚思维的神学基础；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俄罗斯大地”本身就是国家代码中的表意结构，兼具物理意义的权力空间与文化隐喻空间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表意结构 俄罗斯国家叙事 俄罗斯大地 《古史纪年》 新欧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132(21)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国文学批评通史编撰”（项目批准号：23&ZD305）的阶段性成果。

<sup>\*\*</sup> 郑永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从 18 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到 21 世纪的俄罗斯联邦，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和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使弥赛亚思维成为徘徊于俄罗斯大地上空的文化幽灵，成为“俄国魂”<sup>①</sup>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一世在位或更早的时期，俄罗斯一直在寻求西方的认同，即在保持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的前提下得到西方俱乐部的会员证，在日常生活上表现为 17—19 世纪的俄罗斯对西方社会风尚的广泛接纳，这在列夫·托尔斯泰（Л. Толстой）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和冯维辛（Д. И. Фонвизин）的《旅长》（*Бригадир*）等作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20—21 世纪，关于俄国魂的论述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比如亚历山大·杜金（А. Дугин）的“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但是，追求西方的认同和承认俄国魂的客观存在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一直保持有密切的通信往来，思想上推崇启蒙主义，但现实中却不允许启蒙的微光点亮农奴制的洞穴。女皇的这种双重标准体现了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提出的“俄国魂”的“二律背反”<sup>②</sup>性。当代俄罗斯民族同样面临二律背反的性格形成的宿命：即一方面向往融入西方社会，另一方面又强调坚守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元素的俄罗斯性。俄罗斯对未来之路的选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受困于双头鹰左顾右盼的东西方意识互搏。

① 俄国魂（*руsskaya душa*）是别尔嘉耶夫提出的概念，旨在描述俄罗斯的民族性，也是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浓重的理论话语。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俄国魂的精髓：一是从宗教文化角度理解，所谓的俄国魂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倡导隐忍和集体主义，在宗教上主张忏悔、内省和神秘主义的生活方式。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阐释了俄国魂的特性：“生活在东正教土壤上的俄罗斯人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气质，所有国民都在热切地等待拯救，并将这一切埋在心底，但俄罗斯人不善于塑造自己，无法将自己变成很庄重的样子。” См. Бердяев Н.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ние Г. Д. Лемана и И. С. Сахарова, 1918. С.163。二是从俄国魂与弥赛亚意识关系的方面理解，如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救世意识是上帝特选民族的意识，是救世主现身其中并借以拯救世界的民族意识。”参见[俄]别尔嘉耶夫著：“俄国魂”，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76 页。由此可见，别尔嘉耶夫的民族“特选说”与丘特切夫的“独特身段”形成了关于“俄罗斯性”的判断上的逻辑闭环。

② 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就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对人无限的爱，真正的基督式的爱，伴之以对人的仇恨和残酷无情”。参见[俄]别尔嘉耶夫著：“俄国魂”，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2 页。

## 一、俄罗斯梦的解决方案

18 世纪是俄罗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彼得一世迁都圣彼得堡，在各个领域推行效仿西欧的改革。纵观俄罗斯历史，自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战胜瑞典，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西伯利亚，苏联解体，直至普京治下的民主俄罗斯（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的社会生活，平静的政治生态下，19 世纪的思想风暴在 21 世纪依然没有停息，因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格局没有改变，这就为弥赛亚思维提供了生存基础。19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和 20 世纪初期的白银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形成了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欧派、强调俄罗斯特殊性的斯拉夫派、提倡“走进民间”的根基派、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的布尔什维克等几个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的思想交锋构成了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核心图景，但几乎所有派别都声称热爱俄罗斯大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在文化领域，以伊万诺娃（Н. Б. Иванова）为首的西方自由派和以邦达连科（В. Бондаренко）为代表的红色爱国派的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 19 世纪西方派和融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斯拉夫派在道路选择上的当下回声。<sup>①</sup>两派知识精英在博弈的过程中都体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他们一方面不否认自己的亚洲属性，<sup>②</sup>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成为“欧洲人”。19 世纪的诗人丘特切夫（Ф. И. Тютчев）批评欧洲人对俄罗斯的刻板认知，指出把俄罗斯视为他者是欧洲人的偏见，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像现代人对哥伦布那样的态度。相同性质的误解，相同性质的幻觉。”诗人否认俄罗斯是欧洲“乡下人”的说法，恰好相反，指出“俄罗斯一直是东欧的心脏和推动力。”<sup>③</sup>别尔嘉耶夫对这种复杂暧昧的心理进行了精辟的文化阐释，认为“俄罗斯不能把自己定

---

① 郑永旺：“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吗——纳塔利娅·伊万诺娃访谈录”，刘鑫译，《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41 页。

② 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并不否认自己的东方（亚洲）属性，别尔嘉耶夫自己就承认，“对西方文明人来说，俄罗斯还是完全超验的，是某种陌生的东方事物”。参见[俄]别尔嘉耶夫著：“俄国魂”，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0 页。

③ [俄]丘特切夫著：“俄国与德国”，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4 页。

义为东方，从而使自己和西方对立起来；俄罗斯应当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即是东-西方；是两个世界的缔结者，而不是分裂者。”<sup>①</sup>别氏之说也是传统弥赛亚意识的隐晦表达。以杜金为代表的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别尔嘉耶夫的良苦用心，试图重构使俄罗斯摆脱困局的“国家代码”<sup>②</sup>，即“新欧亚主义”，主张重建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联盟（类似苏联的疆域）。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一种反西方的、反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与哲学的混合体，这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第四政治理论”（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试图将俄罗斯打造成欧亚大陆的文明轴心，以传统的俄罗斯精神文化对抗西方的现代性与物质主义。<sup>③</sup>但是，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明冲突日常化的现代社会，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影响还无法确定，但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实现“俄罗斯梦”（Российская мечта）的方案。16世纪菲洛费伊（М. Филофей）的“莫斯科-第三罗马”（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弥赛亚思维，在经历了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俄罗斯理想”（русский идеал）和阿克萨科夫（К. С. Аксаков）的“俄罗斯观点”（рус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的修正后，又被白银时代别尔嘉耶夫以俄罗斯是“东-西方缔造者”话语进行了包装，而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ев）更喜欢在“解读俄罗斯”（раздумье о России）中发掘俄罗斯精神文化要素，尝试祭起文学中心主义这面大旗，在《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和《顿河彼岸之战》（Задонщина）等古代俄罗斯文学文本中探寻弥赛亚意识的灵氛，期望令隐

① [俄]别尔嘉耶夫著：“俄国魂”，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② 国家代码（Country Code）是国际标准化领域的术语，核心作用是避免因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语言、拼写或翻译差异造成的混淆，国家代码本身的意义是中性的，但文学、艺术、政治的渗透使国家代码有了专属的价值，并借助不同的表意结构使意义巩固，换言之，中性的国家代码在表意结构的作用下具有了隐喻功能，比如CN（中国）除了表示政治主体的名称外，还象征着“红色的”、“万里长城”、“发展迅速的”等所指，俄语单词Поднебесная（天下）并不是简单地指地理空间，也是借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中国皇帝权力控制的范围。Rus（俄罗斯）则与“俄罗斯大地”“战斗民族”“红场阅兵”等表意结构产生固定联想。可见，国家代码既是所指，也就是使国家形象直接显现的符号，同时也是能指，也就是使所指被意义充盈的是表意结构。

③ См. Дугин А.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21 век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101-102.

身于文学文本中的俄国魂与现代俄罗斯精神文化同频共振。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的内核就是俄罗斯欧洲主体论（心脏和推动力）的延展，是俄罗斯弥赛亚思维的当下变体，杜金和历史上很多俄罗斯思想家一样，都在为俄罗斯寻找发展之路，都在巩固、复兴俄罗斯精神文化根基和赋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新欧亚主义者的“走有俄罗斯特色的发展之路”传播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俄罗斯固有的强人政治传统加持下，爱国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得以相互绑定，成为俄罗斯顶层设计者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重要的考量因素。<sup>①</sup>这也是为什么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意识形态不断打造一个有别于“等待西方未婚夫”<sup>②</sup>的“国家代码”，对外政策上强调软硬实力兼顾但硬实力为先的政治思维。尤其是 2000 年以后对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为俄罗斯打造了“战斗民族”的“国设”。正是在这样的新文化土壤中，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反映了新欧亚主义者对俄罗斯在全球化格局中应采用发展策略的独特理解：“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出现在地球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但尚未发展成具体的体系化的观点，这也是全球化的弱点，因为这种反对声音没有体系化，缺乏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只有零散的元素，最常见的是无政府主义、没有统一思想的左翼思潮、环保主义。”<sup>③</sup>所以杜金试图整合 19 世纪思想家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向传统的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植入丰富的现代哲学元素。他把自己的“第四政治理论”与自由主义的“第一政治理论”、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政治理论”和纳

---

① 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着一批右翼倾向明显的政治家，有主张恢复“大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党首日里诺夫斯基（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有倡导重振俄罗斯雄风的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杜金；有宣扬“正教文明”和“俄罗斯使命”的右翼政治网络赞助者马洛费耶夫（К. Малофеев）等。另外，当代俄罗斯虽然没有“新斯拉夫派”这样的官方称呼，但这也不意味着一种具有很长历史渊源的思想流派就此消失，“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国家民族主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等新斯拉夫主义思想也出现在纳罗奇尼茨卡娅（Н. Нарочницкая）的《世界历史中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Россия и русские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等著作中。

② “它（俄罗斯）永远在等未婚夫，等丈夫，等主宰者。俄罗斯是温顺的女性国度”。参见[俄]别尔嘉耶夫著：“俄国魂”，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63 页。

③ Дугин А.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21 век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190.

粹的“第三政治理论”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只有融合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超意识形态的“第四政治理论”才是救世良方。杜金对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观持否定态度，反对他们“从‘此在’（德语 *Da sein*）的另一面，即从模糊不清的‘彼岸’中现身。”<sup>①</sup>杜金将“此在”概念本土化，并视其为俄罗斯民族的存在根本，换言之，俄罗斯人不是西方式的个体，而是“民族的此在”（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Da sein*），一个携带神圣使命的集体性存在。另外，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A. C. Хомяков）等思想家兼文学家的观点对理解俄罗斯“国家代码”中的“此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sup>②</sup>杜金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理想”中发现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此在”：“在欧亚社会中，众多民族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丰富与滋养，其核心是俄罗斯因素，是没有丝毫任何主导地位诉求的、没有排他性或优越感的俄罗斯因素，这是没有民族傲慢姿态的俄罗斯因素。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俄罗斯人为‘完人’（всечеловек），强调俄罗斯民族那种心灵的开放性、博大的爱与无边的善。”<sup>③</sup>如此一来，建构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联盟的方案就有了可行性，因为俄罗斯人是代表了人类理想的“完人”。但是，这种说法又与杜金反复强调的“民族的此在”存在无法兼容的矛盾。

普京的治国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新欧亚主义的思想元素。2012年，普京在《俄罗斯是统一的国家》一文中强调，“俄罗斯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外表上与很多国家区别不大，但我们的处境却根本不同。我们的族群和我们的移民等问题与苏联的解体有关，而从历史角度看，是与‘大俄罗斯’的瓦解有关，而‘大俄罗斯’的基本形态在18世纪就已经形成”<sup>④</sup>。首先，这意味着俄罗斯是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绝对不能成为世界上的“二流角色”；其次，这说明俄罗斯会继续圆18世纪形成的“大俄罗斯”之梦。于是，精神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国家叙事的使命，而

① Дугин А.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21 век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96.

② 俄罗斯历来就有文学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不仅仅是叙事的艺术，也是理解俄国魂的重要手段。

③ Дугин А.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21 век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 241.

④ Путин В.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 января 2012 г.

完成国家叙事的前提是确定精神文化的源文本。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俄罗斯国家代码中的表意结构对精神文化的取舍扬弃，取决于如何平衡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建构什么样的“新国设”。

## 二、在历史文本中寻找精神文化的源文本

俄罗斯精神文化就是俄罗斯民族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中逐渐形成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文本化表现。在现实的国家政治话语中，这些精神文化作为国家代码或者国家符号，通过表意结构（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sup>①</sup>被大众了解，成为理解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的路径。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取决于三种力量：国家制度、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国家制度（包括权力结构、宪法与法律）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刚性框架，具有强制约束力；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预期可能性，其发展方向与应用领域受价值导向的制约；而精神文化可以塑造国家内在凝聚力与认同感。三种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阐释，推动国家的发展建设。

与许多文明古国相比，俄罗斯的千年历史还是相对简单的。东欧平原上以伐木、畜牧为主业的族群，通过军事扩张等手段兼并了附近弱小的族群，从而改变了俄罗斯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重塑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使这个融入了瓦良格人<sup>②</sup>海盗基因，经历了 240 年的“蒙古鞑靼桎梏”（монголо-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的民族最终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帝国。基辅罗斯奠定了东斯拉夫人的国本，而蒙古人的基因浇铸了俄国魂。别尔嘉耶夫指出，“蒙古统治摧毁了基辅罗斯时期欧洲式的封建结构，使俄罗斯脱离了西欧历史的发展路径。蒙古影响造成了俄罗斯国家的专制主义倾向、人民的服从性与东方式的国家崇拜”<sup>③</sup>。霍尔珀林（Charles J. Halperin）延续了别尔嘉耶

① 本文国家代码中的表意结构（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是指这些代码通过形式（符号的能指系统）和内容（代表的意义）构成一个可被解读的意义系统。

② 根据《古史纪年》的记载，罗斯人有一支被称为瓦兰人（瓦良格人），楚德人对罗斯人说：“我们那儿地大物博，但缺少规章信条。请你们来当大公，治理我们。”《古史纪年》，王松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0 页。瓦良格人是北欧维京人的一支，勇猛善战，以在海上杀人越货为生。

③ Бердяев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ние Г. А. Лемана и С. И. Сахарова, 1918. С.147.

夫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从蒙古那里学会了治理国家，在邮政、货币、文化、行政等多方面接受蒙古人的影响，成为蒙古精神文化的继承者。<sup>①</sup>这也是西欧基督教文明（天主教和新教）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时常爆发基督教内部亚文明冲突的原因之一，因为欧洲主流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将俄罗斯视为“东方”，视为处于基督教文明鄙视链末端的他者。<sup>②</sup>杜金认为，这种“末端鄙视”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矛盾的激化，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多为新教国家）站在宗教信仰的制高点上，对文明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划分，“美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而这一传统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文明的分类，而且这种分类无可否认地主宰着全球话语的节奏），全球主义与‘文明’这一抽象而统一的理念延续着早期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也清晰地投射在巴内特的理论图景中。在这种框架里，唯有‘核心’地区被赋予主体性，其它区域则被视为需要外在治理的对象，成为被剥夺了自我言说权利与主权尊严的‘他者’，所在地区成了‘去主体化’与‘去主权化’的空间”<sup>③</sup>。依照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价值判断，处于基督教文明鄙视链末端的俄罗斯首当其冲，被视为“去主体化”和“去主权化”的政治主体，西方世界不承认基督教还有另外的“中心”，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地理空间被亚洲蒙古清洗过，俄罗斯的精神文化无不显示着该国家的亚洲属性和东方的价值观。<sup>④</sup>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热点事件不断表明，两者争夺的是基督教世界的话语权，是精神文化领域内的意识

① See C. J.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3-24.

② 这是基督教世界中非常复杂的问题。简言之，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冲突既有宗教形式上的分裂，也有更深层面上的拉丁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罗马法制传统与灵性神秘传统的冲突。东正教与新教也存在裂痕，前者斥责新教为异端邪说，而后者在东正教中看到了威权主义和封建没落的保守主义。

③ Дутин А. Четверт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Росс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21 века. СПб.: Амфора, 2009. С.188.

④ 关于俄罗斯是蒙古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继承者的相关论述很多，包括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的“掀开俄罗斯人的人皮，里面是鞑靼人”的极端言论；俄裔美籍历史学家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认为蒙古-突厥-萨尔马提亚等草原文明是俄罗斯文明的重要根源；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米哈依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了俄罗斯君主制融合了拜占庭的君主与蒙古可汗概念的秘密，如代表俄式威权结构的象征物“莫诺马赫帽”（Monomakh's Cap）就源自中亚。See Jacob Dreyer, “Golden hoard: invading nomads in Russia and China”, October 16, 2014, <https://www.new-east-archive.org/articles/show/3221/invaders-mongols-ru-ssia-china-capitalism>

形态决战。<sup>①</sup>但是，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一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时候，俄罗斯认为自己继承了基督教文明优质的文化遗产。因为当时“拜占庭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基督教就是从拜占庭传入罗斯的。通过拜占庭，罗斯得到了最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sup>②</sup>“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她有独特的身段”（У неё особенная стать）这种实体性的物理结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影响），还因为“对俄罗斯只能信仰”（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的这种通过精神文化源文本所表达的表意结构可能被误读。国家代码借助表意结构天然地与国家意志捆绑在一起，而捆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精神文化的源文本就是族群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与国家利益和族群的生存息息相关。古代俄罗斯的村社制度（мир）强调的聚义性（соборность）<sup>③</sup>其实就是极权主义的萌芽状态。丹纳（H. A. Taine）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解释民族兴衰的逻辑，把根植于民族意识中不变的内核称为“永久的本能”，而俄罗斯的“永久的本能”恰恰就体现在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当中的精神文化力量，具有“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式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sup>④</sup>。利哈乔夫为这种“永久的本能”披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他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被有关其历史的如此矛盾的神话所笼罩，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俄罗斯人这样被众说纷纭”<sup>⑤</sup>。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独特的身段”是真实不虚的。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观察，目前最能够表现俄罗斯“国家代码”的是“普京主义”——强调“立足于俄罗斯人民在千余年的

① 俄乌冲突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想摆脱俄罗斯的束缚投入西方的怀抱，从欧洲的“农村”走出来，成为欧洲这座“城市”的居民，而说俄语的乌东居民则希望继续留在欧洲的“农村”。

② 肖瑜：《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367 页。

③ 从词源角度分析，соборность 与 собрание、сбор、собор 是同根词，皆强调在一个屋檐下的照面，而 церковь 则代表了三位一体性，前者强调人在一个空间里的相遇，后者则是指单一的信仰和拯救的力量。对俄罗斯来说，聚义性是本土化的、融入了信仰力量的俄罗斯精神文化。

④ [法]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47—148 页。

⑤ [俄]德·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3 页。

历史中创造的基本道德——精神价值观。”<sup>①</sup>普京本人用别尔嘉耶夫的话对精神价值观进行了解释，他说：“这不是影响向前和向上运动的力量，但却是阻碍向后和向下的力量”<sup>②</sup>，换言之，俄罗斯发展之路不能向后或者向下，只能向前或者向上。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普京对俄罗斯的“精神价值观”进行了更简明的概括：“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独的文明。”<sup>③</sup>这种概括把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与欧洲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文明进行了区分，强调这个“单独的文明”有自己的源文本。梅茹耶夫（B. Межуев）对俄罗斯这个“单独的文明”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其中的深刻内涵，那就是“在文明的意义上，俄罗斯人对未来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想象。约瑟夫·汤因比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指出俄罗斯所代表的东正教文明继承了拜占庭最大的遗产，那就是极权主义”<sup>④</sup>。极权主义具有强制性，是特定时空中的集体主义，亦是俄罗斯这个单独文明的显著特征，这不是贬义的，是符合当下俄罗斯人精神价值观的，有助于俄罗斯摆脱“向后和向下的力量”的表意结构。在《伊万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1564-1579*）中，伊万四世的权力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展现了俄罗斯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伊万四世明确告诉库尔布斯基（A. Курбский）：“对外敌的容忍就是对自己的戕害，俄罗斯大地的完整需要通过强有力的专制制度进行维护与巩固”<sup>⑤</sup>。由此衍生出的俄罗斯强人政治思维从未中断，从留里克王朝延续到罗曼诺夫王朝，并在苏联和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生活中得以延续，形成了俄罗斯的政治文明和思维定式。这也与斯宾格勒（O. Spengler）对文明的理解不同。斯宾格勒在衰落的西方文化中看到不可避免要降临的文明，文化蜕变为文明是工业化的结果，“西方工业已经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在俄罗

① “‘普京主义’推出政治强国模式”，新华网，2025年6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30/c\\_1210123588.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30/c_1210123588.htm)

② 同上。

③ «Росси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страна, а отдель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7 октября 2020 г. <https://tass.ru/info/15972421>

④ Межуев В. М.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ы.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6, С.328.

⑤ 郑永旺：“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2页。

斯就是“假晶现象”，即斯宾格勒所说的“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的现象，<sup>①</sup>这使得古老的俄国魂无法理解变异后的现实。但对于拥有“独特身段”的俄罗斯来说，只要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涅斯托尔假托俄罗斯人是雅弗后代的这种史学想象，这尊集体意识的神像就会受到无数信徒的膜拜。也正是承袭这种古老又年轻的史学想象，杜金才能提出基于新欧亚主义的“第四政治理论”，主张通过联合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在文学领域，与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相呼应的是伊万诺娃等人提出的较为柔性的“文学拯救俄罗斯”（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ет Россию）的文学中心主义构想和邦达连科呼吁的重拾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批评传统的主张，也就是让文学直面日常生活的“肖像批评”（критик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ортрета）<sup>②</sup>。

精神文化是指与物质文化对应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思想意识、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成果。理论上，人类作为文化动物，无论什么民族，其心智决定了对善恶美丑的判断标准是趋同的，但在现实中，每个民族因历史叙事和国家叙事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对俄罗斯来说，如下几个精神文化的源文本对国家代码中表意结构的建构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

### 三、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之根的《古史纪年》

历史源文本《古史纪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民族是“特选民族”这一终极问题。涅斯托尔（Нестор）站在《旧约·创世记》的高度，创制了有神性渗透的国家代码，而后来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为这套国家代码提供了配套服务的表意结构。涅斯托尔开宗明义地道出编年史写作的目的：“这是对往年历史的记载，记述罗斯民族从何而来，谁是基辅的开国大公，以及罗斯国如何形成。”<sup>③</sup>从俄文看，“罗斯民族从何而来”中的“罗

---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第二部），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 171 页，第 469 页。

② 参见李欣、郑永旺：“论弗·邦达连科的肖像批评”，《文学与文化》，2025 年第 1 期，第 52 页。

③ 《古史纪年》，王松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 页。

斯民族”，俄语用的是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俄罗斯大地）<sup>①</sup>，而不是“族群”一词。*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旨在强调空间对族群繁衍的重要性，而且这个空间的获得与神谕存在因果关系，否则神话叙事和国家叙事会因没有空间的依托而变得虚妄，就像只有在流着“蜜与奶”的迦南地，以色列才有安全感一样。俄罗斯大地的意象在《古史纪年》中是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无意识）的生发之地，亦是国家命运的超级能指。“谁是基辅的开国大公”实际上是在追问“谁在基辅开创了国家神话”。涅斯托尔最先想到的是基易三兄弟，他们以基辅为基点，联合德列夫安人、诺夫哥罗德人、楚德人等早期松散的部落，建立了以雅弗子孙俄罗斯人为主体的民族谱系。这种雅弗后代推断说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涅斯托尔假《旧约·创世记》之名给出了“不容置疑的”证据。

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sup>②</sup>

涅斯托尔推测，“在雅弗的领地内居住着俄罗斯人、楚德人和其他各种族”<sup>③</sup>。这种地理空间决定论依靠一个简单的逻辑：第一，雅弗的后代占领了西方和北方，72 族中有一支就是斯拉夫人；第二，族群的地理空间决定了他们的归属感。国内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历史书写对民族使命的定位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以此构建初始的古罗斯帝国形象”<sup>④</sup>；“罗斯国如何形成”强调的重点是罗斯建立的过程和王国的发展图景，而且这一问题只能在前两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才能提及。《古史纪年》的核心目标与价值可从三个维度审视：从史学维度上看，编年史所要达成的目的，是为俄罗斯民族提供一个宏大的、上至大洪水挪亚三个儿子分封地盘，下到公元 1117 年弗拉基米尔将其子姆斯季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派往别尔哥罗德的广阔时空。在神学维度上，借助神圣文本的加持，涅斯托尔将俄罗斯民族史与公元前大

<sup>①</sup> 古俄语原文是：Повѣ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ъ (прошлыхъ) лѣт, откуду есть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хто въ ней почаль пѣрвѣе княжити, и откуду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стала есть. 我们认为，*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译成“俄罗斯大地”更准确。

<sup>②</sup> 《旧约·创世记》，第 9 章第 25–27 节。

<sup>③</sup> 《古史纪年》，王松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 页。

<sup>④</sup> 史思谦：“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建构”，《俄罗斯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4 页。

洪水后的人类文明重建紧密相连，使俄罗斯大地的扩张与神谕存在因果关系。编年史的诗学价值在于，它作为民族文学的雏形，展现了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化过程。通过对历史的诗意图象与重构，为叙事赋予了文学性，同时，文学叙事又明显增强了历史叙事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涅斯托尔被后世追认为东正教的“编年史撰写圣人”（преподобный летописец），是民族历史意识的奠基者，他通过在《古史纪年》中巧妙地融入神圣文本叙事，赋予历史史实以神圣性，完成了历史叙事与神圣叙事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构建了俄罗斯民族是特选民族（избранный народ）的历史观，为后世俄罗斯的弥赛亚思维提供了来自神圣文本的阐释资源，从而，确定了“挪亚-雅弗-俄罗斯人”这一完整的神学逻辑链条。这套逻辑被后来的菲洛费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神学话语、别尔嘉耶夫的“俄国魂”、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思想和阿克萨科夫的“俄罗斯观点”（рус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sup>①</sup>不断延续与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尝试把这套神学逻辑改装成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和共同追求：“可以这样说，我们俄罗斯人都有坚定的民族思想，是的，就是民族思想。因此，如果民族思想真实存在的话，也是普世的、全人类大一统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思想的益处就在于让所有的人停止一切争吵，成为和俄罗斯民族一样的人”<sup>②</sup>。这种民族思想的特点是，先验地设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具有“普世价值”，能够帮助全人类实现大一统的理想。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理想”一旦被“俄罗斯的”限定，其普世性就值得怀疑，进而可能变成对其他民族的俯视。涅斯托尔也借助在历史文本中夹带民族私货的策略，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说，因为俄罗斯人具有雅弗那样神圣而高贵的血统，也就有资格住进“闪的帐棚”（其他族群），也等于有资格统治其他族群（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后来的俄罗斯思想家借此进行了自我催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中，俄罗斯是上帝

<sup>①</sup> 阿克萨科夫没有对“俄罗斯观点”进行定义，但在《试论俄罗斯观点》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可以表达作者的意图：“俄罗斯人民作为一种人民，直接有权而无须经过和得到西欧的允许才能拥有着全人类性。”参见[俄]阿克萨科夫著：“试论俄罗斯观点”，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sup>②</sup>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 соб. соч в 30 т. Т. 25.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8, С. 20.

特选民族也是有神学依据的”<sup>①</sup>，只是这种政治正确的特征过于明显。

《古史纪年》的精神文化价值远大于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该文本被视为是追溯俄罗斯思想形成条件的关键源文本。有学者指出，《古史纪年》中，“历史是融合了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既有无法更改的事实，也有包含民族对这些事实的充满感情的虚构”<sup>②</sup>。利哈乔夫是清醒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古史纪年》中的历史叙事具有不可靠性：“如果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在阐述奥尔加为丈夫伊戈尔三次复仇的叙述中，编年史家插入了许多足以打断叙事逻辑的情节，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现奥尔加出色的战争才华”<sup>③</sup>。利哈乔夫认为，涅斯托尔此举是出于政治理念，并断言，“《古史纪年》的作者一定是一位拥有坚定政治信念和文学品位的人。”<sup>④</sup>所以，这种服务于政治理念的叙事策略，要求文本书写符合特定的意识形态导向。为此，涅斯托尔加入了俄罗斯人是雅弗子孙的想象，<sup>⑤</sup>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变成了神学事件，具有了为政治思维提供弥赛亚元素的功能，也为后来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建构俄罗斯民族起源说提供了神学佐证。

#### 四、作为生存之基与俄国魂载体的俄罗斯大地

大地崇拜作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母亲原型（Mother Archetype），普遍存在于多个民族的神话体系中，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南娜（Inanna）、希腊的盖娅（Gaia）、中国的女娲，因为女性天然地与丰饶、繁殖、哺育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莫科什（Мокшь）、罗德（Род）和罗扎尼察（Рожаницы）就是大地神性的人格化体现。

《古史纪年》首次将俄罗斯大地的诗意图景与民族生存图景紧密结合在

① 郑永旺等：《当代俄罗斯文化软实力与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7页。

② 郑永旺：“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42页。

③ Лихачев Д.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М.: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7. С.35-36.

④ Там же, С.35.

⑤ 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宗教事件的期许价值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往往相互重叠，难以分开。

一起。在这部编年史开篇，涅斯托尔就提出“俄罗斯大地从何而来”<sup>①</sup>这一问题。俄罗斯大地最初的意义就是人生活的物理空间，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思想、文学和政治加工，俄罗斯大地从实体性的物理结构逐渐演变为超越物理结构的地理形象（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俄罗斯文化地理学者扎米亚京（Д. Н. Замятин）用“地理形象中的景观世界表现了人诗意地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状态”<sup>②</sup>来形容生存空间逐渐精神文化化的过程。编年史后续的历史叙事也是围绕俄罗斯大地的象征物——基辅，这个俄罗斯城市之母<sup>③</sup>展开的，就像《古史纪年》里所记录的那样：

安德烈登上山峰，行祝福仪式，竖起十字架，祈祷上帝，然后下山  
继续溯第聂伯河上行。后来这里出现了基辅城。<sup>④</sup>

基辅很早就开始扮演俄罗斯大地的角色。对大地的崇拜就是对灵魂依托之所的敬畏，也是对祖先获得俄罗斯大地的感恩。按照这样的逻辑，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里，基辅就是俄罗斯大地，代表了权力、荣耀。所以，公元 882 年奥列格迁都基辅时说，“基辅将成为罗斯众城之母”<sup>⑤</sup>，有“得基辅者得天下”的意味。那一刻，基辅作为俄罗斯大地的代言者，从法理上和权力架构上拥有了列斐伏尔（H. Lefebvre）所说的“空间的生产”的功能，即“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载体”<sup>⑥</sup>。

俄罗斯大地就是俄罗斯国家的表意结构，隐喻了俄罗斯的政治动因、文化逻辑和文学思维。在俄罗斯精神文化中，俄罗斯大地履行“空间的生产”的功能，是指其从具体的物理空间走向文化空间，从地理形象变成国家所指，

---

① 王松亭把 откуду есть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译成“罗斯民族从何而来”是值得商榷的。

② 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56.

③ 基辅为俄罗斯“城市之母”（Мать русских городов）出自 882 年奥列格在迁都基辅时说的一句话。从历史层面看，基辅是东斯拉夫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自然也就是俄罗斯人的城市之母。另外，从文化和语言层面看，基辅也是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个民族共同的物理意义上的故乡。普京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的电视讲话中指出：“我们与乌克兰是一个民族，共同拥有俄罗斯的城市之母基辅，我们不能彼此分开。”См. Путин В. В. Мы – один народ с Украиной. 18 марта 2014 г. <https://pg21.ru/news/11204>

④ 《古史纪年》，王松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 页。

⑤ 同上，第 12 页。

⑥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26–27 页。

从称谓变成俄罗斯的国家商标的流程。在教会斯拉夫语中，*страна*<sup>①</sup>和*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具有相同的价值，都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载体”。根据学者考证，“编年史中，俄罗斯使节多自称‘我等来自俄罗斯之地’（*страна русьска*）”<sup>②</sup>。这个 *страна* 即 *сторона*，是国家（王国）的官方称谓。另外，文学艺术在不断扩大俄罗斯大地所指范围的同时，也在扩大其能指的功能，即扩大了“空间的生产”的能力，俄罗斯大地不仅仅是国家、祖国这些实体性空间结构，也与祖国母亲、心灵的疗愈之地、生产资料的提供者等意象相连。如果说《古史纪年》用“众城之母”把基辅代表的俄罗斯大地神圣化，那么《伊戈尔远征记》在刻画鲍扬的人物形象时，将俄罗斯大地诗意图化和隐喻化，作者用“啊，罗斯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那面”<sup>③</sup>这样的诗句，把俄罗斯大地（罗斯国土）从具象化的岗丘后面的土地变成了对故土的怀念和失去故土的焦虑。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俄罗斯大地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原乡。此时，俄罗斯大地不仅是领土，更是东正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族命运的承载之物。

俄罗斯大地深藏着俄罗斯人原始思维的密码，在俄罗斯大地上生活着莫科什、庇隆（*Перун*）、罗德、罗扎尼察等本土神祇，后来又出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С. Радонежский）这样的本地圣徒。除了《伊戈尔远征记》不断出现的“特罗扬”<sup>④</sup>外，莫科什（*Мокошь*）是俄罗斯多神教时期与庇隆齐名的俄罗斯大地守护神，根据学者研究，那时候，“斯拉夫民族向维拉、莫科什、迪娃、佩鲁恩、霍尔斯、罗德和罗扎尼察献祭并举行仪式”<sup>⑤</sup>。当罗扎尼察担负族群开枝散叶使命时，莫科什起初还没有展现出“大地润泽的母

① *страна* 源自 *сторона* 一词，最初指偏远之地，后来指代一种势力范围。

② Рязанова-Кларк 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 РГГУ, 2014. С.43.

③ 《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④ “特罗扬的大地”或者“特罗扬的足迹”中的特罗扬指的是谁，《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译者魏荒弩在注释中指出，特罗扬很有可能是东斯拉夫人的神祇。雷巴科夫（Б. А. Рыбаков）给出的结论是，《伊戈尔远征记》中的“特罗扬”可能指6世纪斯拉夫征服巴尔干时期的英雄 Траян，后来被误写为 Троян。总之，原始意义已不可考。См. Рыбаков В. А. Язычество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13. С.26.

⑤ Кутарева О. В.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Рода и Рожаницы в славян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Б. А. Рыбакова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Религиоведение. 2013. №.4. С.171.

亲”（Мать-Сыра-Земля）的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莫科什的价值逐渐与罗扎尼察重叠，并和土地建立共生联系。此外，东斯拉夫语 *земля* 本来就有“基座”和“支撑面”的意思<sup>①</sup>，这个意思在很多斯拉夫民族的语言中都存在，如在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白俄罗斯语中的土地都为 *земля*，波兰语为 *ziemia*，捷克语为 *země*。原始的印欧语系的词根 *gʰem-* 和 *gʰdhom-* 中也能发现东斯拉夫语 *мля*（g/m）的印记。

俄罗斯大地作为表意结构完成了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就是把俄罗斯大地从具象化的物理空间转变为权力的或者政治的空间，也就是从物质性的地理形象到可被人操控的地理形象的转变。在这个第一次的转变中，俄罗斯大地的空间属性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操控者。例如，公元 882 年之前，基辅的实际控制者是瓦良格人阿斯科尔德（Аскольд）和季尔（Дир），882 年之后变成了俄罗斯人奥列格（Олег），从而开启了基辅历史的新篇章。第二次转变是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在这部史诗里，俄罗斯大地的文化属性发生了变化，从地理形象变成诗意化的隐喻空间，向精神文化的道路上偏转，在文学叙事和国家叙事中，保卫俄罗斯大地就等于保卫俄罗斯母亲。在《静静的顿河》（Тихий Дон）中，肖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通过对“葛利高里俯身伏倒在地”的描写，体现了俄罗斯大地作为精神归宿的功能，主人公通过与土地的连接，自己的精神得到庇护，灵魂得以净化。

好啦，葛利高里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  
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sup>②</sup>

这段文字最能代表俄罗斯大地的精神文化属性，表现了人与俄罗斯大地的关系。“把脸埋在潮湿的泥土中”远非痛苦悲伤那么简单，那是迷途的游子在寻求母亲的保护，“润泽的母亲”就是潮湿的泥土（Сыра-Земля）的人格化，世上唯有大地母亲永远等待自己的孩子，这个动作也是心灵和肉体无

---

① Фасмера М. Статья Земля//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2 января 2015 г.  
<https://vasmer.slovaronline.com>

② [俄]肖洛霍夫著：《静静的顿河》（第四卷），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714 页。

声的重建仪式。

涅斯托尔通过《古史纪年》对民族起源发生学的重述建立了俄罗斯与神的连接关系，又以基辅为叙事核心，赋予俄罗斯大地精神文化的属性。进入现代社会，俄罗斯大地是俄罗斯强国梦想的物质文化源文本，常常以表意结构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罗斯是千年历史的继承者，这时间可以从基辅罗斯算起，俄罗斯大地是一个涵盖古代俄罗斯诸国的概念，是一个包括基辅、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的概念”<sup>①</sup>。但历史和现实之间横亘着被地缘政治分割的俄罗斯大地，按照哈布瓦赫（H. Halbwachs）的观点，俄罗斯大地是“社会群体通过选择重构过去，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维系认同的象征符号。”<sup>②</sup>但这种理论话语只能为解读古代俄罗斯文学中地理空间的精神文化属性提供学理支持，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大地只能是“想象的共同体”<sup>③</sup>。依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可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尚未在世界中起到决定作用”<sup>④</sup>，这是因为，“伟大的俄罗斯仍然是世界生活的偏远省份。”<sup>⑤</sup>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地”，至少在别尔嘉耶夫的理论视域里，俄罗斯大地更像是西方世界的神经末梢，像急于进入欧洲主流世界的未婚女子，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嫁错了人。”<sup>⑥</sup>别尔嘉耶夫没有对俄罗斯大地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进行更为细致的文化阐释。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大地作为表意结构在构建从基辅罗斯、金帐汗国时期、莫斯科公国、“混乱时代”（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1598-1618），直至当下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精神、弥赛亚思维、强化俄罗斯国家认同等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

①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21 июля 2021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② M.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0, p.40.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用“想象的共同体”定义这种来自遥远的过去，认为“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5页。

④ Бердяев Н.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борни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М.: Айрис Пресс, 2002. С.290.

⑤ Там же.

⑥ Там же, С.295.

## 五、结语

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作为变量，其表现形式随着时代、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常量，其底层逻辑，即民族性、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精神文化的源文本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任何民族来说，精神文化的源文本即是那些承载“永久的本能”的历史文本、文学文本。在俄罗斯文学中，则表现为以物质文化载体表现精神文化的俄罗斯大地。对于千年俄罗斯来说，《古史纪年》毫无疑问是俄罗斯思想者建构历史意识的重要资源，尽管其中夹带了作者历史想象中的政治正确思维；俄罗斯大地虽然以物质文化状态出现，但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属于东斯拉夫人集体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历史，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这些精神文化源文本为底层逻辑来建构国家代码的过程，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设”。那些貌似复杂的理论范式和政治思维都是精神文化源文本不同的演绎形式，很多思想都在传达一个诉求：通过表意结构实现国家代码或者国家形象的建构。国家代码本身是中性的，但在存在的过程中，因为政治、军事、文化等元素的渗透，衍生出超越本身所指的附加意义。与国家代码密切相关的是反映国家代码的隐性的或者显性价值的表意结构，即能指系统。没有表意结构支撑的国家代码是无法想象的，是没有内容的。表意结构与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源文本相互阐释，便完成了国家形象的塑造。

**【Abstract】** Since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hen Fyodor Tyutchev characterized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by asserting that “Russia has a unique bearing”, writers,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seemed to have found a master key for understanding Russia, and on this basis construc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interpret the “Russian soul” including Dostoevsky’s “Russian ideal”, Aksakov’s “Russian viewpoint”, and Berdyaev’s thesis of “antinomy in the Russian character”. From the late 20<sup>th</sup> to the early 21<sup>st</sup> century, political philosopher Aleksandr Dugin responded to the identity crisis under globalization with “neo-Eurasianism”, seeking solutions for Russia’s predicament. Yet the complexity of Russia’s “permanent instinct” lies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ep logic of Russian culture itself: only through an in-depth reading of the signifying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code” can one uncover the secret behind that “unique bearing”. This signifying structure encompasses not only cultural-symbol systems such as language, symbols, and myths, but also deeper cultural logics such as national narratives,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terpreting the signifying structure requires interpreting the source texts of Russian spiritual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text of *the Primary Chronicle* is the cultural root of Russia, laying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essianic thinking. Moreover, the Russian land itself, as a material cultural carrier, constitutes a signifying structure within the national code, possessing a dual attribute: a power space with physical meaning and a metaphorical space with cultural meaning.

**【Key Words】** Signifying Structure, Russian National Narrative, Russian Land, *The Tale of Bygone Years*, Neo-Eurasianism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в XIX веке Ф. Тютчев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оссии как «У ней особенная стать», литераторы, историки и философы словно нашли золотой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ущности. На этой основе ими были выстроены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арадигмы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души», включающие та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как «русский идеал»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рус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 К. С. Аксакова,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 России» Н. А. Бердяева. В конце XX –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А. Г. Дugin в рамках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а» предпринял попытку найти ответы на острые вопросы,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Россией. Однако сложность «вечного инстинкта» России проистекает из внутренней сложности её культурной логики.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глубокое прочтение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да» можно 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к тайне этой «особенной стати».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охватыв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системы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имволов, такие как язык и мифология, но и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логики, такие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нарративы,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 это, по сут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архетекс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рень России, заложивший т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мессиан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как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носитель культур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ыступает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да, обладающей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природой: как физ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ласти и как культурно-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关键词】**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нарратив,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文学拯救俄罗斯”与 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文化观研究<sup>\*</sup>

赵晨宇 岳博强<sup>\*\*</sup>

**【内容提要】**“文学拯救俄罗斯”是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向文学在精神与道德层面肩负的民族救赎使命。回溯文学批评史，该命题的源流与嬗变清晰可见：其思想雏形孕育于古罗斯文学中的宗教选择与民族认同；在19世纪黄金时代于西欧派、斯拉夫派与根基派的道路论争中得以明晰与深化；至20世纪白银时代，经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哲学家阐发，在形而上学层面实现东西方精神的融合与超越。苏联解体后，面对文化身份的遗失，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在重新诠释“文学拯救俄罗斯”的过程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自由派批评家伊万诺娃将视野投向世界文学，在全球对话中为俄罗斯寻找精神坐标，倡导以文学进行国际对话；爱国派批评家邦达连科聚焦民族精神重构，以文学凝聚认同，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学院派批评家巴辛斯基则在解构与重建间保持微妙平衡，让传统命题回应现代性焦虑。三者立场不同，却共同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参与民族精神构建的古老传统，生动诠释了“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在当代俄罗斯的思想活力；三种路径虽异，却共同激活了“文学拯救俄罗斯”在后苏联文化危机中的生命力——它依然是当代俄罗斯破解困局、探寻出路时无法绕开的思想光源。

**【关键词】**文学拯救俄罗斯 文学批评史 文学中心主义 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5)06-0153(3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79）、2026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2026lslybkt-113）、辽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LJ11241014009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赵晨宇，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岳博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俄罗斯的文化图景中，文学远非一种普通的文化形式，它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核心。俄罗斯文化中有认识论价值的“文学中心主义”（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зм）就强调，“文学在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享有权威地位。”<sup>①</sup>而从历史维度看，“民众永恒的沉默仿佛自古罗斯时代起就未曾间断，造成一种语义上的张力。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张力转化为滔滔不绝的言语洪流，最终形成俄罗斯文明中的‘文学中心主义’”<sup>②</sup>。另一方面，它也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文学中心主义在很多方面是文化限制的后果。当一个国家没有自由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时，文学就承担起了所有这些功能”<sup>③</sup>。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文学在俄罗斯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文化范畴，更深刻融入社会变革、道德评判、哲学研究乃至民族身份重构等多个方面。别林斯基曾针对 19 世纪的俄国社会指出，“俄罗斯的精神生活到目前为止都集中于文学，并将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完全集中于文学”，<sup>④</sup>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文学在当时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文学的价值还表现为，很多关系到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并非主要由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是由兼具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文学家，依靠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回应。因此，对俄罗斯而言，文学逐渐成为“人类所有情感和观念渗入社会的源头活水”，<sup>⑤</sup>是“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在文化范畴的核心体现。如果说德国文化常与古典哲学形成联系，美国文化体现于好莱坞电影，日本文化借由动漫展开传播，那么俄罗斯文化则将文学作为最有力、最核心的表达载体。当曾经的俄罗斯因专制统治而缺乏公共言论自由时，“文学便是他们唯一能够发声的社

---

① 刘文飞：“俄国文学的风格和特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第 105-113 页。

② Эпштейн М. Слово и молча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Звезда. 2005. №.10.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zvezda/2005/10/slovo-i-molchanie-v-russkoj-kulture.html?ysclid=mfuj6js1tv490160497>

③ 侯玮红：“将西方文论与俄罗斯文学对接——俄罗斯文化评论家利波维茨基访谈”，《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90 页。

④ Белинский В. Мысли и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20 апреля 2017 г. [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060.shtml?ysclid=mfeu0ftiao526768702](http://az.lib.ru/b/belinskij_w_g/text_0060.shtml?ysclid=mfeu0ftiao526768702)

⑤ Там же.

会讲坛……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学的影响力早已达到其他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维度”<sup>①</sup>。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之间呈现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欧洲甚至世界文化中都十分少见。

虽然“文学作为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民族性格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审美化呈现方式，曲折交织贯穿于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中，”<sup>②</sup>即每个民族的文学或多或少都和本民族的社会变迁存在关联，但正是基于文学在俄罗斯文化范畴内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学拯救俄罗斯”（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ает Россию）这一命题才具有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和合理性，具体表现为，文学自身的价值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紧密的关联。法国史学家与文艺理论家丹纳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sup>③</sup>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支柱，是因为它从种族层面上反映出“民族的和永久的本能”，<sup>④</sup>是俄罗斯文化中“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sup>⑤</sup>这种“永久的本能”使文学在俄罗斯民族面临危机时，能够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源泉，从而提供精神指引。因此，“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并非表示文学能直接干预政治或者经济进程，而是强调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社会历经危机时所发挥的精神拯救功能。正是文学与民族命运之间的这种深刻互动，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根本所在。

得益于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苏联解体后“文化身份的遗失、形而上学的荒凉、末日论精神的复活”<sup>⑥</sup>等多重现代性危机，俄罗斯文学因其在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被历史与现实再次赋予实现精神拯救的文化使命，“文学拯救俄罗斯”也因此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

① Герцен А. 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 13 марта 2017 г. [http://az.lib.ru/g/gercen\\_a/i/text\\_0360.shtml?ysclid=mfeugencz5915572787](http://az.lib.ru/g/gercen_a/i/text_0360.shtml?ysclid=mfeugencz5915572787)

② 顾广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多民族文学史书写范式考察”，《文艺报》，2022年2月9日第5版。

③ [法]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④ 同上，第61页。

⑤ 同上，第116页。

⑥ 杜宛玥、郭丽双：“当代俄罗斯文化危机与主体性突围——基于布拉夫卡的文化哲学视角”，《求是学刊》，2024年第6期，第11页。

在苏联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单是艺术性，即体现我们民族特质的俄罗斯文学之美，就足以拯救俄罗斯，不让其精神与道德形态被遗忘。”<sup>①</sup>恰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文学再一次在俄罗斯社会过渡、民族存续的关键时刻，凭借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及语言感染力，为困境中的俄罗斯指引了前进方向。对此，批评家伊万诺娃（Н. Б. Иванова）表示：“我愿意相信拉斯普京的这句话：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sup>②</sup>这再一次证实，文学在俄罗斯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文学中心主义”就是俄罗斯文化中最突出的特征。

基于此，我们从文学批评史维度来探索“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的源流，分析其内涵在古罗斯时期、19 世纪黄金时代、20 世纪白银时代的特点嬗变，结合个案分析来系统地考察当代俄罗斯主要文学批评流派如何基于各自文化观，再次诠释这一历史命题。首先将依照俄罗斯文学发展历程，聚焦西欧派、斯拉夫派与根基派，从批评史视角梳理“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与流变，进而分析这一命题如何体现在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俄罗斯当代批评家，即自由派批评家伊万诺娃、爱国派批评家邦达连科（В. Г. Бондаренко）以及学院派批评家巴辛斯基（П. В. Басинский）的批评实践中，以期促进中俄文学批评的交流与对话。

## 一、“文学拯救俄罗斯”命题的源流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sup>③</sup>在俄罗斯，这种“精神气候”具体体现为横贯欧亚大陆的地理格局，使其处于东西方的双重影响之下。基于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由社会所生产，同时，社会空间又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模式、社会形态”<sup>④</sup>等观点，俄罗斯的地理空间不仅承载其

① Распутин В. Мы не предали крепостей, на которых стоит Россия. <https://hrono.ru/statii/2001/rasputin01.html?ysclid=mfda1dpe8h211680640>

② [俄]娜塔利娅·伊万诺娃、郑永旺：“‘文学可以拯救俄罗斯’——娜塔利娅·伊万诺娃访谈录”，刘鑫译，《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③ [法]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 7 页。

④ 谢春平：“西方空间批评理论探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 年第 4 期，第 161 页。

文化交汇的现实，也塑造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即追随西方模式还是坚守本土传统的社会发展路径之争在俄罗斯思想史中长期存在。

通过对俄罗斯文学与思想的历史流变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上述的发展道路分歧早在古罗斯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初见端倪，在 19 世纪西欧派、斯拉夫派以及根基派的激烈辩驳中日益加深，并于白银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派别间的对立，步入更高层级的精神融合。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始终作为思想的核心载体，被赋予“拯救俄罗斯”的使命。因此，虽然“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直至当代才由拉斯普京、伊万诺娃等人正式提出并加以阐述，但该命题的根基却早在 19 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体现出深远的历史延续性。具体来说，西欧派主张，“建立立宪君主制，消灭农奴制度，发展没有国家干预的工商业”<sup>①</sup>；斯拉夫派则提倡，“拥护君主专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sup>②</sup>，认为“俄国的未来能在过去的历史，主要是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历史里找到崛起的基点。”<sup>③</sup>值得一提的是，根基派虽是在斯拉夫派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却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对西欧派以及斯拉夫派的观点既有批判又有接受，一定程度上在两派之间构成第三条道路。

尽管古罗斯时期尚未彻底形成明确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概念，但那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然蕴含的宗教选择、民族认同等关键命题，为后世争论提供了共同的思想资源。以《古史纪年》与《伊戈尔远征记》为例，可以清楚察觉到这一源流关系。《古史纪年》将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东正教的确立与国家认同融合为一体，“显示了历史与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建立在神学逻辑之上的政治正确”<sup>④</sup>。这表现为，该书通过历史书写服务政治诉求，借助神学逻辑塑造民族身份的合法性。作品开篇即将罗斯历史融入《圣经》的创世叙事，宣称俄罗斯人乃挪亚之子雅弗的后裔，由此赋予罗斯“神选民”的

① 李景云：“试论俄国历史上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南开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30 页。

② 同上。

③ 万海松：“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00 页。

④ 郑永旺：“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40 页。

身份，在神学谱系范畴将自身融入欧洲文明的共同起源，给了后世西欧派倡导俄罗斯应拥抱西方理念、走西方道路的立场以历史和神学上的依据。在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选定国教的相关记载中，《古史纪年》的作者强调了东正教之于罗斯国家的“适配性”，这种“适配性”实际上更加接近东斯拉夫人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据《古史纪年》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派出使团实地考察多种宗教，最终因东正教更符合罗斯族的审美而作出选择。这一记载尽管带有传说的性质，但“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基督教给予俄罗斯人灵魂的赠礼的一个宝贵的证明。”<sup>①</sup>这种经过理性审视与多方权衡的决策过程，展现出一种面向欧洲的开放性与对话意识，并影响了后世的西欧派思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弗拉基米尔大公选定东正教为国教，为斯拉夫派与根基派所提倡的东正教传统提供依据，彰显出俄罗斯精神道路的独特性和神圣性，进而为后来的“神圣罗斯”、“莫斯科-第三罗马”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和精神基础。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的民族史诗，充分体现出俄罗斯人对东斯拉夫精神遗产的继承关系。作品以伊戈尔王公对波洛夫人的征伐失败为主线，反映出俄罗斯思想中的双重倾向：一方面，史诗中对王公内讧的批判以及对团结的呼吁，可理解为斯拉夫派提倡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精神的早期文学表现。进而言之，“聚合性”所倡导的“聚而不迫、和而不同”<sup>②</sup>的自由统一原则，为俄罗斯开辟出一条通过集体信仰和爱来实现拯救的路径。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体现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殊属性——女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又和多神教的“大地润泽的母亲”（Мать-Сыра-Земля）存在关联。因此，“文学拯救俄罗斯”在《伊戈尔远征记》中的内涵，实际上就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母亲原型对俄罗斯的拯救。另一方面，这部史诗中“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刻下的印记就是崇尚战斗的军人文化，”<sup>③</sup>无疑对

---

① [俄]瓦·瓦·津科夫斯基著：《俄国哲学史》，张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② 季明举：“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第62页。

③ 郑永旺：“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54页。

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伊戈尔的失败亦可理解为缺少理性规划与集体纪律的结果，后世西欧派所宣扬的理性主义与制度改革的思想或许在此时就已初显。

古罗斯时期虽未呈现出明显的思想分歧，但却为后世提供了共有的文化资源与阐释空间，已然埋下了有关民族身份与发展道路辩论的思想种子。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迎来“黄金时代”，有关民族命运及精神出路的争论在彼得大帝改革后愈发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文学拯救俄罗斯”的思想逐渐在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根基派的分歧中清晰显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分别作为西欧派、根基派以及趋近斯拉夫传统的代表人物，通过文学创作深度介入了这场关乎俄国未来的思想辩论。

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西欧派，其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的核心思想，是借助文学启蒙社会，批判现实，推动俄罗斯走西方道路。屠格涅夫将知识分子归为利己主义的“哈姆雷特型”和利他主义的“堂吉诃德型”。他认为，“所有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为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想，即为他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而活着”<sup>①</sup>，而这种原则与理想或只顾及自我，即利己主义，为自己的存在而活；或针对他人，即利他主义，为了去除丑恶而生存。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典型的西欧式理性剖析，意在借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来诊断民族的精神病症。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巴扎罗夫等“多余”与“虚无主义者”的形象，正是“哈姆雷特型”的典型代表。他们徒有才智与激进的观念，却因脱离人民群众，又或者因陷入虚无与否定而丧失行动能力，最终成为所谓的“多余”人。屠格涅夫凭借这些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批判脱离俄国实际情况的空谈和盲目否定一切的激进观念，展现出其不能成为真正拯救力量的内在缺陷。然而，尽管屠格涅夫也试图塑造像《前夜》中的英沙罗夫，《贵族之家》中的莉莎等“堂吉诃德式”人物，但这些人物往往更侧重于对西方式理想的追随。整体来看，西欧派的“拯救”逻辑，是文学要发挥批判现实、启蒙思想的作用，为社会变革扫清障碍，最终推动俄国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

<sup>①</sup> [俄]屠格涅夫著：“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张捷译，载《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刘硕良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与西欧派相对，斯拉夫派主张俄国应该“走自己独特的、固有的村社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以东正教对抗西欧的天主教”，<sup>①</sup>并针对西欧派的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进行猛烈批判。然而，“大部分斯拉夫派缩进了书斋，根本没有到实践中推行理论的勇气，沦为夸夸其谈的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sup>②</sup>。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根基派于 19 世纪 60 年代正式诞生，这是斯拉夫派衍生的一个变体，也是对斯拉夫派思想的发展。

与部分仅停留在理论搭建层面的斯拉夫派不同，根基派更强调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联结，既“批判斯拉夫派思想中某些陈腐的观点和不切实际的因素”，<sup>③</sup>又批评西欧派的理性主义割裂人与信仰的传统联系，使俄国丧失了自身特性。就“拯救”途径而言，根基派认为俄罗斯的拯救之路不在于全盘西化或完全复古，而在于让知识分子立足本国国情，将“俄国和俄罗斯文化建设成一个可供世界各国、各民族借鉴和学习的样板”<sup>④</sup>。这种呼吁知识分子扎根民族土壤、从民众的信仰与生活中获取精神支撑、进而推动社会达成有机更新的批评观，在文学创作中亦有体现。

《罪与罚》集中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批评观，也是根基派反驳西欧派理性主义的核心作品。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将人类划分为“平凡人”与“非凡人”，认为后者如拿破仑，有权为实现更高目标而超越道德法律约束。这种思想并非是陀氏凭空臆造的，而是对当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西欧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思想的提炼与夸大。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人物所体现的“超人理论”与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是西欧理性主义在俄国社会极端化并朝不良方向发展的文学映照；而他最后依靠索尼娅象征的苦难与爱，走向忏悔并迎来新生，则达成了自己的精神救赎。

相较之下，托尔斯泰的立场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特点。他早期曾认同西方路径，但两次游历欧洲后发生转变，转而批判西方文明，并回归至俄国

---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思想探源”，《求是学刊》，1998 年第 2 期，第 101 页。

② 万海松：“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95 页。

③ 同上，第 94 页。

④ 同上，第 95 页。

传统中的东方文化因素与宗法制农民立场。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文学的“载道”功能尤为突出，这一特征与其对东方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关。作为“老子学说在俄国的第一位传播者，”<sup>①</sup>托尔斯泰承认自己所受到的影响“从孔子来的是‘很大’，从老子来的则是‘巨大’”。<sup>②</sup>其文学创作有意识地为传播宗教道德观念服务，集中体现为“托尔斯泰主义”（ТОЛСТОВСТВО）——“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和禁欲”<sup>③</sup>。这一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宗教道德意义，更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拯救意识与弥赛亚思维，其中强烈的布道属性和完整的学说体系是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放弃财产，追随玛斯洛娃前往西伯利亚，实现从“兽性的人”向“精神的人”的转变，完成精神上的“复活”。<sup>④</sup>这不仅是个体的道德觉醒，更是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社会整体精神图景的书写，充分证明“俄罗斯灵魂”才是个体获得拯救的最佳途径。这种对“精神的人”战胜“兽性的人”的信念，既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思想，也是托尔斯泰文学拯救功能的具体实践。

虽然托尔斯泰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斯拉夫派，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却与斯拉夫派形成呼应。《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于奥斯特利茨战场负伤，在仰望天空的瞬间领悟到“什么都是虚幻，什么都是欺骗”，<sup>⑤</sup>表明他从世俗功名与西欧式的虚荣中觉醒，转而探求生命的真正意义。这一精神转变与斯拉夫派主张回归东正教内在精神、抵制西方理性主义的立场相吻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卧轨自杀并非仅源自她与沃伦斯基的情感破裂，更基于西方式的个人解放与俄国传统伦理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她的这一悲剧性结局，正是托尔斯泰借助文学文本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生动体现。文学对

① 谢南斗：“老庄学说与托尔斯泰”，《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4期，第40页。

② 李明滨：“托尔斯泰与儒道学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第135页。

③ 周振美：“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20页。

④ 参见[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复活》，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⑤ 参见[俄]列夫·托尔斯泰著：《战争与和平》，朱宪生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

于托尔斯泰而言，不仅是关乎日常生活的文化产品，更成为治疗社会沉疴的一剂良方。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根基派的拯救手段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将文学视为拯救民族的关键力量。及至此后的世纪交替之际，文学的这项使命依然没有消失，在白银时代更实现了在哲学范畴的扩展与突破。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以及弗兰克等哲学家不断赋予“文学拯救俄罗斯”以新的形而上学意义，促使这一命题从思想对立逐步走向精神统一。

索洛维约夫的哲学虽深受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斯宾塞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与英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体现出西欧派推崇的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精神，但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批判性地吸收了斯拉夫派对东正教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强调。他提出“我们封闭于自己之中，我们对他者是不可透的，所以，他者对我们同样也是不可透的……这种把自己与其他一切的对立和对其他一切的实际否定，就是我们自然界的根本的恶”<sup>①</sup>的观点，进而创立“万物统一”（вседеличество）哲学，试图在更高层面缓解东西方的思想矛盾。

在俄罗斯，“万物统一”哲学也“与文学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②</sup>并深刻影响了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尤其为象征主义诗歌提供哲学层面的依据。在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当中，狂风暴雨既是毁灭性革命力量的象征，也被描绘为万物在分裂过程中走向新生的必然环节。长诗结尾处引领队伍的基督形象，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象征，也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理念中“神人类”思想的体现，象征着神性原则与人性在历史剧变中的结合。这一处理超越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传统对立，使哲学和诗学领域达成精神汇聚。

别尔嘉耶夫受根基派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洞察到文学的拯救功能，即作家作为“拯救者”的价值所在。基于这一认识，别尔嘉耶夫不仅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族精神根基与东正教传

---

① [俄]索洛维约夫著：《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128 页。

② 张杰：“‘万物统一’的美学探索：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论”，《外国文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23 页。

统的重视，还对西欧派的理性主义展开了批判。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为依托，以之为自己的观点作注，”<sup>①</sup>尤其突出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及创造性。别尔嘉耶夫既认为“只有精神才符合自由的本性，精神是无限的，自由亦然，”<sup>②</sup>也支持“创造是拯救的积极的道路。”<sup>③</sup>这种思想投射于文学创作，表现为对象征主义手法的推崇。他认为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象征主义作家相信有另一个世界。”<sup>④</sup>在《基督与反基督》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历史冲突抽象为灵与肉斗争的永恒象征，凸显了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主张，即具有上帝形象的自由个体，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参与精神现实的建设，进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根基派与西欧派的融合。

弗兰克不仅对斯拉夫派主要思想家霍米亚科夫提出的“聚合性”这一概念加以丰富和发展，使其从宗教范畴扩展至家庭、宗教和社会等不同层面，而且将阐释的侧重点转向社会领域，即以关注其社会意义作为主要方面。弗兰克认为，“社会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活”<sup>⑤</sup>，即个体在保留自由意志的同时具有统一的精神基础，以求达到自由和有机的统一。这种聚合性的自由统一思想，得以形象化表达于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之中。勃洛克的《陌生女郎》一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对着她那黑色的面纱我不禁凝望：在那儿，我看出了迷人的彼岸，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远方。”<sup>⑥</sup>诗中的“陌生女郎”象征着个体通过神秘体验与“远方”的统一体联结，这正是聚合性“内在融合”的文学呈现。

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与文学家在古罗斯传统与 19 世纪思想论争的基础

① 赵桂莲：“白银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国外文学》，1996 年第 3 期，第 65 页。

② 张百春：“别尔嘉耶夫神学思想概述”，《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③ 同上，第 20 页。

④ [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第 224 页。

⑤ 陈树林：“弗兰克对 20 世纪初俄国文化危机的回应”，《世界哲学》，2009 年第 6 期，第 140 页。

⑥ [俄]勃洛克著：《勃洛克诗歌精选》，丁人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04 页。

上，形成了对“文学拯救俄罗斯”命题的升华。传统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对立模式有所突破，东西方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统一。这不仅赋予文学以更深层的形而上学内涵，也为当代俄罗斯批评家对“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的诠释奠定了基础。

## 二、自由派批评家——文学作为思想解放的号角

苏联解体后，社会变革使俄罗斯面临多重问题，进而引发精神危机和价值观混乱。文化身份的遗失迫使整个社会重新定义俄罗斯文化，文学的文化使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所谓文学的文化使命，既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字中对文化的一般把握，”<sup>①</sup>也意指“在历史上和当下形成的对文化之系统化的思想和学术理解。”<sup>②</sup>长久以来，俄罗斯文化强烈倾向于用文学进行自我表达，即具有前文所述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但随着俄罗斯社会经历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动荡，俄罗斯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逐渐消解。俄罗斯文学“不再是解答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心理问题的百科全书，”<sup>③</sup>而是逐渐回归其本身意义——“文学只是文学而已”<sup>④</sup>。随着文学社会影响力的下降，文学批评的启蒙功能也相应减弱，其风格逐渐摒弃政论化，转而聚焦文本本身，“不得不开始转向美学评价”<sup>⑤</sup>。

相较于作家，当代文学批评家借助各种发声平台（例如电视和视频等流媒体，以及文学期刊和学术研究期刊等），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更多的接触，因此成为后苏联语境下构建、传播及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主要力量。在当代俄罗斯的文学批评谱系中，以伊万诺娃为代表的自由派批评家、以邦达连科为代表的爱国派批评家、以巴辛斯基为代表的学院派批评家，就文学的文

---

① 陈泽环：“培育时代新人离不开正确文化观的滋养”，《思想理论教育》，2019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② 同上。

③ 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392 页。

④ Иванова Н. Триумфаторы, или нов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нрав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 Звезда. 1995. №.4. С.179.

⑤ Новиков В. Критики о критике//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6. №.6. С.30.

化使命提出不同理解，再度诠释并激活了俄罗斯文学中固有的拯救基因，将“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历史命题置于当代语境下进行多维度探讨和创新性表达，使其展现出新的时代活力，成为回应社会危机、助力俄罗斯民族文化再度繁荣的重要拯救方案。

自由派批评作为对苏联时期意识形态束缚的反叛力量在苏联解体后得以迅速崛起，成为后苏联文学批评领域中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一批评流派主张，“超越偏激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为审度与评鉴的首要尺度”<sup>①</sup>，提倡文学个体性的回归、文学创作的批判性以及后现代叙事手段的运用。俄罗斯历史上的西欧派知识分子主张俄国应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强调理性、法治、个人自由与启蒙精神，反对斯拉夫派所推崇的东正教传统与民族特殊性。

从历史沿革来看，自由派的批评观与 19 世纪西欧派的思想传统高度契合，并在沿袭这一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反对文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支持文学与文化的多文化发展”、“推崇运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等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等观点。因此，自由派被称为“新‘西欧派’”<sup>②</sup>自然也不足为奇。以伊万诺娃、丘普里宁（С. И. Чупринин）、诺维科夫（В. И. Новиков）、涅姆泽尔（А. С. Немзер）、利波韦茨基（М. Н. Липовецкий）等为代表的当代自由派批评家，持续以《新世界》《十月》《民族友谊》等刊物为阵地发声，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与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万诺娃是当代俄罗斯自由派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叙事着重揭示俄罗斯文学的文化使命，并认为俄罗斯文学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方面，从文化学史的角度看，俄罗斯文学自古以来就与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这种传统或可上溯至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将文学创作作为批判社会现实、引发民众深思的途径之一。伊万

① 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294 页。

② Иванова Н. Триумфаторы, или нов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нрав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 Звезда. 1995. №.4. С.179.

诺娃的批评实践沿袭了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传统，她曾尖锐批评苏联官方文学对现实的粉饰。在评价邦达列夫的小说《人生舞台》（*Игра*, 1985）时，伊万诺娃认为其“情节不真实”<sup>①</sup>。但她对特里丰诺夫（Ю. В. Трифонов）的创作作了高度评价。特里丰诺夫通过塑造《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 1976）中的甘丘克教授、《初步总结》（*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1970）中娜塔莎的姑妈以及《交换》（*Обмен*, 1969）中的列娜等人物形象，呼吁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时代应该承担坚守精神独立、抵抗市侩风气、维护社会良知等道德责任。伊万诺娃主张文学应当参与社会实践，认为“当前俄罗斯知识分子肩负重任”<sup>②</sup>，此种责任感恰与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一脉相承，也与特里丰诺夫笔下知识分子的道德探索相互呼应。

另一方面，从哲学维度审视，伊万诺娃文化观的哲学渊源或许在于俄罗斯文化中独特的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思想史中，以民族思想为拯救世界的武器，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精神层面的内涵之一，伊万诺娃将文学视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尤其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她在访谈中指出，陀氏的创作奠定了现当代文学范式，并直言：“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可能不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sup>③</sup>换言之，伊万诺娃认为俄罗斯当代作家从创作主题到创作诗学均继承陀氏传统，包括对人性苦难的形而上的反思，契合了弥赛亚意识中的精神拯救内涵。

关于伊万诺娃的文化观，我们大致可以从存在主义角度和文化哲学层面上来解读。存在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主张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关注人的个性与自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陷入迷茫，民众产生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学也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但是，伊万诺娃依旧鼓励俄罗斯当代作家们勇敢投身于文学创作，用文学书写自身经验，进行自我审视，寻找后苏联语境下俄罗斯的前进方向。她积极评

---

① Иванова Н. Хади-заде, проза -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задачи. С пленума Совета по крити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ю при правлении СП СССР// Вопрос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5. №.10. С52.

② Иванова Н. В ответе мы сами//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7 октября 1989 г.

③ 娜塔利娅·伊万诺娃、张变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代俄罗斯文学——娜塔利娅·伊万诺娃访谈录”，《俄罗斯文艺》，2019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价佩列文（В. О. Пелевин）、乌特金（А. А. Уткин）等人在各自的作品中融入有关社会发展和个人感悟的做法，对这种用荒诞与隐喻手法重构现实进而形成的“新现实主义”风格予以肯定，并以此为原则呼吁俄罗斯当代作家既要对笔下的社会现实保持批判态度，又要使作品具有穿透文化障碍的思想力量。这符合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主动选择与担当，能够推动当代俄罗斯文学从地方书写逐步走向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共同体。

伊万诺娃所提倡的文学“实用性”与文学的国际化路径，是对俄罗斯文化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即她试图通过激活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拯救”基因来实现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当代化进程。从这一角度看，“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哲学意味。

这种深植于批判传统与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观，其最终落脚点指向俄罗斯文化中一个独特而核心的群体——知识分子（интелигенция）。对知识分子命运与责任的思考，构成了理解伊万诺娃文化使命观的另一个关键向度。“知识分子”一词于18世纪经哲学家特列季雅科夫引入俄国的哲学话语体系，后经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加利奇进行本土化阐释，得以完成其文化内涵的增殖。<sup>①</sup>自古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自觉承担历史责任，通过理论认识世界，通过实践改造世界，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充分展现出自身的创造力和民主自由主义精神。然而，根据伊万诺娃的观点，在苏联解体后，“苏联文化与苏联政权一起不复存在似乎是不争的事实”<sup>②</sup>，俄罗斯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影响。

由于社会体制的变革，原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成功转型为新体制的管理者（управляющие），他们在组织和参与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有倾向性地使自己和身边的人获利，并陆续在新体制的社会和文化中占据新的主导地位；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无法适应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而逐渐走向没落。面对这一困境，伊万诺娃呼吁当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虽然处于边缘，但依然坚守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应当重拾俄罗斯文化

<sup>①</sup> 参见朱达秋：“俄罗斯知识分子现象的文化透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91页。

<sup>②</sup> Иванова Н. Итоги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намя. 2001. №.4.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znamia/2001/4/itogi-sovetskoj-kultury.html>

中的拯救传统。在具体的拯救途径上，她尤其关注文学的核心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通过教育、艺术、特别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精髓向更广泛的群体传播，促进后苏联语境下俄罗斯文化的复兴。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为俄罗斯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其文化内涵始终彰显着历史特性与文化特性，其拉丁词根“intellegentia”中所包蕴的理性自觉与认知能力的原始意涵，也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逐渐异化为道德担当与民族救赎的精神象征。这种文化内涵的嬗变，也不失为弥赛亚意识的一种体现。伊万诺娃对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辩证思考既深植于俄罗斯传统的精神谱系，又直面后苏联时代的社会现实，充分彰显出其文化观的历史深度与哲学厚度。

从伊万诺娃对托尔斯泰艺术成就的解读中，我们也得以窥见她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在伊万诺娃看来，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具体描绘了拿破仑或库图佐夫这些历史人物本身，而在于“作为艺术家把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而不是 1812 年战争）写成了永恒的拿破仑或库图佐夫，”<sup>①</sup>即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成功地将自己同时代人的精神特质，塑造成为像拿破仑或库图佐夫那样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形象。这恰恰揭示出，文学艺术具有超越历史背景和事件、捕捉并塑造反映人类普遍处境和根本性的“永恒形象”或“经典典型”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伊万诺娃关于文学的文化使命叙事的奥义所在，即文学介入社会、批判现实最根本的力量，并非仅仅停留在针砭时弊的表面层次，更在于它通过塑造这些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永恒形象”，为人类存在的本质提供深刻的洞察，这本身就蕴含着唤醒民众、批判现实的巨大力量。

如前文所述，伊万诺娃所倡导的文学“实用性”，不仅是简单的文化输出，更是在满足人类对于外界好奇心的基础上，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建构俄罗斯的文化软实力。文学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可以向全世界传达当代俄罗斯社会和思想的现状。通过文学交流，各国读者可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看到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与挣扎，通过感悟作品中传统信仰的崩塌理解当代

---

<sup>①</sup> Иванова Н. Русские автор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тумане// Знамя. 2009. №.8.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znamia/2009/8/russkie-avtory-v-evropejskom-tumane.html>

俄罗斯的精神和道德困境；也可以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看到劳改营中骇人听闻的景象，触摸苏联极权体制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这都使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文本具有多向度的属性，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化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此外，伊万诺娃也对文学的媒介本质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指出，俄罗斯文学可以成为替代媒体的媒介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否定新闻的时效性，而是强调文学叙事应具备一种穿透表象的透视功能。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创造的魔幻世界或许相比于新闻报道更能反映出苏联现实，拉斯普京对西伯利亚农村祖屋、河流、森林的刻画，也可能比统计学数字更能表现传统与现代的撕裂创伤。

面对后苏联时期国际社会对当代俄语文学与文化关注度的减退——高校俄语科研机构与俄语系学生规模的缩减，俄语文学作品译介的质与量都在下降……面对这些困境，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伊万诺娃主张，“必须不遗余力地推广俄罗斯文学，（俄罗斯作家应积极）参与文学活动、旅行交流、广泛阅读、参与演讲、展览、颁奖仪式以及圆桌会议”<sup>①</sup>，寻找更多方式，拓宽文学国际化路径。

这种路径既指向与西方和世界文学的常态化互动，同时也建立在对俄罗斯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之上。伊万诺娃认为，俄罗斯作家频繁现身欧洲并非单纯向西方展示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而是通过“更好地接触并影响读者”的理性路径，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转化为普世性的精神对话。同时，伊万诺娃也意识到真正的“文学外交”并不是文本的简单译介与输出，而是使当代俄罗斯文学与世界进行深刻对话。这一主张深刻契合自由派推动本土文化与全球语境接轨的鲜明立场，“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也因此得以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获得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实践维度上，伊万诺娃的文学批评折射出一定的文化意义，既在于存在主义与文化哲学的结合，也在于其与苏联时期文学政策和文化现象的比照。

---

① Иванова Н. Русские автор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тумане// Знамя. 2009. №8.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znamia/2009/8/russkie-avtory-v-evropejskom-tumane.html>

② Там же.

伊万诺娃将批评描述为一种“艺术与职业”<sup>①</sup>，在对批评家提出职业化要求的同时，又认为要让批评成为创作本体的延伸。她援引列夫·安年斯基的警句——“若文学消亡，批评将承担解释其消亡之责”<sup>②</sup>——来表达文学和批评的共生关系。文学是批评的基础，脱离文学作品，批评自然无法存在；批评又反作用于文学，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得以借助批评而彰显。正如前述所提及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与自我创造，而文化哲学注重研究文化本质、发展及其规律，并关注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助力当代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既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行动号召，也是一种文化自觉，意味着当代俄罗斯文学只有经过持续的反思和批判，才能真正打破固有模式的限制，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价值。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正如存在主义中论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在”一样，使俄罗斯文学能够在交流碰撞中不断突破自身局限，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重构中获得新生，从而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创造出文化存在的价值，进而得到“拯救”。

由于苏联文学存在某种价值偏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时期单一同质化的文学叙事，这也使苏联时期的文学逐步丧失多样性与创新性。后苏联语境下，以伊万诺娃为代表的自由派批评家努力通过文学批评打破这一教条式的框架，倡导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去政治化，认为文学应表现个人经验、揭露历史，支持用后现代主义来解构传统的宏大叙事。正因为自由派支持后现代主义与跨文化叙事等新模式，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更加多样化，文学创作也更具活力。总之，伊万诺娃的文化观是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她强调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应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号召知识分子积极担当起推进文化进步的使命，这有利于重唤民众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从而缓解后苏联时期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身份遗失问题。伊万诺娃所提倡的文学“实用性”及文学国际化路径，有利于扩大当代俄罗斯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或许能改变当代俄罗斯文学疲软无力的尴尬现状。此外，伊万诺娃关于文学批评的哲学重构同样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

---

① Иванова Н. Кому она нужна, эта критика?// Знамя. 2005. №.6. С.183-184.

② Там же.

实现当代俄罗斯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 三、爱国派批评家——文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纽带

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爱国派思潮，源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民族文化身份重构的历史语境，其思想渊源或可追溯至 19 世纪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西欧派主张效仿欧洲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要根据俄国自身特点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强调俄罗斯独特的文明路径。爱国派批评继承了斯拉夫派的文化思想，在汲取苏联时期国家荣耀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基础上，认为文学应用来重建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和文化主权，因此也被称为“新‘斯拉夫派’”<sup>①</sup>。爱国派与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对抗，在各自的批评话语中表现得尤为激烈，邦达连科在自己的批评言辞中，将自由派的丘普里宁、伊万诺娃直接称为“自由主义者——仇俄分子的代名词”<sup>②</sup>；而在自由派的评论中，邦达连科则被尖锐地称为“红得发黑的恶棍”<sup>③</sup>。这种充满火药味的互斥，恰是 19 世纪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展现于后苏联文学批评的生动写照。爱国派批评家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强调文学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他们也强调要坚持传统的道德标准，反对自由派的过度西化立场，并不断以《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莫斯科》《明日报》等刊物为阵地持续发声，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命题、批评范式及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90 年代初期，爱国派内部逐渐分裂为强调集体主义、反对西方立场、追寻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符号的“红色爱国派”，以及主张俄罗斯应当延续东正教精神、认为文学应回归宗教哲学与道德救赎的“白色爱国派”。

邦达连科是“红色爱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见诸《精神与物质的碰撞》（*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духа с материей*, 1980）、《寻找“蓝色的”岛屿》（*Найти «голубой» остров*, 1981）、《一代人的自画像》（*Автопортрет*

<sup>①</sup> Иванова Н. Триумфаторы, или новы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нрав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Звезда. 1995. №.4. С.179.

<sup>②</sup> 参见张建华：“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对话两则”，《俄罗斯文艺》，2006 年第 1 期；邦达连科 B. Пламенные реакционеры. Три лица рус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 M.: Алгорит, 2003. С.11

<sup>③</sup> 张建华：“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对话两则”，《俄罗斯文艺》，2006 年第 1 期。

*поколения*, 1985)、《文学风俗论》(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нравов, 1987) 等著作之中。邦达连科“被公认为爱国派阵营中最刻苦的‘劳作者’，”<sup>①</sup>同柯日诺夫 (B. В. Кожинов)、库兹涅佐夫 (Ф. Ф. Кузнецов) 等人一同坚持民族爱国主义阵线。但无论是卡金采夫 (А. П. Казанцев) 投身于政论文写作, 或是柯日诺夫转向古典文学研究, 他们都舍弃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只有邦达连科始终维系着爱国派批评的存在, 成为同一时期民族爱国主义批评领域里一面孤独的旗帜。<sup>②</sup>

与自由派以及其他爱国派批评家不同, 邦达连科具有一种独特的批判指向, 他并非全然认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 也未将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看作俄罗斯的民族精神。通过不断地对红色爱国派内部僵化教条的现象进行批判, 邦达连科始终聚焦于探索当代俄罗斯民族价值的深层内涵。他坚持文学必须承载道德教诲与民族精神的重担, 大力抵制自由主义引发的文学形式混乱和道德虚无主义。对于在自由派批评家中享有盛誉的侨民作家多甫拉托夫 (С. Д. Довлатов), 邦达连科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激烈批判, 认为其作品“没有任何道德劝谕、任何教诲, 没有任何智慧的言语、任何复杂的修辞。”<sup>③</sup>他尤其反对多甫拉托夫作品中的“生者”与“死者”、虚构主人公与真实历史人物交流对话的体裁特征, 并直言“他似乎有意识地混淆所有体裁, 包括回忆录、小说、随笔、笑话。当然, 实质上这是不道德的手法。”<sup>④</sup>在邦达连科看来, 多甫拉托夫的“日常生活的表演主义”本质上是受自由主义知识氛围影响的结果——“多甫拉托夫笑话式小说最主要的怪象在于, 从一开始, 从迈出的最初步伐起, 他就处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子, 完全不知晓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土壤派; 因此, 他的全部冷嘲热讽, 全部矫揉造作的犬儒主义, 守卫的冷酷无情, 他都往这个圈子发泄”<sup>⑤</sup>。由此可见, 多甫拉托夫的表演主义丧失了文学应有的传统, 即文学的拯救功能, 成为各

① 参见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 第 291 页。

② 参见同上, 第 293—294 页。

③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лебейская проза Сергея Довлатова//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7. №.12. С.258.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种体裁相互杂糅的语言游戏。

以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为界，邦达连科文化思想的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苏联解体之前，他在思想上既倾向列宁和社会主义，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和批判的态度，本质上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辩证扬弃，同时侧重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民族传统的回归。苏联解体后，他提出了“精神上的俄罗斯”（духовно русский）这一概念，<sup>①</sup>即突破血缘与地域限制的文化认同标准，试图在俄罗斯的民族与血统之间寻求一个中间地带，以缓和爱国派内部、爱国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观念分歧。总体而言，邦达连科的文化观从传统价值观视角对“文学拯救俄罗斯”的话语内涵加以丰富，他和库尼雅耶夫（С. Ю. Куняев）等作家一同坚守着俄罗斯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认为文学在反映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拓展了“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历史命题的内涵与外延。

在有关后苏联时期文学责任的讨论中，邦达连科与伊万诺娃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路径。伊万诺娃认为，“苏联自由主义者在生活方式上更接近西方人”<sup>②</sup>，并借助存在主义对个体责任的要求，来回应后苏联时期“文学获得了自由与权利，却遗忘了责任”<sup>③</sup>的现象。邦达连科则回归东正教与斯拉夫派的宗教传统，强调应当保护当代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出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体而言，他在苏联解体后提出的“精神上的俄罗斯”这一概念，使俄罗斯民族得以从狭隘的血统论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强调俄罗斯民族、文化以及历史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在邦达连科看来，以血统或血缘、地缘等关系为民族划分依据的血统论最终会导致一种民族批评陷阱，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超越生物学上的血统意义，指向一种基于共同文化记忆与价值观的集体认同。同时他还认为，需要恢复的是所谓“主权思维”（державное мышление），即由国家的精神独立和民族的文化自主所组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包含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而且还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对话语权的争夺，也就是所谓“谁主宰了社会意识，谁就主宰了

<sup>①</sup> Говорухина Ю.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жур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и формы е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6. С.90.

<sup>②</sup> Иванова Н. Б. Либерализм: взгляд из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5. С.6.

<sup>③</sup> Там же, С.22.

社会。”<sup>①</sup>这种旨在通过文学重建民族精神主权、对抗西方文化殖民的思想主张，与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sup>②</sup>的弥赛亚式的观点不谋而合。此外，邦达连科将俄罗斯视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的观念，不仅呼应了索洛维约夫“把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放在了人类通向万物统一和神人类运动中的显要位置上”<sup>③</sup>的主张，而且也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欧亚文明属性，或可追溯至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哲学中“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去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sup>④</sup>等有关言论。

然而，邦达连科的上述观点却在“爱国派”内部引发了争议。尽管同属爱国派阵营，但同路批评家仍然对他将意识形态拆解为政治与美学两个维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邦达连科既反对自由派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追随，也抵制爱国派内部简单化、教条式的批评方式。在评价戈尔博夫斯基（Г. Я. Горбовский）的诗歌时，他就曾指出，虽然当时的主流批评捕捉到了诗中主人公对世俗的怨愤以及诗中蕴含的虚无主义色彩，但“不幸的是，这种详尽的批评既不关心诗人的真实命运，也不关心俄罗斯本身真正的问题。”<sup>⑤</sup>这充分体现出邦达连科的批评主张，即真正的批评应当穿透事物表象，深切关注个体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本质问题。同时，邦达连科的文化观也使其文学批评具有一种审美上的宽容性。他既肯定本土作家的民族精神性书写，又不轻易对其他作家加以道德化的审判。他对不同风格、主题，甚至是粗俗乃至情色题材的作品都予以包容，认为其“在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经典作品中都能轻易找到。”<sup>⑥</sup>这种审美宽容性恰是邦达连科试图扩大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和审美基础的必然反映，从而体现出他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深刻理解。正如他认

---

① 邦达连科、张兴宇：“何谓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俄罗斯文艺》，2008 年第 1 期，第 20 页。

② 郭小丽：“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76 页。

③ 郑润权、陈杨：“谈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原则”，《西伯利亚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62 页。

④ 杨明月：“欧亚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之源”，《俄罗斯文艺》，2017 年第 4 期，第 60 页。

⑤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окаяние грешного Глебушки//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3. №.12. <https://pub.wikireading.ru/hpfzPQ0CAa?ysclid=mdu6trdfgg448091924>

⑥ Там же.

为戈尔博夫斯基的诗歌“充满了俄罗斯命运的伤痛，这使他成为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sup>①</sup>邦达连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认同，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层面，而是要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体验基础之上，要把血统和爱国分开来看，融入民族诗歌就是将个体的“我”扩展到文化集体的“我们”。与其他爱国派批评家不同的是，邦达连科执着于复兴民族精神的本真内涵并为之注入新的意义和内容，因此扩展出更为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和外延，而他对审美宽容性的坚守，也为其他民族主义文学传统注入了现代性因素，从而推动当代俄罗斯文学既能保持与普希金传统的血脉相承，又能融入诸如后现代叙事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开放性特质的民族文学，通过实现文学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来进一步助推“文学拯救俄罗斯”。

关于文学本质的认识问题，邦达连科也与自由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具有一定的价值功能属性。可以说，邦达连科的这一观点是从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追溯中产生的。他认为，俄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在“以种种方式承载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sup>②</sup>而当下文学与国家的疏离，则恰恰说明了此时的文学仍然具有介入现实的可能。正如前文所述，邦达连科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意义和美学意义两个向度，他在关注文学作品表现形式与风格多样性的同时，强调“主权思维”的重要性，即文学必须承担起重构民族认同的核心使命。虽然后苏联时期的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等都具有多元分散的发展态势，但“只有通过祖国整个悲剧历史发展起来的、真实的、精神化的理想，”<sup>③</sup>才能将其团结起来。而所谓的“理想”，就是邦达连科所认为的文学必须具备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价值功能。邦达连科通过对后苏联文学中祖国情感缺失的批判，来呼吁当代俄罗斯文学回归到意识形态之中，要求作家们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上来，并直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在历经百年之后又以全新的面貌重返俄罗斯。”<sup>④</sup>进而言之，邦达

①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окаяние грешного Глебушки//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03. №12. <https://pub.wikireading.ru/hpfzPQ0CAa?ysclid=mdu6trdfgg448091924>

②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писателей и критиков в 2004 году// День литературы. №99. ноябрь 2004 г.

③ 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нравов. 11 октября 2024 г. [https://rkuban.ru/archive/rubric/literaturovedenie-i-kritika/literaturovedenie-i-kritika\\_16405.html?ysclid=mdu6w75h7n952606697](https://rkuban.ru/archive/rubric/literaturovedenie-i-kritika/literaturovedenie-i-kritika_16405.html?ysclid=mdu6w75h7n952606697)

④ [俄]邦达连科、王宗琥：“俄罗斯文学：急剧的年轻化——2008年俄罗斯文坛印象”，《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3期，第8页。

连科认为,只有革命性的语言才能打破国家、社会等外部力量对文学的桎梏。正像萨杜拉耶夫(Г. У. Садулаев)在谈及自己的长篇小说《药片》(Таблетка, 2008)时所说的:“人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sup>①</sup>邦达连科这种激进的文化主张既是一种对弥赛亚意识的继承,也是一种对当代俄罗斯文化危机的焦虑。

此外,邦达连科认为,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毅力使(精神要求的)水准保持原来的水平”<sup>②</sup>,因而对其切断民族文脉的连续性、进而导致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贫乏痛加批判。正如邦达连科所言,“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不是他们内在的弱点和缺点,而是毒瘤,随着毒瘤的增长,无论好坏,知识分子本身都越来越接近最终的死亡”<sup>③</sup>。在《知识分子的崩溃》(Крах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995)一书中,邦达连科与自由派展开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论战,系统分析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叛离与俄罗斯文明主体性消解的深层关联,并试图探寻重构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文明救赎路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俄罗斯文明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当下,文学或许已经从托尔斯泰时代的“灵魂工程师”,逐渐转变为后苏联时期的“文化杀手”。

观察这一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文学话语渐渐超越民族界限,从强调民族身份与传统文化价值,转向追求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价值观。世界主义指的是,“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之间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sup>④</sup>邦达连科所谓的“毒瘤”,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创作主体对民族记忆的主动剥离,进而导致祖国情感的缺失。而更令他担忧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会使当代俄罗斯文化渐渐丧失构建统一民族认同符号的能力。他无奈地感慨,在如今的俄罗斯文化中,普希金成了“一个商标,有‘普希金’牌的咖啡馆、蛋糕、伏特加甚至飞机和船

---

① [俄]邦达连科、王宗琥:“俄罗斯文学:急剧的年轻化——2008 年俄罗斯文坛印象”,《外国文学动态》,2009 年第 3 期,第 9 页。

②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Г. Русский выз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1. С.104-108.

③ Там же.

④ 王宁:“西方文论关键词 世界主义”,《外国文学》,2014 年第 1 期,第 97 页。

舶……”<sup>①</sup>从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到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直肩负着整合民族意识的历史重任，然而后苏联时期的文学场域却充斥着对民族叙事实践的虚无主义解构。当代俄罗斯文学想要重新接续与民族拯救的联系，就必须要恢复自身在整个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本体性地位。这意味着新一代知识分子需要实现三个维度上的转向：在时间维度上恢复同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对话，在空间维度上重塑俄罗斯文明独特性的叙事框架，在价值维度上赋予文学拯救民族精神的神圣使命。如此说来，邦达连科所言的“毒瘤”才能真正被割除。

但是，邦达连科的批评实践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后苏联社会逐渐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语境中，他仍执着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有评论认为，这种执着“耗尽了弗·邦达连科作为一位批评家的才华，钝化了他的审美悟性，使他无法正视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创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后苏联文学与批评的主流进程。”<sup>②</sup>即便在论及后苏联文学批评时，邦达连科也更多是作为爱国派的标志性人物被提及，而非单纯以诸如“有才华的文学批评家”等身份获得认可。爱国派对自由派作家创作的艺术技巧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根本无视这类写作本身，“沉陷于意识形态抗争的批评意识而偏废了作品的文学艺术性”<sup>③</sup>，这使得其批评话语在丰富“文学拯救俄罗斯”命题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局限。

无论如何，自由派与爱国派批评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他们之间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应看作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斗争的继续。”<sup>④</sup>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东西方思想之争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中断，而是在当代转化为“新西欧派”与“新斯拉夫派”争论的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在当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文学批评中依然有其时代价值。

①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Понимаем ли мы Онеги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20. №.13. <https://reading-hall.ru/publication.php?id=26821&ysclid=mdu6zkl8ws401024966>

② 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94页。

③ 同上，第295页。

④ 张建华：“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对话两则”，《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1期，第33页。

#### 四、学院派批评家——文学作为价值重建的基石

通过对分析自由派与爱国派批评家在文学的文化使命观上的异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派过度依赖西方的价值体系，可能会动摇民族文化根基，甚至出现文化断根的危险；爱国派将文学过度工具化，过于强调文学要服务于意识形态，或许同样会遏制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其理论在增强民族认同的同时也有滑入文化保守主义陷阱的危险。无论是自由派或是爱国派，若执着于非此即彼的立场去看待彼此，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健康发展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如果可以秉持一种兼收并蓄的辩证观点去审视自由派与爱国派之间的对立与分歧，或许有机会更好地理解“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的真正内涵。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多元图景中，除了以伊万诺娃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邦达连科为代表的爱国派，还有另一支以学术性、反思性为主要特征、以文化重建为导向的文学批评力量，这些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学院派批评家”（*критик-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他们的批评工作则被称为“学院派批评”（*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критика*）。与自由派与爱国派批评家的批评工作相比，学院派批评家们将文学批评视为一项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活动（*нау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而不仅仅是文学评论（*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他们的批评工作通常在文学学、文化学等专业领域展开，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包括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既深谙文学创作与鉴赏规律，又有更加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分析客体，研究过程更加理想、客观，层次分明。例如，俄罗斯的一些学院派批评家会应用传记研究、心理分析、接受史考察等研究范式，对文学现象、作家心理与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性剖析。尽管自由派与爱国派批评家同样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但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更直接地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紧密相连，作为某种思潮的“代言人”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发挥叙事构建的作用。

正如研究所指出的，后苏联文学批评呈现出“以邦达连科、恰尔马耶夫为代表的杜布罗夫斯基学派批评；以涅姆泽尔、丘普里宁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批评；以巴辛斯基、拉蒂宁娜为代表的文学文化批评；以及以利波

维茨基、斯科罗潘诺娃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批评”<sup>①</sup>等多重现象并存的局面。如果说“文学审美批判”代表自由派，“社会历史学、新意识形态批评”意指爱国派，那么“文化、心理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批评”则恰当地概括了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特点。巴辛斯基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其批评实践既不同于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推崇，也不同于爱国派的意识形态化叙事，而是试图在解构与重建之间找到一条属于俄罗斯文化的第三条道路。具体而言，巴辛斯基对于“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的独特建树在于，他以一种历史考察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审视文坛，并不主张情绪化的拯救，而是强调文学必须通过对历史中坚韧人格的书写，为民众提供道德力量，进而实现其“拯救”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巴辛斯基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拯救俄罗斯”的核心路径，主张文学应回归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以此来对抗后现代语境下的价值虚无与文化断裂问题。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理论得以全面发展。它并不是对现代主义的简单延续，而是“存在于现代主义复杂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之内，是现代主义历史发展中最最重要的时期之一”<sup>②</sup>。面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库里岑（В. Н. Курицын）、爱普施坦（М. Н. Эпштейн）、格尼斯（А. А. Генис）等学院派批评家积极进行文学理论阐释与文学批评实践，赋予了文学挣脱单一叙事束缚、探索多元表达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从理论建构、到本土化适应、再到逐步深化的跨越式发展。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方面折射出现实社会和人们思想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解构文本意义、颠覆文学规范的特征”。<sup>③</sup>巴辛斯基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代表，其文学批评与创作既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即在“消解、颠覆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同时，更注重‘重构’”，<sup>④</sup>呈现出独特的反思性立场，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深切认同，体现出一种辩证的、反思性的文化使命观。

① 黄玫：“后苏联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刍议”，《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61页。

② 侯玮红：“悖谬逻辑：1920—2000年代文化中（后）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化”，《光明日报》，2011年3月22日第14版。

③ 温玉霞：“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第86页。

④ 温玉霞：“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外语教学》，2010年第2期，第73页。

这种立场在精神谱系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 19 世纪根基派的思想。如前文所述，根基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变体，发展了斯拉夫派的思想，并试图在激烈对立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寻求调和与超越，主张知识分子应回归民族的“土壤”，即人民的生活、传统与精神根基。巴辛斯基在《托尔斯泰：逃离天堂》（Лев Толстой: Бегство из рая, 2010）和《另一个高尔基》（Горький, 2005）等传记作品中，通过对日记、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细致爬梳，力图还原传主的真实面貌。他运用精神病理分析方法，挖掘传主的精神创伤，剖析他们的行为习惯，还原心理动力机制。例如，在高尔基研究中，巴辛斯基聚焦其因童年家庭悲剧而形成的人格分裂特质，在托尔斯泰研究中分析其“逃跑主义倾向”和对完美家庭的渴望。<sup>①</sup>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后现代主义虚无倾向的一种对抗，实质上是在为俄罗斯的文化认同寻找一个坚实的、可依托的历史根基。这与根基派强调的“立足俄罗斯本土现实的精神”是一致的。批评家批判和解构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对意义、价值、深度和历史真实的消解，推崇和重构的是现实主义传统所代表的关注现实、塑造典型、探求真理、承载道德重负的文学精神。这种立场在对俄罗斯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上，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根基派批判西欧派的虚无主义、号召回归人民根基和东正教传统以重建俄罗斯精神的立场具有一致性。因此，巴辛斯基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僵化守旧不同，是希望站在传统的基石上来自我更新，应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危机。

从事文学批评的巴辛斯基以传记作家的身份驰誉俄罗斯文坛。他的传记写作原则与其对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批判如出一辙，学术批评体系也呈现出与自由派和爱国派批评家不同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复合性特征。一方面，巴辛斯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介入意识，将文学批评作为武器用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价值重建。他在《不为唯美主义者，不为粗野之徒》（Не для эстетов, не для быдла, 1995）一文中，将“美学文学”（«эст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出版描绘为超越商业的壮举，并大声疾呼“回归，回归，再回归！……唯有如此，当代俄罗斯文化或能从昏厥中苏

---

<sup>①</sup> 参见颜宽：“论巴辛斯基传记写作中的精神病理分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46 页，第 48 页。

醒”<sup>①</sup>；另一方面，他也曾创造性地将接受美学方法运用至高尔基研究，揭示了“接受的历史性”如何塑造作家形象的动态过程，从而使经典作家研究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将文学批评转变为对话场域，在各种解构主义的争鸣声中持续激活自己的思维。

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思索方面，巴辛斯基反对那些消解文学深度、迎接文化虚无的做法，并认为这种创作“失去了好不容易才形成的俄罗斯的读者群”。<sup>②</sup>事实上，巴辛斯基的这一观点与其作为“90年代人”批评家代表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深度绑定，后现代主义成为“他树立现实主义权威、确立文化传统统治的攻击目标。”<sup>③</sup>巴辛斯基将现实主义视为能够重塑民族精神、对抗价值虚无，进而“拯救俄罗斯”的核心路径。在他的观念中，20世纪俄罗斯文学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历程，“实质上正是将俄罗斯现实主义体认为唯一价值的过程”。<sup>④</sup>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大力尊崇，使他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消解文学深度的同时，更将其视为威胁文化传统存续的核心敌人。他在评论阿斯塔菲耶夫（В. П. Астафьев）《快乐的士兵》（*Весёлый солдат*, 1998）时，高度赞扬那些“身体残废，但道德上没有被摧毁”的士兵们。<sup>⑤</sup>巴辛斯基将作品中一个个肉体残缺但精神世界完整的士兵升华为对民族精神的隐喻，认为这部作品是“二十世纪最准确的人民灵魂史”<sup>⑥</sup>，充分体现了他所坚守的文学观，即真正的文学应通过艺术真实抵达存在本质。这也使巴辛斯基在面对文学市场化浪潮时，能够始终警惕文学中“用市场语言制造文学产品”<sup>⑦</sup>的现象，坚守当代俄罗斯文学在精神维度的独特内涵。

① Басинский П. Не для эстетов, не для быдла// Новый мир. 1995. №.5.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1995/5/ne-dlya-estetov-ne-dlya-bydla.html](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1995/5/ne-dlya-estetov-ne-dlya-bydla.html)

② 郑永旺：“孤独的读者和忙碌的作家——俄罗斯97年文坛印象”，《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3期，第72页。

③ 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330页。

④ Басинский П.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реализме и модернизме// Новый мир. 1993. №.11. С.233.

⑤ Басинский П. Как сердцу высказать себя?// Новый мир. 2000. №.4.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0/4/kak-serdczu-vyskazat-sebya.html](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0/4/kak-serdczu-vyskazat-sebya.html)

⑥ Там же.

⑦ 郑永旺：“孤独的读者和忙碌的作家——俄罗斯97年文坛印象”，《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3期，第72页。

这种观念生动体现了批评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即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有一部分人全然“无视原作者的版权问题”，<sup>①</sup>进而陷入对现实进行一种类似盗版式的书写当中。这一批判实际上所指向的，正是后苏联语境之下由于文化价值崩塌而引发的精神虚无主义危机。

巴辛斯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仅指向其理论本身，也将矛头指向某些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认为“传统文化的首要错误和头等耻辱在于，它的代表们天真地相信，如果‘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其他云云’一旦获得出版、拍摄电影、举行展览会、组织报刊专栏等等的可能，那么他们实际上将在创作方面显得无能。”<sup>②</sup>虽然在巴辛斯基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然“曲终人散”，<sup>③</sup>但他依旧呼吁传统阵营必须对现代主义的侵袭予以坚决回击。<sup>④</sup>通过对高尔基、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生命叙事的重构，巴辛斯基以精神病理分析法还原了传主的心理动力机制，展现了文学的历史连续性与人文精神的传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后现代主义过度解构传统的一种反思。同时，他主张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应断绝同俄罗斯民族文学根脉的关系，强调在解构官方话语后应重建基于经典传统的人文价值。在《圣愚与怪胎》（*Юроды и уроды*, 1999）一文中，他称赞叶弗谢耶夫（Б. Т. Евсеев）的艺术才华在于“能够娴熟地在艺术形象中实现最大胆的形而上的暗示与平行对照，”<sup>⑤</sup>体现出他所欣赏的并非是对文学简单的解构，而是在解构之后进行艺术重构的能力。同时，巴辛斯基也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给当下文学文化形势带来的冲击及其积极影响，最终建构起平衡解构与重建的文学批评范式。

在后苏联时期价值真空的文化语境下，巴辛斯基对俄罗斯文化中体现的“本体论激情”（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афос）有着清醒的认识，新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才华横溢、光彩夺目、适应性强，有时学识相当渊博，对当代文化语境反应敏锐……却彻底丧失了历史记忆，对一切神圣之物（无论是自己

---

① Басинский П. Пафос границы// Новый мир. 1995. №.1. С.222.

② Там же.

③ Басинский П.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реализме и модернизме// Новый мир. 1993. №.11. С.236.

④ 参见周启超等：《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思潮与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331 页。

⑤ Басинский П. Юроды и уроды//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99. №.4.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druzhba/1999/4/yurody-i-urody.html?ysclid=mdu7107wmu656039414>

民族的还是异族的)也毫无最基本的敬畏之心。”<sup>①</sup>这种历史记忆的断裂与神圣感的缺失,加剧了后苏联时期的文化裂变与精神危机。对此,巴辛斯基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基于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思考构建起以“文学拯救俄罗斯”为核心的批评话语体系。它以文学对俄罗斯的拯救为核心,以重建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为主要功能,彰显出当代俄罗斯学院派批评家对“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它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是学院派批评家们针对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症候的回应和批判。巴辛斯基眼中的文学应当回归对“客观现实”和“人性真实”的探寻,应该“瑕瑜互见”<sup>②</sup>,既要凸显伟人的超凡特性,又要刻画其平凡的一面,从而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在评论巴甫洛夫(О. О. Павлов)的自传体小说时,巴辛斯基盛赞其对“日常现实性”和“人性真实”等细节的刻画:“初读时,情节仿佛深陷细节的泥沼不可自拔。但随着渐入文本之境,你竟开始沉醉于这般精微的描摹……但或许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才呼吸自如,读来令人悸动,仿佛在翻阅自己的人生传记。”<sup>③</sup>在巴辛斯基看来,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解构表现为对现实与道德的背离,其不讲艺术技巧、热衷模仿和拼贴的创作手法实质上是对文学的社会职责与功能的一种消解。他将索罗金、叶罗费耶夫等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大众文学作家视为“无情感文化”(бессердечная культура)的代表,认为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只是迎合了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并没有引导其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进行向上思考,进而采用略有讽刺性的语言批评道:“它确实更加多样化,但只有一个缺点——这是一条致命的道路。”<sup>④</sup>这种批判直击当时俄罗斯文学中颠覆传统艺术结构、破坏伦理标准、消解道德严肃性的现象,其本质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文化价值混乱的结果。此外,巴辛斯基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面的开拓,让“文学拯救俄罗斯”的意蕴深化为对文化连续性的保护。在他的“后女性主义:俄罗斯文学也有女性的心灵”等

① Басинский П. Памяти Ваньки Жукова// Новый мир. 1995. №7.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1995/7/pamyati-vanki-zhukova.html?ysclid=mdu755dupo700649664](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1995/7/pamyati-vanki-zhukova.html?ysclid=mdu755dupo700649664)

② 颜宽:“论巴辛斯基传记写作中的精神病理分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4期,第56页。

③ Басинский П. Переулок – не тупик// Новый мир. 2001. №8.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1/8/pereulok-ne-tupik.html](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1/8/pereulok-ne-tupik.html)

④ Басинский П. Как сердцу высказать себя?// Новый мир. 2000. №4.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0/4/kak-serdczu-vyskazat-sebya.html](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ovyi_mi/2000/4/kak-serdczu-vyskazat-sebya.html)

一系列的文化专论中，巴辛斯基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带入具有独特气质的俄罗斯文学精神传统，在保持文学的先锋性的同时，努力避免文化断层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巴辛斯基学术视野的现代性。这种做法能够在吸取西方性别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坚持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女性书写立场，不仅使巴辛斯基得以实现先锋性和本土性的统一，也使其批评行为本身成为“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在后苏联语境下的生动表达。

在实践方面，巴辛斯基的文化救赎观也不是单纯对文化的怀旧，而是一种具有鲜明实践指向性的行动纲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表现出一种文化疲态：“大家都疲惫不堪，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sup>①</sup>面对这种疲态，巴辛斯基敏锐地捕捉到文学批评界重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现象，并对此发出了质疑：“这难道不奇怪吗？……仿佛一切都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经典的‘世纪之交’。”<sup>②</sup>通过考察当代俄罗斯的文学生态，巴辛斯基指出，正是市场化造成创作和接受的局限。后现代主义造成价值相对主义，而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又不足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是沉溺于对苏联体制的怀旧，还是全盘拥抱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狂欢，都无法真正应对当代俄罗斯复杂的精神危机。巴辛斯基的文学批评或许为俄罗斯探索出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执迷于对苏联文学体制的回忆，也不盲目地迎接各种后现代解构主义；既拒斥市场化的逻辑，也接受大众文化对现实的影响；既呵护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也保持积极的文化探索精神。这一立场使巴辛斯基的文学批评始终具有理性客观的学院派视角，保持着介入现实的活力，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认同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他说“活的思想和活的创造力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消失”<sup>③</sup>时，这种预言既是基于对文化生命力的一种信心，也是他对文学拯救功能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拯救俄罗斯”不仅是单一批评家的文化理想，更是整个俄罗斯民族在历史转型期寻求精神突围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巴辛斯基的文学批评在当代俄罗斯并非孤例，而是代表着一批知识分子

---

① Басинский П.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реализме и модернизме// Новый мир. 25 сентября 1993 г. .

② Там же.

③ Басинский П. Пафос границы// Новый мир. 1995. №.1. С.222.

在文化转型期的选择。他们共同构成一种既扎根俄罗斯文学传统、又面向当代文化挑战的学院派批评群体，试图在自由派与爱国派的二元对立之外，开辟一条注重学术性、反思性与文化重建的批评道路。

## 五、结语

本文以“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贯穿于俄罗斯文化和思想史的核心命题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从古罗斯时期至白银时代该命题的思想源流与嬗变，并着重剖析了三位当代俄罗斯代表性批评家的文化观。通过文学批评史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发现，“文学拯救俄罗斯”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古罗斯文学中所体现的宗教选择与民族认同，19世纪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根基派的论争，白银时代哲学家对东西方精神的融合，共同构成这一命题的多重历史维度。进入后苏联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与中心地位虽有所减弱，但其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这一使命并未终结，反而在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伊万诺娃秉持自由派的立场，主张俄罗斯文学应立足世界文学视域同西方对话，以存在主义与文化哲学为依托，推动俄罗斯文学从地方层面的书写走向人类精神共同体。邦达连科回归民族传统，强调文学应在民族精神重建与守护文化主权上发挥积极作用，提出“主权思维”以及“精神上的俄罗斯”理念，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守护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巴辛斯基则试图超越自由派与爱国派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冷静客观的反思姿态，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与现实主义重构之间寻求平衡。

三位批评家的批评观与文化观虽不尽相同，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价值多元、身份界限模棱两可的后苏联语境下，当代俄罗斯文学应该如何继续承担“拯救”使命？他们的批评实践表明，“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不再是单向度的意识形态输送，而是一种多维度、动态变化的文化实践。真正实现这一命题的当代价值既需要扎根于民族传统，也需要对世界打开大门；既要对现实加以批判，也要对价值进行重建。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依旧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与现实意义。它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更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谋求精神出路的集体无意识的展现。三位批评家的观念分歧与批评实践，共同搭建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重建的缩影，同时也给予中俄文学批评对话丰富的理论依据与启示。未来研究或许可进一步关注该命题在数字时代与新媒体语境中的演变，以及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开展互鉴的可能。

---

**【Abstract】** “Literature will save Russia” is a core proposition of Russia’s “literature-centrism”, highlighting literature’s national redemptive mission at spiritual and moral levels. A retrospectiv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reveals the proposition’s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 particular clarity: its early intellectual seeds were nurtured in Old Rus’ literature through religious choi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t was clarified and deepened in the 19<sup>th</sup>-century “Golden Age” amid debates over Russia’s path among Westernizers, Slavophiles, and the “Native Soil” (pochvennichestvo) thinkers; and in the 20<sup>th</sup>-century “Silver Age”, it was further elaborated by philosophers such as Solovyov and Berdyaev, at a metaphysical level, achieving an aspiration to integrate and transcend the spiritual world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aced with a loss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ry critics have infused the proposition with new meanings by reinterpreting “Literature will save Russia”. The liberal critic Ivanova turns toward world literature, seeking Russia’s spiritual coordinates through global dialogue and advocating international dialogue through literature. The patriotic critic Bondarenko emphasi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 using literature to consolidate identity and resist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The academic critic Basinsky maintains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nabling the traditional proposition to respond to anxieties of modernity.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standpoints, all three continue the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 vividly

demonstrating the enduring intellectual vitality of the pro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heir approaches diverge, yet together they reactivate the proposition's force amid the post-Soviet cultural crisis, remaining an inescapable source of illumination as Russia seeks to break impasses and chart a way forward.

**【Key Words】**“Literature will save Russi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centrism, Cultural Outlook

**【Аннотация】**«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 это ключе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центризма», указывающее на миссию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искуплению на духовн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уровне. Оглядываясь на историю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отчётливо видны истоки и эволюция эт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ег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прототип зародился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выбор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он был уточнён и углублён в дебатах между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лавянской 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ской школами в Золотом веке XIX столетия; а в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XX столетия, благодаря изложению таких философов, как Соловьёв и Бердяев, он достиг слияния и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духов на 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утрат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критики, переосмысли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наполнили её новым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мыслом.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ритик Иванова обратила своё внимание на миров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стремясь найти духовный ориентир для Росси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диалоге и выступая з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алог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 настроенный критик Бондаренко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ась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уха, используя литературу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гегемонии; критик-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Басинский поддерживал тонкий баланс между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ей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ей, позволя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темам отвечать на тревог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разные позиции, эти три критика коллективно продолжили древнюю традицию участ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постро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уха, ярко иллюстриру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ую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де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хотя их пути различались, все они возродили идею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культурном кризисе –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незаменим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дей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 её усилиях по преодолению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оиску выхода из него.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асёт Россию,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зм, куль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

(责任编辑 宋羽竹)

## 附 录

### 《俄罗斯研究》2025 年总目录

#### 2025 年第 1 期（总第 251 期）

- 3 冯绍雷 / 事在人为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 5 基里尔·鲁德 / 欧亚地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因素、风险和中国机遇
- 24 张 建 / 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布局特点及国际影响分析
- 54 李 巍 管潇潇 邱 强 / 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下的俄罗斯经济韧性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实证研究
- 85 曲文轶 贾鹏悦 / 冲突和制裁下俄罗斯与盟友的经济合作：以哈萨克  
斯坦为例
- 125 冉淑青 王建康 曹 林 /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农业合作逻辑、  
现状与对策
- 145 阿列克桑德拉·莫恰洛娃 谢尔盖·苏特林 / 现阶段俄罗斯与欧盟经  
贸关系的问题与前景
- 165 王若璇 柳德米拉·波波娃 / 俄罗斯渔业政策的变革、发展重点和  
对华出口前景

#### 2025 年第 2 期（总第 252 期）

- 3 杨洁勉 沈若豪 /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互动特点和理论意义

- 21 邓 浩 / 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亚国家政治关系：进展与前景
- 50 苏 畅 郭曼若 / 复合安全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演进与路径选择
- 76 王晨星 姜 磊 / 乌克兰危机下的俄罗斯外交：理念调整与策略选择
- 104 郭晓婷 / 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话语建构与叙事模式分析——基于 2014—2024 年普京在瓦尔代年会的主题致辞
- 128 柯 研 毕洪业 / 夹缝中的“雄心”：欧洲秩序博弈下波兰对乌克兰外交研究
- 158 阿莲娜·佩特鲁什科维奇 基里尔·鲁德 / 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以 RCEP 和 EAEU 为例
- 183 奥尔加·特罗菲缅科 / 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现状与发展趋势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253 期）

- 3 刘 军 阳书平 柯 研 / 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巴朗斯基学派
- 23 李永全 李开盛 张 云 / 捍卫国际秩序、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48 马 强 / 俄罗斯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
- 85 焦一强 蒋存昊 / 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
- 116 石 靖 郭宸岑 李羽姗 / 中欧运输新走廊的实践评估：基于田野工作的考察
- 139 刘 莹 / 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中的利益表达与身份建构：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

169 孙秀文 / 俄乌冲突后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图谱

2025年第4期（总第254期）

3 孙壮志 王晓泉 邓 浩 张家栋 余纲正 刘雨薇 / “上海精神”

与上海合作组织再出发

42 许 涛 / 中亚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动因、目标与困境

66 许昌志 /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和“不变”

93 周 明 林宇晴 / 中亚“C5+1”多边合作机制的类型与前景研究

135 陶 源 / 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干部教育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153 孙会修 /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华人教育问题

180 李 杰 / 远东中国剧院与革命叙事传播机制研究

2025年第5期（总第255期）

3 刘培东 吴志成 /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文明意蕴

22 朱云杰 封 帅 / 行走的机械伊万：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进程、战略逻辑与内外挑战

51 张严峻 / “追赶式”发展下的俄罗斯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治理

86 张东冬 /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数字外交及其镜鉴启示

114 宫 楠 张月萍 / 准战时法治：俄罗斯反制裁立法的体系化路径

144 徐睿迪 余森杰 / 制裁背景下俄罗斯产业政策与经济韧性：基于产业集群-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186 陈建华 / 小荷才露尖尖角——“托尔斯泰学”在民国初期的中国

2025 年第 6 期（总第 256 期）

- 3 刘军童珊 / 通往后西方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身份定位和实现路径
- 22 潘玥 / 地理约束与技术变革：俄乌冲突对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的挑战与重构
- 48 王英伦李航 / 地缘战略新变化与美国的“新疆界”
- 69 蔺陆洲 / 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与战争潜力
- 98 张君义 / 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动员机制与国家能力增长问题研究
- 132 郑永旺 / 当代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表意结构
- 153 赵晨宇 岳博强 / “文学拯救俄罗斯”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文化观研究

##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2万-2.5万字，需有300-500字的内容提要，3-5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18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 俄羅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5年第6期(总第256期)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 刘军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 021-62232113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 <http://ru.ecnu.edu.cn/>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 中国知网

网址: [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9 771009 721258

公开发行

定价: 30.00 元